

# 学术研究

ACADEMIC  
RESEAR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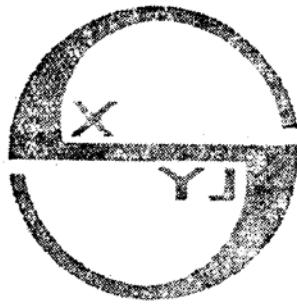
社会科学类国际交流刊物 JOURNAL FOR WORLD EXCHANGE



新兴工业卫星城镇——中山市板芙镇



总第115期 1992·6



# 学 术 研 究

主 编：梁渭雄

副主编：张硕城

刘斯翰

范汉英

|       |   |
|-------|---|
| 主办单位  |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
| 编辑者   | 学术研究编辑部<br>广州市越秀北路222号<br>电话3345916 邮政编码：510050 |
| 出版者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 印刷者   | 广东新华印刷厂   |
| 发行者   | 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
| 订购处   | 全国各地邮局（所）                                       |
| 国外总发行 |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br>国外代号 BM268 北京399信箱               |

代 号：46—64 国内定价：每册1.50元

国内统一刊号：CN44—1070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0—7326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粤工商广字01044号

本刊每逢双月25日出版

· 学习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 ·

**高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

——广东社会科学界学习座谈党的“十四大”精神综述

…………… 本刊记者 石 成 雷比璐 (6)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学习党的“十四大”精神 …………… 崔 河 (10)

· 从广东实践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精神文明建设要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服务** …………… 黄 浩 (14)

广东群众性创建精神文明活动的回顾与展望…………… 蓝 红 (22)

**珠江三角洲创建文明村、户活动迈上新台阶的若干对策**

…………… 广东省社科联课题组 (30)

**镇级城区精神文明建设的初步探索**

——南海市大沥镇的做法与体会…………… 关性乔 (34)

**转变观念, 服务经济**

——广东“四小虎”政法工作的实践与特色 …………… 郑 红 (40)

**广东农村改革开放的实践与思考** …………… 马恩成 (44)

**广东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政策的研究**

…………… 黄菊勋 谢鹏飞 莫 震 (50)

广东利用外资的宏观策略与微观措施…………… 张亦春 朱孟楠 (55)

**试论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的国际化经营**

…………… 温思美 樊均辉 (59)

**市场经济与东莞速度** …………… 袁学君 (63)

**成功的奥秘**

——中山市板芙镇的思维特色 …………… 穆 木 (67)

· 哲 学 ·

价值转化规律论(上)

- 〈价值转化工程〉之一章 ..... 黄锦奎(70)

· 经 济 ·

当代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和经济改革 ..... 何东霞(75)

我国农业向持续农业转化的政策选择 ..... 高 波(80)

· 历 史 ·

中共事前得知“西安事变”消息说质疑 ..... 蒋文祥(85)

罗素访华缘起 ..... 冯崇义(88)

关于古代中国与美洲的交往问题 ..... 龚纓晏(94)

晚清“厘金”起源新探 ..... 俞志生(98)

· 文学 · 语言 ·

谈中西文论的比较研究 ..... 蔡钟翔(101)

中菲人民战斗情谊的颂歌

——读〈风雨太平洋〉一、二部 ..... 何楚熊(106)

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主张 ..... 宋其蕤(112)

释〈诗经〉和〈楚辞〉中的“爱” ..... 罗英风(117)

· 学术信息 ·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研究的新起点

——“南海市文明村、户建设理论研讨会”综述 ..... (121)

· 书 评 ·

文言翻译的原则与基本方法

——评杨烈雄〈文言翻译学〉 ..... 罗伟豪(124)

〈学术研究〉1992年1—6期总目录 ..... (129)

# ACADEMIC RESEARCH

No. 6, 1992

## Contents

- Holding High the Great Theoretical Banner of the Socialism with a Chinese Characteristic Feature—A summary of the mainpoints from a forum attended by the Guangdong's circles of social sciences on the spirit of the CCP's 14th National Congress  
..... (Correspondents of the Journal) Shi Cheng and Lei Bilu ( 6 )
- Adhering to the Party's Basic Line for One Hundred Years without Waver.....Cui He ( 10 )
- A Spiritual Civilization Must Be Established for Implementing the Party's Basic Line.....Huang Hao ( 14 )
- A Look Back to and a Prospect of the Mass Activities of Resettling Up Ethic in Guangdong Province..... Lan Hong ( 22 )
- Some Countermeasures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to Promote Settling Up Civilized Villages and Families to a Higher Level ..... by a research group from Guangdong Feder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 30 )
- A Primitive Approach to the Spiritual Civilization in the City Proper Constructed at Town Level ..... Guan Xingqiao ( 34 )
- The Elementary Practice of the Politics and Law Work Done by Guangdong's "Four Tigers" for Their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An Enlightenment from It.....Zheng Hong ( 40 )
- A Ponderation of the Practice on Open and Reform in Guangdong's Rural Area..... Ma Encheng ( 44 )
- A Research on the Policies for Developing Those Industries with High and New Technology in Guangdong  
.....Huang Juxun, Xie Pengfei and Mo Zhen ( 50 )
- Guangdong's Macro-strategy and Micro-measure in Utilizing Foreign Capitals.....Zhang Yichun and Zhu Mengnan ( 55 )
- On the Internationalized Management of the Town and Township

|  |                                 |
|--|---------------------------------|
| Enterpris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Area<br>.....   | Wun Simei and Fan Junhui ( 59 ) |
|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Market Economy and Dongguan's Speed<br>of Economic Development.....   | Yuan Xuejun ( 63 )              |
| The Mystery Leading to Success of Banfu Town, Zhongshan<br>.....   | Mu Mu ( 67 )                    |
| On the Law of Value Transformation (part 1).....   | Huang Jinkui ( 70 )             |
| The Land System and Economic Reform Existing in the Current<br>Chinese Rural Area.....   | He Doaxia ( 75 )                |
| An Option of Policy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Agricul-<br>ture to an Agriculture with Continuous and Harmonious Develo-<br>pment.....                                  | Gao Bo ( 80 )                   |
| A Query on the View that CCP Had Had Information about Xi'an<br>Incident (1936) in Advance.....  | Jiang Wenxiang ( 85 )           |
| The Cause That 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 Visited China<br>.....   | Feng Chongyi ( 88 )             |
| Some Viewpoints concerni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ncient Ch-<br>ina and America.....   | Gong Ying'an ( 94 )             |
| A New Opinion upon the Origin of a One-percent Tax Levied in<br>the Late Qing Dynasty.....   | Yu Zhisheng ( 98 )              |
| A Talk about the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Western as well as<br>Chinese Literary Theory .....   | Cai Zhongxiang ( 101 )          |
| A Laud for the Militant Friendship between Chinese and Philippi-<br>nes' —A comment on Volumes I and II of "The Pacific<br>Ocean with Rains and Winds" by Du Ai .....          | He Chuxiong ( 106 )             |
| Zhou Zuorens Viewpoints on Children's Literature .....   | Song Qirui ( 112 )              |
| An Explanation of a Classical Chinese Form Word "Yuan" Used<br>in "The Book of Song" (Shi Jing) and "Chu Ci" by Qu Yuan<br>(about 340BC-278BC) .....                           | Luo Yingfeng ( 117 )            |
| The Principles and Basic Methods of Translation from Classical<br>Chinese to Modern Chinese—A comment on "Translation Meth-<br>odology for Writings in Classical Chinese ..... | Luo Weihao ( 124 )              |
| A General Catalogue of This Journal for 1992 (No.1-6) .....  | ( 129 )                         |

## · 学习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 ·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确立，是党的思想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邓小平同志作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广东理论界对“市场经济”的探索，走在全国前列，具有超前性和开拓性，对广东的改革开放起到了理论先导作用，成果和贡献应充分肯定。

●“十四大”报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高度重视理论建设，贯彻“十四大”精神，必须大力加强社会科学事业。社会科学必须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强化理论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的功能。要紧紧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课题，把社会科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台阶。

# 高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

——广东社会科学界学习座谈党的“十四大”精神综述

本刊记者 石 成 雷比璐

党的“十四大”的胜利召开，给广东社会科学界巨大的鼓舞。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团以及广东经济学会、广东哲学学会等学术团体，先后组织各种形式的学习、座谈、研讨会议，认真学习“十四大”文献，深刻领会“十四大”精神，联系广东十四年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丰富实践和经验，畅谈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的指导意义，畅谈社会科学工作如何深化改革，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为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服务。

在省社科联主席团委员座谈会上，著名专家学者们济济一堂，振奋之情溢于言表。张江明、梁钊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著名学者说，党的“十四大”，是继党的“七大”之后，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路线上的第二次大的飞跃。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意义极为重大深远。我党在社会主义建设路途上，经过四十多年的曲折探索，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的改革开放的实践，在国际风云变幻的复杂条件

下，总结出符合中国国情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和根本愿望的指导思想、路线，为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许多学者指出，江泽民同志十四大报告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要内容的九个方面的阐述，基本上概括出这一理论的体系构架。这一体系的哲学思想基础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这一体系的核心是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一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是多方面的，理论工作者首先要学习好这一理论，并继续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总结新经验，促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丰富、发展。

广东学者在座谈中一致认为，党的“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这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重大突破，是十四年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巨大理论成果。十余年来一直坚持真理，在全国率先提出并坚持不懈地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的广东经济学界，尤为“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理论而感到欣慰鼓舞。经济学家曾牧野、张元元、易振球等同志在几个不同的座谈会上，都紧扣市场经济这一话题，发表见解。他们回顾：早在改革之初，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先驱卓炯以及广东的一部分学者就指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迈向市场经济。此后，广东经济学界在商品经济研究的基础上，联系广东市场导向改革的实践，进一步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必须实行市场经济的观点。这一鲜明的观点，在全国率先提出，为人瞩目。1988年，广东召开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研讨会”和“广东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区理论与对策研讨会”，标志着广东经济学界对市场经济的研究已形成自己的理论观点，趋于成熟。两次会议上，包括社会科学界其他学科在内的与会者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改革的目标模式上形成了共识。当时广东提出的主要理论观点是：

1. 我们进行的改革正在把我们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的路子，从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留出一部分由市场调节，到以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再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们的足迹都是朝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方向走的。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一致的，其基本规律都是价值规律。区别在于：首先，两者是从不同角度来界定一种经济形态的特征。商品经济是指社会生产采取价值生产方式，是同自然经济、产品经济相对立的；而市场经济是指社会经济中资源配置的方式，其特征在于以市场机制来组织和分配生产要素和社会收入，是与统制经济以及我们曾长期实行的指令性计划经济相对立的。其次，商品经济是较广泛的概念，市场经济必然就是商品经济，但只有在生产社会化发展到一定高度，市场成为资源的主要配置者的时候，商品经济才同时具有市场经济的性质。3. 任何社会制度都有资源配置方式的多种选择。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作为现代社会资源配置的普遍性的有效方式，社会主义条件下同样可以采用。改革开放实践表明，我们正在逐步采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取代传统的以行政命令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就是由有宏观管理的市场来配置资源和生产要素的经济，而这就是市场经济。



同时，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也表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需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就是一种国际市场经济，主要受市场机制调节，必须从体制上适应国际市场，使沿海经济与国际经济相连接。4. 构造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所有制结构、市场体系、市场运行机制是三大支柱。必须建立多种经济成份长期并存、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多元经济结构，这将是我们的所有制结构的基本特征。广东目前已形成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私营经济、合作经济、中外合资、外资独资、股份经济等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局面。随着国有企业股份制的发展，必然出现国有企业同其他多种经济成份合股经营的企业，也必然出现个人持股的情况，结果是出现一种非公非私、亦公亦私、公私统一的新的经济结构。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对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化，改造国有资产的管理形式，是深化企业改革的必然选择。这种方式能较好地实现企业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使企业成为完全独立的经济实体，增强企业自我约束和扩大再生产能力，同时又不会根本改变所有制性质。

必须建立完全市场化的资源分配体系。经过十余年改革，广东商品市场基本形成，商品市场机制调节已基本上发挥了主要作用，但是生产要素市场却发展缓慢。而单一的商品市场不可能很好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实践证明，只有具备比较完备的，包括金融、资产、房地产、劳动力、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市场，才能更好地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和转换，高效率地、高效益地调动、配置、使用生产资源，加速经济增长和实现经济协调。

必须培育高效的市场运行机制，市场经济运行主要是靠市场机制。社会根据市场运行规律制定出各类市场运行的法规、秩序，让市场运行的各类主体——政府、企业、团体、集体、个人都共同遵守，形成“小政府、大市场”，企业成为市场主体的结构；市场调节经济，政府监控市场，并以市场运行客观规律为依据，通过市场组织及经济杠杆实行间接宏观调控，以保证充分发挥和完善市场作用，达到社会生产力协调发展的目的。

向市场经济转换是一种新经济体制培育和运行的过程，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催化这种新体制成长和运行的强大动力不是单一资本或劳动，而是以劳动、资本、土地、科学技术、管理、信息情报等各类生产要素作为系统驱动力，形成多元化动力结构。因此，过去单一的“按劳分配”或“按资分配”都不是市场经济分配模式，而应建立一种按劳动、资本、土地、科技管理、信息情报等多种生产要素的经济功能大小进行共同分享利润的多元分配形式。

一些学者感慨地说，广东经济学界为了“市场经济”这四个字，当时承受了多么大的压力。现在，党的“十四大”终于正式确立了这一理论，这不仅使改革有了明确的目标和路向，而且也使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迈上新的台阶。广东理论工作者要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发展和丰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提供更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在学习座谈中，林洪、张磊、吴群策、梁渭雄等同志说，“十四大”报告比起以往的

大会报告有一个新的特点，就是高度重视理论建设，理论的份量很重。“十四大”报告通篇融会了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并确立这一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充分体现了理论建设对一个党是多么重要。“十四大”报告，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一篇典范。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的不断出现，迫切需要得到理论的指导。十四年来，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开始，到邓小平今年视察南方讲话，我们的每一个前进步伐都伴随着理论的引导和支持，理论对于改革开放实践的先导作用越来越为明显。理论研究、社会科学事业，必须大力加强，决不应削弱。同志们指出，广东的改革开放在全国先行了一步，同时，在理论探索上也是先行的。广东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特区经济、外向型经济、对资本主义再认识等一系列改革开放的重大理论问题上，一直是走在前头的。广东理论研究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务实，注重总结实践经验并上升到理论，反过来指导和服务实践，很少在姓“社”姓“资”之类的抽象概念争执上浪费时间。这就是广东学派和广东作风。那种“广东人只会生孩子，不会起名字”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偏见。以率先提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标志，广东理论工作者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方面是作出了贡献的，很有理论勇气和实绩性建树。

党的“十四大”精神，给广东社会科学界注入新的前进动力。多次的座谈学习中，大家认为，社会科学界首先要紧紧抓住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课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认真学习、贯彻、落实；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丰富和发展这一重大的理论。其次，要大力做好“十四大”精神的宣传工作，为我省的改革开放服务。同志们认为，同其它工作部门一样，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从观念到体制，也面临着重大的改革。面对市场经济的挑战，社会科学的改革目标是促进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结合，强化理论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的功能。理论界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贯彻“学术自由”和“双百方针”。就目前而言，广东的社会科学研究队伍和机构还很薄弱，亟待得到加强，而不是削弱，任何有远见的人，都应该看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

省社科联主席团还向所属一百多个学会、协会发出倡议，要求各学会团体和全省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在学好“十四大”文件的同时，大力宣传“十四大”精神，研究和宣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做好广东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总结，积极发挥社会科学的决策参与功能，为发展广东两个文明建设的大好形势，加快广东追赶亚洲“四小龙”的步伐作出贡献。

#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学习党的“十四大”精神

崔 河

今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有一段很精彩的讲话：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党的十四大再次重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条党的基本路线，是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精粹，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重大发展。我国十四年改革开放实践和成就证明，这是一条唯一正确的路线。

回顾我们清远金泰企业集团这几年走过的路，我们深深感到党的基本路线的无比正确。金泰的前身是清远市纺织工业总公司，1988年建市之初，一张白纸，一无资金，二无人才，三无办公地点，四无下属企业，只有一个公章。四年时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发扬“团结奋斗，艰苦创业，科学民主，开拓进取”的新市精神，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从零开始，筹措资金四个亿，办了一批实业，现在已拥有已投产企业10家，二级公司15家，在广州、香港、澳门设有子公司，在深圳办起了酒店，在北京设有办事处，目前还在筹建5家新的企业。集团除纺织已基本配套成龙之外，还开发了房地产、建筑材料、饮料、玩具、包装等新产业项目，初步形成一业为主，多元化发展的全新经营格局。最近，经清远市会计师事务所审核，集团总资产已达6.5亿元，剔除投入部分，净资产达2.9亿元。前不久，集团属下的金泰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经省政府批准，内部发行股票两个亿，将企业集团的发展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短期内能取得这样的业绩，靠什么呢？靠的首先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党的基本路线。

## 一、党的基本路线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

企业是经济实体，社会主义企业的根本任务就是搞好生产，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在适销对路效益好的前提下，发展得越快越好。生产发展，经济搞上去了，社会主义才有强大的物质经济基础，人民生活才能不断提高，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充分体现。反之，搞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搞空头政治，结果是生产受冲击，经济停

• 本文作者是清远市金泰企业集团总经理。

滞，社会主义也不可能长治久安，繁荣富强。基于这种认识，我们金泰企业集团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十分鲜明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集中精力，聚精会神抓经济，一心一意搞生产，不论社会上刮什么风，下什么雨，以发展经济、搞好生产为中心不动摇。

前些年，治理整顿，资金短缺，我们不仅没有停滞不前，而且迎着困难上，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坚持外向型发展，发展速度丝毫未受影响。“六四”事件，波及全国，公司上下统一认识，排除干扰，坚守工作岗位，全公司没有一个人介入。就是在那段时间，我们紧锣密鼓筹建了两个针织厂以及棉纺厂、染织厂、纸箱厂。东欧苏联剧变之后，社会上一度有人认为，企业也要把反“和平演变”作为中心工作来抓，我们认为，这种认识不符合党的基本路线，实质上是要转移新时期党的主要任务，取代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走回过去政治挂帅、空头政治的老路。因此，我们没有随波逐流，继续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使企业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前些年，总有人热衷于姓“社”还是姓“资”的抽象争论，对改革开放诸多疑虑。我们搞集团公司、搞用工制度的改革，引进外资多了点，项目上多了点，都遭到社会上的诸多非议。对此，公司领导班子保持清醒头脑，一是坚持改革，大胆实践，大胆试验，在引进外资，完善企业集团，改革用工制度等方面，都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二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用生产力标准检验一切工作，只要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就大胆去干。今年，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从理论上解决了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使我们更加明确了方向。金泰的一切实践，只要是符合“三个有利于”，我们就理直气壮，一干到底，决不动摇。

## 二、解放思想、大胆试验、勇于创新，是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先导和前提

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报告中指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勇于探索，大胆试验，及时总结经验，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报告强调指出，要加快经济发展，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不要被一些姓“社”姓“资”的抽象争论束缚自己的手脚。社会主义要赢得同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生产和商品经济一般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我们公司组建之初，就坚持解放思想、大胆创新的宗旨，大胆抛弃传统的办企业路子和管理模式，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及时地组建企业集团，以适应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我们坚持以经济为纽带，按照统一计划、统一信贷、统一经营、统一结算、统一上缴的要求把集团办成一个投资中心、结算中心和调控中心，同时，充分调动下属公司和工厂的积极性。企业集团内部，坚持以棉纺为基础，以制衣等最终产品为龙头，组织生产。我们还在河南、河北、山东等省建立相对稳定的原材料基地。在香港、澳门设立子公司，收集信息，扩大出口，组织原料和配件。在集团内部，我们又划小核算单位，能承包的承包，能挂钩的挂钩，能计件的计件。在用工制度上，全面推行合同工制、临时工制、季节工制。这一系列改革措施，都是在与旧观念、旧体制的交锋过程中进行的，每一步都有风险。实践证明，这些改革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大大调动了基层和干部职工的积极性。成立企业集

团，大大优化资源的内部配置，提高了人、财、物的利用率，仅流动资金就减少了40%，产品成本也大大降低，增强了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和创优质名牌的能力。1989年至1991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纺织工业的最低潮，全国纺织行业大面积亏损。我们新建的企业，在没有国家计划，完全由市场调节的情况下，仍然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1991年，已投产的八个企业有七个实现盈利，今年已投产的十个企业可望全面消灭亏损，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由于发挥了集团优势，有七个产品被省有关部门评为行业优质产品，有四个被评为省轻纺“四新”优秀产品，有五个被评为省优质产品。

### 三、重视科技、重视人才，是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也是企业竞争发展的关键

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技现代化。经济要上得快点，必须依靠科技、依靠人才。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报告中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概括成九条，重视科技、人才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报告指出，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报告还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的一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要在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尚。我们感到，金泰企业集团有今天这样的发展，其中一个关键，就是重视科技和人才，把这两条看成是立业之本。在金泰创业之初，我们就十分重视企业的科技起点和人员素质。我们提出，新办企业，一开始就要向三个“高起点”努力：一是科技高起点；二是人员素质高起点；三是经营管理的高起点。只有按这一原则去建厂、办厂，才能使企业较快地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的位置，掌握整个经营发展的主动权。按照这一思路，我们不断在公司和厂的领导层中，强化科技与人才意识、现代管理意识和名优产品意识，要求把这些意识化为每个干部的自觉行动。公司针对国内纺织行业多数处于劳动密集、技术构成不高的状况，在引进设备时，均以发达国家八十年代的先进技术为参照系，选择项目时，尽可能瞄准国内技术空白或薄弱的项目，宁可投资大一点，难度大一点，也要好一点，精一点。四年多来，我们先后引进了具有八十年代末期世界先进水平的气流纺纱机，意大利箭杆织机、美国莫里森预缩机和日本的全套电脑控制针织机、绣花机，最近试产的新北江印染厂全套引进了日本的退煮漂生产线，把企业的装备水平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条生产线，被称为“东南亚第一线”。正在筹建的金泰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引进的超细旦纺丝、加弹化纤设备，是九十年代世界一流的设备，它的建成投产，将从根本上改变整个集团的设备技术构成。我们十分重视技术开发、工艺革新以及新名优产品的开发，把产品技术含量的提高作为企业技术进步的主攻方向。近年来，十个厂先后开发改进工艺技术共70多项。

在人才问题上，我们坚持筑巢引凤，“养仕三千”的政策，广泛向社会招纳各类人才。我们清远是新建市，在地理位置、物质生活条件等各方面与珠江三角洲相比还有一段差距。但是，我们坚信，靠一个“诚”字、一个“信”字，同样可以吸引人才。所谓“诚”，就是心诚。公司班子抱着求贤若渴的思想，走南闯北到各地寻访所需人才；发现人才，

不惜三顾四顾甚至五顾茅庐，以诚感人，使大批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才以及大学毕业生自愿来公司落户。四年来，我们先后调入各类工程师、经济师、会计师、工艺师及生产经营骨干近600人，接纳安排大中专毕业生400余人。在治理整顿期间，市场疲软，生产遇到极大困难，许多企业不愿接收应届大学毕业生，我们认为，这恰是我们招才求贤的大好时机。只要是人才，招进来就是企业的一笔珍贵财富，随着今后的发展，用得好，他们的增值是很难用金钱来衡量的。目前，我们企业的人才结构已比创业之初大大改变，我们不仅有工程技术、经济管理、文秘、公关方面的人才，连图、音、体……等方面的人才，我们也照样调入，初步形成了人才结构的多元化。所谓“信”，一是对人才充分信任，放手使用，让每个人都发挥所长，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二是讲信用，凡是承诺的工作、生活待遇条件，一一都要兑现，使他们来了之后不仅安居乐业，而且事业有成。几年来，我们还实施了一系列人才考核、奖励、晋升制度。许多在工作中干出了实绩，有创造性，思想业务水平较好的知识分子、生产骨干先后都被提拔到车间、科室、厂和二级公司甚至总公司一级领导岗位。

#### 四、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一定要真抓实干，干出成效

邓小平同志和党的十四大要求我们，思想更解放一点，改革开放的胆子更大点，建设的步子更快一点，千万不可以丧失时机，经济发展总要力争几年上一个台阶，中心是加快经济的发展速度。面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第二次浪潮的到来，大家感到，当前正是经济发展的难得的好气候，机遇稍纵即逝，我们必须努力奋斗，切不可错失良机。

今后二十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一定要认清形势，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只要效益好，适应市场需要，能实现良性循环的，能搞多快就搞多快。我们要在抓好现有企业基础上，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努力建设一批高科技、高税利的项目，发展高精尖产品。在我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换的变革中，企业面临的挑战将更为严峻，我们要瞄准国内、国外两个市场采取必要措施，不断提高产品的覆盖面和市场占有率，把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

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我们要在办好企业的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加深对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的理解，不断增强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把邓小平同志关于“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的伟大教导落到实处。

责任编辑：石成

## 精神文明建设要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服务

黄 浩

如何搞精神文明建设？广东的实践表明，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坚持精神文明建设服从、服务于党的政治路线的总方向。我们所进行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促进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文明建设。

### 树立“服务”观念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定的文化（作为观念形态）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精神文明，属于观念、意识范畴，它反映社会存在，又作用于社会存在。因此，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提高全民族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培育“四有”新人，以适应和推动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但是，要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引并为之服务。党的基本路线是总结中国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而提出来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事实说明，只有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才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才能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离开这条政治路线，就谈不上现代化建设，谈不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精神文明建设同其他工作一样，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党的基本路线，促进和保证它的全面贯彻，并以此作为检验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重要标准。正是据于这种认识，广东在进行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从总体上说，着力于创造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指导、舆论力量、价值观念和社会文化环境，给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从而振奋广大干部、群众献身于现代化事业的巨大热情和创造精神。

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过程，是一个思想变革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广东在创办经济特区之初，就曾出现过所谓“卖国”论、“新殖民地”论，认为这样搞会丧失主权；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有人忧心忡忡，担心外商投资办厂会使社会主义变质；对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有人认为这是用资本主义的“药方”治社会主义的弊病；等等。随

随着对外开放的发展，大门打开了，又有些苍蝇、蚊子进来了，使有的党员、干部受到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出现过走私、经济犯罪活动和“黄色”恶潮的泛滥，以后又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过程中，有的党员干部，对处理一个“中心”（经济建设）与一个“存在”（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存在）、处理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的关系、“两个基本点”的内在关系方面，思想不够清醒，时有偏颇。针对这些思想认识问题，除了坚持进行宣传、引导和思想教育之外，还通过总结实践经验，用事实说话，解疑释惑，以端正对改革开放的认识，增强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能力，并明确地提出：一个“中心”不能旁移，两个基本点不能偏废，两个文明建设要协调发展，从而使党的基本路线得到较好的贯彻，精神文明建设水平也随着实践的发展，相应得到提高。

### 坚持“两手”都硬

坚持为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服务，就要在实际工作中确立“两手抓”的方针，做到两手都硬。为此，要解决好如下几个问题：

1. 要教育干部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经济与政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关系，为坚持“两手抓”打下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不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就缺乏物质基础；但是忽视政治思想工作，忽视在一定范围还存在阶级斗争，忽视上层建筑的改革和建设，孤立地进行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制度也难于巩固。只有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硬，才能使经济与政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互相促进，相得益彰。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条件下，更应如此，决不能一手硬、一手软。因此，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定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切实做到两手硬。

应该说，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委对两手抓的认识是明确的，头脑是清醒的，并在实践中不断加深认识，在工作中逐步做到“两手硬”。在指导思想，既强调突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又强调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在提出“三个更加”——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搞活，对下更加放权的同时，强调“两个坚定不移——改革开放坚定不移，打击经济犯罪坚定不移”。在对外交往中提出“有所引进、有所抵制”、“排污不排外”的方针。对实际工作则反复强调要两手抓：“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查处各种违法违纪行为，打击各种歪风邪气；一手抓发展商品经济，一手抓思想政治工作”。从1982年开始，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能得到较全面的坚持和贯彻。正是这样，不仅商品经济得到较大的发展，精神文明建设水平也得到不断提高，各种违法犯罪分子受到了惩治，仅受各种处分的党员全省就达6万多人，从而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2. 要引导人们不断解放思想，逐步确立起与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和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新观念。这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它要改革不适应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经济体制和上层建筑，要推动小农经济、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现代化大生产的转变，并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和经济管理体制，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本本主义、社会主义“旧模式”和各种旧观念、旧习惯势力的干扰。因此，能否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就成为能否顺利地推进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条件。

为了推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省委一方面通过舆论宣传、举办读书班、理论务虚会、常委扩大会等形式，进行思想引导；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方面，是强调实践、试验，在实践中提高认识，在实践中消除疑虑，在实践中解放思想。特别是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兴办了3个经济特区，这些特区的实践和所创造的经验，有力地回答了各种质疑，澄清了种种疑虑，使思想解放、观念更新建立在可靠的实践基础之上。就这样，在实践中逐步培育和形成了许多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新思想、新观念。

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离不开教育，更离不开实践。解放思想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不是一次能够完成的。解放思想是否正确，新的观念是否可靠，还得靠实践来验证。这个实践的标准，最根本的就是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完善。因此，解放思想，也同样不能从别的本本出发，照搬照抄西方的东西。解放思想的正确途径，应该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坚持从实际出发，为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推动实践的发展，最终达到实事求是。

### 3. 要正确处理精神文明建设中内在的几种关系。

——正确处理破和立的关系。解放思想、破旧立新，是辩证统一的。不塞不止，不止不流。不破难以立，不立难以破。要在破中立，立中破。根据广东省的实践，在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处理破与立的关系，必须始终围绕并坚持以是否有利于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为准绳。为此，要着重树立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观念，坚持“一个中心”不旁移；树立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观念，坚持在改革开放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树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念，坚持大胆实践、大胆试验；树立商品经济是社会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观念，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发育；树立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科技、人才观念、民主法制观念，促进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与此同时，要着重破除与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不相适应的僵化思想、封闭观念、小农意识、大锅饭思想、形而上学观念等；破除个人至上、绝对民主、自由的资产阶级的社会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封建残余意识；要着重反对金钱至上、见利忘义、尔虞我诈等腐败丑恶的思想和行为；反对和警惕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

——正确看待和处理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这是在改革开放条件下进行精神文明建设所必须注意解决好的一个问题。对此，我们强调，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要立足本国，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反对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又要面向世界，积极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以促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思想，既不能良莠不分，以学习借鉴为名，全盘引进、加以吸收；也不能因为强调继承发扬民族文化，又关起门来，回到过去的封闭状态中去，排斥一切外来文化，因噎废食。正如邓小平同志在1983年指出的：“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它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是愚蠢的。但属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基于这种认识，广东省委对外来文化提出“有所引进、有所抵制”和“排污不排外”的方针，并在工作中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文化管理，切实做到“支持有益的，允许无害的，取缔违法的，打击犯罪的”，从而促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坚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破旧与立新，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杂过程，不能一次完成，要随着实践的发展深化，并经过多次反复、验证，新的思想、观念才能确立，旧的思想才能破除。因此在破与立的过程中，难免会受到来自“左”和右的两个方面的干扰。这两种干扰，有时同时存在，有时交替出现，有时反复交错。从广东实践来看“左”的思想，主要表现是：从本本出发、从旧观念出发、从旧的社会主义模式出发，对改革试验中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看不惯，或有顾虑，不敢干、不敢试；对来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东西，一律称之为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不予区分地加以排斥、批判。右的思想，主要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流传、泛滥和干扰，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行为也时有抬头，并在一定气候条件下泛滥。“左”和右两个方面都干扰着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尤其是“左”的东西根深蒂固，顽而难化。因此，必须坚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谈话中指出：我们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实践的概括。

反倾向斗争需要有清醒的头脑，更要把握其发展规律。总结过去的经验，我们看到，一种倾向被注意了，又有可能掩盖着另一种倾向；一种思想被克服了，在一定条件下，它又有可能以别的形式冒头滋长。这就说明，两种倾向斗争的顽固性和复杂性。因此，开展两条战线斗争要做到，反“左”必须防右，反右必须防“左”。在工作中，要注意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划清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的界限，划清本本主义、经验主义与马列主义的界限，划清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界限。对人的处理，要十分注意政策。意识形态领域，大量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思想认识问题，必须在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基础上，妥善处理。力戒用“文化大革命”那一套无限上纲上线，大批、大斗的做法。

搞好“三层建设”

精神文明建设为党的基本路线服务，这是长期的任务，其基点要放在建设上，在建设上用气力、下功夫。这就必须着重搞好思想、文化、社会文明三个层次的建设，发挥三者的综合效能，才能提高人的整体素质和全社会的文明程度。

1. 搞好思想建设。这是提高人的政治思想、道德素质的要求，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一定的社会行为是一定社会意识的表现。良好的政治思想、道德素质，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的基础。因此，搞好思想建设，对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搞好思想建设，主要是对党员、干部、群众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进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国情教育，党员还要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教育，进行民主与法制教育，等等。但值得注意的是，不管什么教育，都要联系实际、围绕实践、推动实践、讲求实效，反对脱离实际、从书本到书本搭空中楼阁，反对搞形式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注重思想政治工作，对党员、干部、群众进行了多种内容的教育，效果也是好的。主要做法是：

——安排教育内容，要根据不同对象而各有侧重，不搞一刀切。对县以上领导干部和宣传干部要着重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和教育，特别是搞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近几年，全省参加哲学学习的各级干部达60多万人。通过学习，使他们着重提高五方面的认识：一是提高对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相统一的认识，自觉抵制本本主义；二是提高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科学性的认识，做到全面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克服好走极端的片面性；三是提高对实事求是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自觉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克服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四是提高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精髓的认识，学会分析和解决建设和改革中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克服各种形而上学、一刀切的倾向；五是提高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认识，增强现代化意识，自觉摆脱小农经济的封闭、狭隘意识，既从中国实际出发，又放眼世界。对基层党员和干部要重点抓好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国情教育（党员还要学习党的基本知识），使他们提高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发扬为人民服务精神，做好基层工作。对广大群众则主要是进行理想、道德教育，形势、政策教育和法律常识、社会公德教育，使他们热爱国家、热爱集体、热爱社会主义，自觉遵纪守法，发扬主人翁精神，努力为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要紧密切联系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善于抓住群众关心的疑点、热点、难点问题，为其排忧解难，做好思想引导工作。多年来，我们先后着重解决干部、群众思想中的“三怕”：最初是怕引进外资办厂变为资本主义；以后又怕党的富民强国政策改变，回到“文革”前的“穷社会主义”；随着改革的深化，又怕打破大锅饭、铁饭碗，生活没保障。为使思想教育更有效，必须提倡群众参与，把教育与有益的活动相结合，把灌输与自我教育、互相教育相结合。

——要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新形式、新方法。要确立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的观念，打破“我讲你听，我打你通”的旧程式，建立“育、导、管建”的新机制，以激发群众内在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从而把思想政治工作搞活、搞深、做实。

2. 搞好文化建设。文化、科学知识是精神文明的基本要素。提高全社会的文化、科学知识水平，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可缺少的条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特别是在当今世界正经历着一场新的科技革命，世界经济的竞争突出表现为科技和智力之争，而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是在文化科学教育落后的基础上起步的。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我们必须从战略的高度，大力发展文化、科学、教育事业，提高人的整体素质，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广东这10多年来，文化、科学、教育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省委、省政府先后作出发展文化教育及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依靠科技进步发展经济的决定，对全省振兴文化、科技、教育事业，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由于各级、各类学校的发展，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将提前在本世纪末基本实现，具有良好素质的劳动者和多层次的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人才将大量增加。与此同时，抓好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部门的建设，搞好舆论引导，促进文艺创作的繁荣，并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努力提高精神产品的生产、创作和传播的水平和质量，以陶冶人的理想、道德、情操，提高人民参与改革和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

3. 搞好覆盖全社会的文明建设，包括创造良好的社会秩序、树立高尚的社会公德、发扬文明新风。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层次，也是精神文明程度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它对保持社会稳定与人际的和谐关系，促进社会主义文明进步有着重要意义。广东省委对这一建设十分重视，把它列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来抓，并先后于1984、1986、1991年三次召开全省精神文明表彰会和工作会议；去年开展社会公德大讨论；1992年又召开了全省创建文明户、村、镇经验交流会，先后总结、推广了广州南华西街、南海市等先进典型经验。省委还提出“好学进取、团结友爱、诚实礼貌、健康文娱、卫生美化、勤俭办事、遵纪守法”28个字，作为对全省树立社会文明新风的要求。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全省的社会文明建设。

实践证明，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是群众自我参与、自我教育、自我激励、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好办法，是推进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好形式。多年来，我省从机关到基层，从城市到乡村，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创文明单位、文明街道、文明镇村户和军警民共建精神文明等活动，不但历久不衰，而且不断有新发展。这些活动，对培养人的道德情操、移风易俗、培育社会文明新风尚、美化城乡面貌，都起了很好的作用。与此同时，不断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在1985年前，几乎每年整顿书报刊一次，在1985年后，几乎每年开展一次以“扫黄”为主要内容的除“七害”斗争，以创造一个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思想、文化环境。

## 加强四个“保证”

要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除了领导思想要树立“服从、服务”于政治路线的观点，在实际工作中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并切实搞好“三个层次”的建设以外，最关键的是加强党委的领导，加强队伍建设，加强阵地建设，加强法制建设，这是搞好精神文明建设的保证。

1. 加强党委的领导。这是搞好精神文明的关键。实践表明，各级党委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如何，决定着精神文明建设发展快慢、质量好坏。党委加强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主要是按照党的有关方针、政策、要求，配备好干部、制订规划、定期部署、适时检查、抓好重点、总结经验、提供必要的条件。特别是要善于结合实际，及时加以引导。在困难的时候给予必要的支持；在思想混乱时及时指明方向；在出现问题时能妥善处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精神文明建设各项工作沿着正确的轨道顺利开展，更好地为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服务。

2. 加强队伍建设。这是搞好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精神文明建设的状况和成效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宣传、思想、文化部门队伍的素质，尤其是领导班子的素质。所以，一定要注意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业务上加强队伍的建设。广东在改革开放以来，通过组织学习、参加实践、定期总结，加强引导，并坚持选送处以上骨干进行培训，使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队伍的“四大素质”不断提高，经受住1989年春夏政治风波的考验。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必须重点搞好各单位领导班子的建设，着重选配好第一把手，并大胆提拔任用素质好的年轻干部。同时，加强对精神产品制作、传播第一线工作的骨干的配备和培训，还要加强对这支队伍的职业道德教育和建设。只有这样，才能使这支队伍适应工作需要和形势发展的要求。

3. 搞好阵地建设。这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重要的条件和依托。从广东的实践看，阵地建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传播媒介的阵地建设，主要是提高200多个报刊和广播、电视的宣传和出版物的质量，使之能较好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播实践经验、先进思想，减少和排除各种“污染”和干扰。二是文化基础设施的“硬件”建设。这种“硬件”建设要随着经济发展而发展，不能操之过急，要求过高，也不能只强调困难，不予重视。只有这样，才能虚实渗透、软硬配合，提高效益，并使两个文明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广东全省及各地随着经济发展，思想文化设施的建设的投入逐年增加，仅“七五”期间，省委、省政府安排省属思想文化设施的重点项目投资，就有2亿多元。全省各地的文化设施也有了明显的改善和加强。随着阵地建设包括“硬件”建设的发展，城乡文化生活日趋活跃、丰富，对传播社会文明新风，引导人们追求积极健康的精神生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各地的发展并不平衡，有的地方经济发展了，文化设施却搞得比较差；物质生活很富有，精神生活却相对贫乏。说到底，这同当地领导对精神文明建设认识不

足、重视不够有关。这种状况，需要进一步加以改变。

4. 搞好法制建设。这是精神文明建设中加强管理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思想教育为基础，法制管理是保证。一些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社会文明之所以能搞得比较好，主要是靠法去管。借鉴它们的经验，应当把文化立法工作放在重要位置。目前一些歪风邪气、消极丑恶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屡刹不住，当然有复杂原因，但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法制不完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我们应当把文化市场的管理逐步引向法制化的轨道，完善各种法规，做到有法可依，有规可循，违者必究，并切实加强文化缉查、管理队伍的建设。这样，才能保证精神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

1992年以来，在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谈话的推动下，全国各地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出现了新的形势。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小平同志谈话精神，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更自觉地坚持两手抓的方针，并借鉴世界上一切有用的管理经验，进一步搞好精神文明建设，以推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坚持和全面贯彻，使我们的各项工作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

责任编辑：范英

---

（上接第33页）

的要求。总之，在总体上不降低要求，在某些具体方面则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各级领导对自己所辖地区不同的能力和条件应作分析，做到心中有数，分类指导，由低到高，分层推进，把文明村户创建活动搞扎实。各地在搞好文明村、户建设的同时，应结合开展文明镇、文明单位建设活动，这也是巩固和深化文明村、户创建活动成果的一个重要方面。城镇和乡村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城镇的精神文明建设搞得如何，必然会影响和辐射乡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各地应象南海市那样，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使城镇和乡村的创建活动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同步进行。

珠江三角洲是商品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强了经济实力，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丰厚的物质文明基础。但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如外来人口增多难管理，社会治安情况严峻，社会风气情况复杂等问题，给珠江三角洲的精神文明建设增加了难度。珠江三角洲是对外开放幅度较大的地区，对外开放扩大了人们的眼界，增强了人们的现代文明意识，但也不可避免地使西方某些腐

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随之而入，给珠江三角洲的精神文明建设带来困难。因此，要使珠江三角洲的精神文明建设不断跃上新的台阶，使之与蓬勃发展的物质文明建设同步，任重而道远。我们必须更加自觉地在“坚持”上下功夫。

邓小平同志在南巡重要谈话中指出，广东要力争用20年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谈话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一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对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珠江三角洲人应该更加努力，为完成不仅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而且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率先赶超亚洲“四小龙”的光荣任务而奋斗！

（梁渭雄、范英、孙云、周聘秋、叶金宝，由孙云执笔）

责任编辑：范 冯

# 广东群众性创建 精神文明活动的回顾与展望

蓝 红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在党中央和省委的领导下，我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积极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的方针，不仅物质文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而且精神文明建设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1991年，全省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和财政收入分别是1978年的6.4倍、6.9倍、4.7倍、4.4倍和4.5倍，达到3890亿元、3079亿元、1781亿元、1380亿元和177亿元。1991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1143元，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358元，分别是1978年的5.9倍和5.5倍。与此同时，我省的精神文明建设围绕全面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培养“四有”新人，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建设优美的环境，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总目标、总任务，在各个领域，尤其是群众性创建精神文明的各项活动，不断深入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回顾和展望我省群众性创建精神文明的各种活动，主要的做法和特点是：

一、围绕全面提高人的现代文明素质、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坚持不懈地抓好五项活动，形成全党动手，群众参与，各方配合，齐抓共管，共建文明，共促繁荣，同求进步的生动局面。

1. 抓好创建文明单位的系列活动。这一系列活动在我省由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街区、各行各业的文明单位、文明路段和文明户六个层次构成。

我们把抓好这一创建活动，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实践证明，这一工程抓好了，两个文明建设的各项任务，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落实到城乡基层，落实到千家万户，就有了牢靠的基础。为此，全省各地坚持不懈地采取如下四条措施，使这一创建活动由浅入深、由低到高、由局部到全面不断深入发展，逐步走上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一是化“虚”为实，制定和完善创评标准。

二是抓点带面，充分发挥榜样的示范作用（省委提出全省的精神文明建设要认真总结推广“两南”的经验，即城市街道的文明建设学习广州市海珠区的南华西街；农村的文明建设学习南海市）。

三是总结经验，推动创建活动不断上新的台阶（近10年来，全省召开大型的经验交流会就有4次：第一次是1984年6月，省委、省政府召开的“广东省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总结了一批创建文明单位的先进经验，表彰了19个特优文明单位、206个文明单位、760个文明建设先进单位、216个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第二次是1985年，省委在广州市南华西街召开现场会议，总结推广该街坚持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建设文明新街道的经验。第三次是在1991年4月省委召开的“广东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认真总结了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搞好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表彰、命名了199个文明单位和101个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积极分子。第四次是在1992年4月省委在南海市召开的“广东省创建文明户、文明村镇经验交流会”，系统地总结了南海市开展创建文明村镇、特别是创建文明户活动的经验，从而在全省掀起了创建文明村、户的热潮）。

四是完善机制，保证创建活动持之以恒。包括制定和完善动态管理机制、竞争机制、考核机制等。

由于全省各地坚持不懈地这样抓，现在我省已经出现了“同地而居，共建文明，共促繁荣”和“村村争创文明村，家家争当文明户”的良好风气，形成了自我约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激励，以多促少，同求上进的良好机制。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来，全省经县以上党委和政府表彰、命名的各类型文明单位已有近万个，文明户近百万户。省委要求，从1992年起，经过三、五年的努力，争取把全省大多数的农户创建成为文明户。

2. 抓好树立社会主义文明新风尚的系列活动。这一系列活动在我省由如下5个具有广东地方特色的活动构成。

一是窗口行业、服务单位深入持久开展的讲文明、讲礼貌，创“三优”（优质服务、优良秩序、优美环境）、评“三佳”（最佳服务员、最佳乘务员、最佳售货员）活动。这一活动从开展“友爱在车厢”、“诚暖顾客心”、“微笑服务使者”开始，发展到组织窗口行业、服务单位开展文明竞赛，有力地促进了我省服务水准和职业道德水平的提高。

二是在城乡特别是在农村广泛开展的以婚事新办、丧事简办为主要内容的移风易俗活动。在这一活动中，全省各地普遍建立起“婚事新办理事会”、“老人福利会”、“妇女禁赌协会”等群众性自治自律组织，使勤俭节约、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在我省许多地方蔚然成风。

三是全省范围内的讲公德、树新风活动。

在深入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的同时，根据我省的实际，省委于1989年初提出在全省树立“28字”文明新风的要求：“好学进取、团结友爱、诚实礼貌、健康文娱、卫生美化、勤俭办事、遵纪守法”。这七句话28个字，为树立社会主义文明新风尚作了规范，使树文明新风活动提到了更高的层次。

1991年又在全省城乡大张旗鼓地开展了社会公德大讨论。这一讨论活动历时一年，



直接参与讨论活动的人数达到2000多万人。通过讨论，广东干部、群众在如下6个方面形成了共识：

（1）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热爱人民，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不做有损于国格、人格的事；

（2）遵纪守法，遵守公共秩序，不嫖娼卖淫，不聚众赌博，不滋事斗殴，不搞封建迷信活动；

（3）爱护公共财物，维护公共利益，保护环境和资源，不损坏公物，不污染环境，不破坏生态平衡；

（4）维护公共卫生，维护环境的净化、绿化和美化，不随地吐痰，不乱扔脏物，不损坏花木；

（5）诚实守信，买卖公平，尊老爱幼，助人为乐，互谦互让，礼貌待人，见义勇为，拾金不昧，不说脏话，不要态度；

（6）移风易俗，新事新办，执行计划生育、不超生抢生，不铺张浪费。

四是各地分别开展的“文明在我市（县）”和市风、县风，以及城市精神、企业精神的大讨论活动。许多地方通过活动，确定了城市新风、城市精神、企业精神的内容，确定了市徽、市歌、厂歌、街歌，把群体的文明意识和风尚提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如广州市发动全市人民经过一年的广泛讨论和筛选，确定了“稻穗鲜花献人民”为“广州人精神”；“团结、友爱、求实、进取”为“广州市风”；还确定、公布了市徽、市歌，确定了“互敬互助，求知求乐，克勤克俭，爱国爱家”为“穗城家风”。

五是扶正祛邪，坚持不懈地开展扫除“七害”社会丑恶现象的斗争。近几年来，卖淫嫖娼，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拐卖妇女儿童，私种、吸食、贩运毒品，聚众赌博，利用封建迷信骗财害人和黑社会组织或带有黑社会性质的违法犯罪团伙等违法犯罪活动，在一些地方死灰复燃，屡禁不止，成了危害社会治安秩序，败坏社会风气，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声誉，玷污改革开放形象的一大公害，广大群众对此极为愤恨和不满。各地采取一系列措施加以打击和取缔，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七害”丑恶现象，为进一步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加快经济建设步伐创造一个稳定的良好的社会环境。

3. 抓好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的活动，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和投资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省把改善交通、通讯设施，兴办公益事业，建设优美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和投资环境，作为群众性创建精神文明活动的重要内容，使群众在关心、支持和参与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中，看到好处、得到实惠。我省依靠各方面的力量集资上百亿元架设公路桥梁，一举结束了靠船渡载车的历史，目前公路运输通车里程达5.5万公里，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公路网，使群众行路难、乘车难的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通讯事业发展迅速，1991年全省微波电路9736路，线路长度3841公里，城乡电话交换机

219万门，目前，全省95%的市、县（区）实现了电话程控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全省各地兴建了大批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和青少年、老人活动中心。从1980年到1990年10年间，全省共集资15.5亿元，建成各类改水工程13万多宗。到1991年底，全省89.9%的农村人口的饮水卫生条件得到了改善，其中50.2%的人口饮用了自来水。城乡居民的居住、工作环境明显改善。广大农村按照“村头标志化、道路沟渠硬底化、饮水自来化、厕所无害化、禽畜专栏化、保洁经常化、村头村尾绿化美化”的要求，广泛开展改水、改厕、改灶、改路、改造旧房和净化、绿化、美化环境的工作，使农村脏乱差的情况有了明显的改变，还涌现出了一批经济发达，社会进步，环境优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富裕、文明新农村。

#### 4. 抓好思想文化阵地建设。

加强思想文化阵地和教育、科学设施的基本建设，使传播和培育精神文明的“硬件”与“软件”建设配套发展，这是我省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头五年（即1978年至1983年），全省通过财政拨款、群众集资、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捐款办学的经费就达40多亿元人民币，新建、修建校舍3600多万平方米，相当于1978年前30年校舍总面积的2倍多。“七五”期间，全省科教文卫体等方面事业经费的支出比“六五”时期又增长了1.47倍。1991年，全省共有高等学校41所、各类中等职业技术学校909所，大中小学、职业技校、成人教育在校学生累计达到1150多万人。1983—1988年全省兴建的各种体育场馆达8262个，数量和质量均名列全国前茅。1991年与1978年相比，全省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广播电台、电视台分别增加了41个、78个、86个和37座。图书、报、刊发行量分别增长了1.7倍、4.8倍和9.3倍，分别达到2.9亿册（张）、15.3亿份和1.42亿份。医院病床增加了1.4倍，达到11.91万张。现有县级和县以上政府部门所属研究与开发机构502个、民办科研机构280多家，目前全省全民所有制单位共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66.4万人。全省还建设了一大批“四位一体”的乡镇文化站和乡村文化室。所有这些，为传播社会主义文明新风、培养“四有”新人，创造了越来越好的条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5. 抓好思想教育，以活动为载体，深入进行思想建设，寓思想教育于各种创建精神文明的活动之中。

我省各种群众性创建精神文明的活动，之所以经久不衰，始终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和旺盛的生命力，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注意加强活动的思想性，在于通过活动有效地促进了人们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促进了一代“四有”新人的成长，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物质文明的建设。在这方面，我省的做法，归纳起来，就是坚持育、导、建、管的有机结合，努力做到真、善、美的统一。

——“育”，就是培育，通过活动，达到培育一代“四有”新人的目的。

——“导”，就是引导、疏导，引导群众积极关心、支持和参与各种创建活动，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努力提升自己

的文明素质。

——“建”，就是坚持“一切着眼于建设”的原则，以正面教育为主，以弘扬先进典型为主，以关心人、塑造人为主。

——“管”，就是加强各种活动的管理，用社会主义思想占领各种活动的阵地。

注意在思想教育中，讲真话，办实事；与人为善，给人以温暖和鼓舞；以先进的思想，健康的活动，文明的语言，新颖的形式，优美的环境来影响人、熏陶人，努力做到活动的内容与形式的真、善、美的统一。

**二、注重实效，注意在各种创建活动中坚持五项原则。**

为了使群众性创建精神文明的各项活动收到实实在在的效果，我们注意在各种创建活动中坚持如下五项原则，尽量做到“虚”功实做。

一是坚持服务的原则。即注意把各种活动围绕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来进行，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这就是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提供智力支持和提供思想保证。

二是坚持育人的原则。即注意把树立一代文明新风、培养一代“四有”新人作为开展各种创建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注意处理好寓思想教育于活动之中与系统灌输、系统教育的关系；自我教育与积极引导的关系；扶正与祛邪的关系；以及有所引进与有所抵制的关系，等等，为一代“四有”新人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

三是坚持突出重点的原则。即注意每年或每个时期突出抓好一项活动作为重点，带动其它活动的开展，从而形成气候，收到大面积的效果。

四是坚持竞争的原则。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把竞争机制引进创建精神文明的活动之中，定期组织竞赛评比，是近几年来我省各地普遍实行的一条比较成功的做法。在这方面，我们注意抓好三个环节，即注意制定切实可行的竞赛标准；树立正确的竞赛意识；不断完善竞赛的检查、评比、考核、奖惩制度。

五是坚持群众性原则。物质文明是群众创造的，精神文明也是群众创造的；各种群众性创建精神文明活动的蓬勃兴起和方兴未艾，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广大群众的一项伟大创举。在各种创建活动中，我们注意着眼于群众，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总结推广群众中创造出来的实践经验，推动各种创建活动的不断深入发展。

**三、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在如下五个方面下功夫，把群众性创建精神文明活动推上新的台阶。**

邓小平同志在南巡重要谈话中指出，广东要用20年时间，力争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小平同志的谈话，不仅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进一步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而且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包括各种群众性创建精神文明的活动，必须坚决贯

彻邓小平同志的谈话精神，采取切实的措施，努力攀登新的台阶。就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省群众性创建精神文明活动的任务来说，我们认为要继续在如下五个方面下功夫：

1. 要在增强活动的思想性、开放性、服务性和实用性上下功夫。

加强思想性，就是各种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必须更加有意识地渗透思想内容，更有成效地寓思想教育于活动之中，使群众在关心、支持和参与活动中受到教育和熏陶。当前，我们要通过正在开展的各种创建精神文明的活动，加强党的基本路线和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宣传，使干部、群众进一步坚定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信心。我们的各项活动，必须紧密配合当前全党全省的中心任务，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经济发展步伐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我们认为，当前我们应当在全省响亮地提出一个口号，作为动员全省人民和海内外同胞万众一心，奋发努力，为赶超“四小龙”而共同奋斗的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

加强开放性，就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敢于和善于吸取全人类的文明成果，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用。

加强服务性，就是要通过活动，更好地为全面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服务，为一代“四有”新人的健康成长服务，为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服务，特别是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经济发展步伐，为赶超“四小龙”服务。这就要求我们要更自觉地增强服务意识，增加服务内容，开拓服务项目，使各项活动直接或间接地为实现党的中心任务服务。如举办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研讨会，举办科技讲座，开展科学技术的普及与咨询服务活动，组织基层单位的代表到外地参观考察，增长见识，学习外地加强两个文明建设的先进经验，等等。总之，只要我们开动脑筋，开阔视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服务性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加强实用性，就是开展精神文明建设的各项活动，要力戒空谈，力戒形式主义，要讲求实效，使群众得到实惠和好处。如在窗口行业开展文明礼貌、优质服务活动，不仅要达到提高干部、职工的文明素质的要求，而且要达到提高单位的信誉，增加收入，增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目的。创建文明户的活动也是如此，要使人们看到，创建文明户不仅可以使每个家庭享受到政治上的荣誉，而且由于家庭每个成员文明素质的提高，还有利于发展生产，增加家庭的经济收入。我们要避免就活动讲活动、就精神讲精神，而要善于化“虚”为“实”，变“软”为“硬”，使人民群众在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和好处中，增强参与开展精神文明活动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2. 要在建设一批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环境优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上下功夫。

当前，在我省一些地方，特别是在珠江三角洲的许多村镇已经提前实现了小康水平，在这些地方建设一批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环境优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新农村，不仅是赶超“四小龙”的客观需要，而且也是广大干部、群众的迫切要求。我们的创建活动，应当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群众的要求，把创建一批这样的新农村摆到突

出的位置上来。为此，我们要认真做好如下几项工作：

一是要引导人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抓住时机，进一步发展和壮大集体经济。

二是要按照农村工业化，农民居民化，乡村都市化，城乡一样化，管理现代化的要求，引导农民树立文明意识，提高文明素质，做好建设规划。

三是要抓点带面，先抓好一批样板，然后逐步推开。

四是要把普遍开展创建文明村、户、文明乡镇、文明街区、文明单位同建设一批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环境优美的新农村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城乡互相促进。

3. 要继续在扶正祛邪，坚持不懈地开展扫除“七害”等社会丑恶现象的斗争，树立社会主义文明新风尚上下功夫。

遵照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谈话精神，我们搞精神文明建设本身也必须坚持两手抓，即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七害”等社会丑恶现象；一手抓树立社会主义文明新风尚，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社会风气。这两手缺一不可，两手都要硬。要把清除“七害”等社会丑恶现象作为评选文明村户、文明街区、文明单位的重要条件之一，实行一票否决权。今后凡是“七害”屡禁不止的单位和犯有“七害”行为而又不思悔改的家庭不能评为文明单位和文明户。

要按照全省“八五”期间精神文明建设规划要点的要求，继续抓好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学生品德，家庭伦理道德的教育；继续深入开展社会公德大讨论和树立“好学进取、团结友爱、诚实礼貌、健康文娱、卫生美化、勤俭办事、遵纪守法”的文明新风系列活动；抓好以婚事新办，丧事简办为主要内容的移风易俗活动；联系实际，开展市风、县风，城市精神、企业精神的征集、评选以及宣传贯彻工作。总之，要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进一步提高全省人民的现代文明素质，提高全社会的文明进步程度，以适应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需要。

4. 要在进一步加强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宣传与研究，不断提高创建精神文明活动的水平上下功夫。

群众性创建精神文明活动，从1982年3月开展“全民文明礼貌月”以来，已经经历了整整10年。在这10年中，各种群众性创建精神文明的活动方兴未艾，呈现出千姿百态，万紫千红的发展态势，创造和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对人民群众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创建精神文明的宣传与理论研究，就我省来说，过去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但同宣传物质文明的情况相比，同精神文明建设丰富的实践活动相比，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宣传和理论研究仍然是个薄弱的环节，需要我们作出更多、更有成效的努力。

一是要充分发挥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研究中心的作用，切实搞出研究成果。

二是要开好“珠江三角洲的实践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研讨会，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省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经验。

三是加强对亚洲“四小龙”，主要是新加坡精神文明建设的了解和研究，拟定今后20年我省精神文明建设要着重抓好的若干问题的意见。我们认为，亚洲“四小龙”，特别是新加坡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有许多东西是值得借鉴的。如他们在全体国民中深入进行的内容为“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的共同价值观的教育，卓有成效地开展文明礼貌运动，以及建设优美环境和依法治理国家，把精神文明纳入法治管理轨道等等做法，都很值得借鉴。正如李瑞环同志于1992年3月在我省考察工作时指出的“新加坡这个国家，你进去之后就会感到它非常有规矩，有礼貌，文明程度很高。我认为其中很多是标志人类文明进步的共有的东西，而不是属于哪个社会制度的”，“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新加坡的社会管理，研究他们是如何把东方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建设结合起来的”。我们准备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们的实际，拟定进一步搞好精神文明建设的意见。

5. 要在进一步建立健全精神文明建设的机制，加强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指导上下功夫。

进一步建立健全各级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为其顺利开展工作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这是坚持两手抓的具体体现，是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请各级党委和政府给予大力支持。与此同时，随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日益发展，必须逐步把它纳入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管理轨道。因此，必须进一步建立健全竞争机制、考核机制和管理机制等等。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 责任编辑：范英

（上接第58页）

“出”自如的利用外资运行系统，使外资在双向循环中取得动态平衡。我国也可用少量的资本吸收多量国外的资本，减少对外的依赖性，保证整个外向型经济的良性循环。否则只进不出，从长远来看，必将使我国利用外资的效益受到限制。世界各国经验也表明，向外直接投资吸收国外资本，是一条有效的利用外资渠道，如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资本，一半以上都是利用国外的资本，利用外资的比例美国公司为44%、德国为59%、英国为44%、日本则高达82%、亚洲“四小龙”80年代以来亦采取各种措施促使企业向外投资，由此带动本国或本地区经济的发展。目前“四小龙”已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一个新主体，并成为东南亚最大的投资者，其成功之路正体现了利用外资——对外直接投资——深层次利用外资这一过程。广东的外向型经济正走向一个新的阶段，因

此应利用当前有利的时机和已造就的各种优势，进一步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利用外资，把利用外资的渠道向深层次拓展。

①参见法国经济学家佩鲁著作《The Pole of Development's Newplace in General Theory of Economic Activity》。

②目前，不但欧美国家发展经济圈，而且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集团化、一体化趋势也迅速发展，区域集团或一体化组织已多达二、三十个，新的区域集团还在不断产生，许多小区域集团又在酝酿建立范围更大、层次更高的一体化组织。因此，我们把这种经济称为“圈层”经济。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金系  
责任编辑：谭湛明

# 珠江三角洲创建文明村、户活动 迈上新台阶的若干对策

省社科联精神文明建设研究专题写作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带的两个文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的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文明村、户建设的经验，已经引起了全省人民的关注。因此，它面临着如何进一步总结文明村、户经验的问题，也面临着如何把文明村、户活动推上新台阶的紧迫任务。

我们认为，除了各级领导应进一步提高对这一活动的重要性的认识之外，必须在下列几个方面狠抓落实。

一、制订创建文明村户活动持久、普遍、深入开展下去的总体规划。

南海市开展创建文明村、户活动、东莞市长安厦岗管理区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抓规划、重管理搞村镇建设等经验说明，文明建设要向更高层次发展，不能没有一个好的建设蓝图，不能没有一个总体规划。精心制订好一个总体建设规划，明确近期和远期的目标，制定组织实施的方案，这对于各地文明村、户创建活动的深入开展，是至关重要的。

要制订一个好的总体规划，既要抓住群众急需解决的问题入手，又要放眼未来的发展。既要有近期的、较低标准的规划，又要有长期的、高标准的设想。比如，富裕起来的珠江三角洲农村的村镇建设、道路建设都应该考虑如何适应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长远需要，应该考虑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又如，现代文明新村的建设总体规划，既要考虑建设布局是否合理，又要考虑环境是否污染，耕地是否滥用；既要考虑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又要有利节约能源、美化环境，还要考虑如何适应科技、教育发展和文化传播、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

要制订好创建文明村户活动的总体规划，必

须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有针对性地狠抓薄弱环节，落实措施，改变面貌。例如，珠江三角洲一些市镇、乡村的社会治安情况依然严峻，这些地区在制订文明村户创建规划时，应配合治安管理部门对社会治安进行综合治理的计划和部署，把本地区社会治安的整治纳入文明村户创建活动的规划，并付诸实施。南海市在1992年4月召开的全省创建文明户、文明村镇经验交流会上被树为典型之后，针对本市有些地方社会治安“七害”现象严重的薄弱环节，在大沥镇抓点，配合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开展创建镇区文明单位的活动，取得较好效果。这种针对薄弱环节下功夫的做法，值得各地在制订规划时参考。

制订创建文明村户活动总体规划时，还要考虑订出实施总体规划的步骤和措施。要按步骤有计划地实施总体规划，就要抓好典型，以点带面，逐步推开，分批落实。所以制订规划要订出抓点带面的计划。如何选择有说服力的典型？中山市横栏镇的体会是，选择经济状况、地理条件、人口数量等方面仅处于中等水平的单位作为典型。如何推广典型的经验以促进面上对总体规划的实施？佛山市注意抓一点带多点，抓多点带一片的经验，值得重视。

要制订好创建文明村户总体规划，还要考虑与其他方面的规划相协调配合。例如中央和广东都有关于实现小康生活水平的标准和规划，我们制订文明村户创建规划时，必须考虑与之对应和协调。此外，制订规划应经过反复论证，以确定其是否具有可实施性和可操作性，等等。例如规划本地道路建设，就不能不考虑资金如何筹集，人力物力如何调配等因素，否则就缺乏可行性。

二、把提高人的素质作为文明村户创建活动

的根本任务。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教育人，提高人的素质。文明村、户创建活动作为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种活动形式，其根本目标和任务当然也是提高人的素质，培养一代社会主义新型农民。为此，必须加强文明村、户创建活动的思想性，有意识地在各项具体活动中渗透思想内容，以便更有成效地寓思想教育于活动之中，使群众在关心、支持和参与活动中受到教育和熏陶。同时，抓紧对人的文化素质的提高。

珠江三角洲许多地区创建文明村、户活动的经验证明，要提高人的素质，必须在文明村、户创建活动中把教、治、建、管这四个环节有机地结合起来。

教，就是把思想教育贯穿在创建活动的全过程。许多地方把创建和评比活动，作为对农民群众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集体主义、法制和社会公德教育的学校，使大家进一步坚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信心，增强了国家、集体观念和法制、道德观念。当前应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今年南巡重要讲话为武器，特别是要使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争取两个文明方面都赶上亚洲“四小龙”的思想深入人心，使之成为文明村、户创建活动的动力，以增强这一活动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要重视做好未评上文明户的群众的教育转化工作。有的地区在创建活动中提出，未评上文明户的农户和群众不应受到歧视，应该热情地对他们进行帮助和教育，向他们提供更多的迎头赶上的条件和机会。我们认为，这种指导思想 and 态度是正确的。南海市平洲镇市后村一村民，因夫权思想严重导致夫妻长期不和，结果在初评公榜时没有评上文明户。当他感到孤立和“脸上无光”时，村长关心地找他谈心，多方教育规劝他，使他痛下决心，改变了对妻子的态度，夫妻之间的尖锐矛盾终于完全化解。结果他取得了干部、群众的谅解，第二榜公榜时，他家被评上了文明户。

治，就是把创建活动与综合治理结合起来抓。许多地方在创建活动中，把搞好社会治安，打击取缔各种社会丑恶现象，消灭村容村貌方面的脏乱差等各方面综合治理的要求，融化在创建文明村户的条件中，实行统一领导，齐抓共管。这些好的经验和做法，应该坚持下去。

建，就是搞好思想文化教育阵地建设。在文

明村户创建活动中，许多地方下大决心投入资金、人力和物力，搞好思想文化教育阵地建设。南海市平洲镇两年内对全镇中小学教育投资达到1800万元，并先后集资800多万元，建起文化中心和文化室、有线电视、幼儿园、托儿所、老人活动中心等一大批思想文化教育阵地。这是提高人的素质的极其重要的基础措施。

管，就是加强管理。许多地方在创建活动过程中，建立起治安、交通、市场管理、市政监察、国土用地管理和卫生清洁监督等管理制度和管理队伍。东莞市长安镇厦岗管理区针对本地治安情况复杂的特点，建立了一支由25人组成的治安管理工作队伍，在村的四个出入口处和村中心共设置五个治安岗哨，治安队还配备了摩托车、无线电通讯等先进设施，加强了治安防范工作。

总之，在创建文明村户活动过程中，教育是根本，治理是重点，阵地是依托，管理是手段。应该把几个方面结合起来，发挥其综合作用，最终达到提高人的素质的目的。

三、进一步在农村的教育、科技、文化建设方面下功夫。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建设、文化建设和审美建设这三方面。我们说的提高农民群众的素质，既包括人的思想素质，也包括人的文化素质和审美素质，农民群众中部分人表现出思想觉悟不高，国家、集体观念薄弱以及缺乏社会公德心等等，往往是与他们的文化素质低下相联系的。

近年来，珠江三角洲各级领导对教育科技文化事业日益重视，但这种重视主要表现在文教事业的“硬件”建设上，如地方对教育事业的投资，校舍的改造和新建，先进技术和人材的引入和利用，以及图书室、文化室等的建立，都有了明显的增加和发展。例如，从1988年以来，南海市在教育方面的总投资接近7亿元，其中用在教育事业方面就占了5亿元。但是，在教育、科技、文化事业的“软件”方面，仍然比较薄弱。例如在教育领域，在社会的“尊师重教”风气，学生勤奋好学的学风，教学质量的提高以及学校为当地经济建设培养人材等方面，与内地许多经济发达或不够发达的地区相比，还没有自己的优势。在科技领域，在科技知识的推广和普及，当地科技人才的培养，把先进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少问题。这些现状，都要求珠江三角洲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更加重



视教育科技文化事业在质量方面的发展，为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素质而努力。

在文明村、户创建活动中，要在教育、科技、文化建设方面进一步下功夫，我们建议，可采取下面这些做法：

第一，在文明村、户创建活动中加强对教育、科技、文化的重要性、迫切性的宣传教育。应大量运用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活动中的实际事例，去对教科文的的重要性作生动具体的宣传。例如，前几年东莞市桥头镇投资200万元办了一间铸钢厂，曾因合作单位的技术人员离去，生产一度陷于瘫痪，只好与另一单位搞技术联营，引进技术，每年不得不将产值的25%、利润的40%分给对方。实践使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教育科技文化对于发展商品经济、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作用。

第二，建议在“文明村”的创评标准中明确加进“重视教科书”或“教育科技好”的条件，并把这一条件量化或“硬化”为一些具体要求：如村里不出现学生弃学的现象；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或中专要达到一定的百分比；村里每年抽出集体纯收入的一定百分比作为资助办学的经费，等等。

第三，在创建活动中与“星火计划”和“希望工程”相配合。“星火计划”是我国一项把科学技术引向农村的全国性计划，它的主要内容是：为农村培养技术人才，选定一批同农村乡镇企业相适合、见效快的示范性技术开发项目，以发展农村乡镇企业和农村种养殖业。“希望工程”是最近由国家教委和团中央发起的援助农村失学少年的计划，它主要是通过募捐等方式筹集资金以帮助因贫失学的学生复学。如果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一种主要方式的文明村、户创建活动，其活动内容却与全国大力宣传和推行的“星火计划”和“希望工程”脱节，这是不可理解的。是否可以在创建和评出“文明村、户”的基础上，特别列出“‘星火’模范文明村”、“‘星火’模范文明户”，以及“‘希望’模范文明村”、“‘希望’模范文明户”等单项进行评选，以对重视和支持教科文的文明村、户进行专门的奖励。

第四，立足于高起点，下决心增加智力投资，加强教育、科技、文化的“软件”和“硬件”建设。顺德市最近提出，要增加科技投入，每年不少于财政收入的1%，各镇每年从收取的管理费中提取10%作科技投入，企业在销售总额中提取

1—3%作科研经费。力争到“八·五”期末使科技人员占职工人数的比例，在目前占16%的基础上提高10个百分点；使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从1991年的40%左右提高到60%。在教育方面，争取到1998年基本实现普及高中，高中入学率要达到85%，争取2000年前办起一所市属大学。他们还规划搞好精神文明基础设施建设，城区要有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艺术馆，镇要有图书馆和文化中心；体育场所要适当增加。宝安县布吉镇坂田村大力投资搞精神文明的“硬件”建设，正在村里兴建的有1间医院、3个门诊部、3间小学、1间职业中学，准备兴建足球场、篮球场、文化室、康乐室、网球场等设施，可容纳2000人的两个电影院也在筹建之中。各地应该象顺德市和宝安县坂田村那样，立足于高起点，着眼于长远，下决心创造条件加大智力投资，搞好精神文明的“软件”和“硬件”建设。

四、树立现代化意识，把创建文明村、户活动与珠江三角洲的城乡一体化建设结合起来。

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目前珠江三角洲平均每70平方公里就有一座城镇，建制镇已由原来的32座增至434座；全地区居住在城镇的非农业人口达667万多人，约占全地区总人口的41%。

现在，在南海市、顺德市、中山市、东莞市等地的城镇，规模虽比不上大城市，但繁荣、清洁、方便却可与大都市媲美。以东莞市常平镇为例，这个镇每日商贾云集，4家豪华酒店、宾馆应接不暇。这个镇现有4000多门程控电话，平均每13人拥有一部，可与100多个国内城市和17个国家直接通话。现在的珠江三角洲交通方便，水泥公路通向每一个村镇，村里驱车到镇到县城，比广州市从东到西耗时还少。

珠江三角洲的乡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进程，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的：一是大办工商业，农民在自己的家园建设新型的小城镇；二是建设发达的交通网、通讯网，把乡村生活城市化。

然而，乡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不仅是一个物质文明建设的过程，而且与精神文明建设密切相关。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布局，必须考虑教育、科技、文化娱乐、体育卫生等设施的配置；在管理上良好的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交通及环境秩序的建立和维护，都必然涉及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因此，以创建文明村、户为主要形式的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与城乡一体化建设相结合是必

要的。

我们建议，在结合城乡一体化建设开展文明村户创建活动，要以现代化意识作指导，综合规划，统筹安排。考虑文明村镇的建设规划，要充分估计到珠江三角洲乡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树立现代文明意识，突破昔日那种只适应小农耕作和小农生活方式的封闭型、单功能缺配套的旧村庄建设模式。要有现代的长远的眼光，综合规划，统筹安排，把村庄建成既是开放型的、同时自身又是功能齐全配套的现代文明新农村。所谓开放型，就是要与四周不断崛起的新兴城市群体相衔接来考虑道路建设，以及商店、市场、厂房、学校、医院、公园等的布局和设置。所谓功能齐全配套，就是充分考虑到本地农村城市化的发展趋势，根据可能的条件，逐步把本地村庄建成功能齐全配套的小城镇。现在的东莞市长安镇厦岗管理区，除了有整齐宽阔的街道以及规范有序的标准厂房群落之外，村中还建起了酒楼饭店、商贸市场、农贸市场、学校、卫生院。按照他们的规划，准备把管理区划分为住宅区、工业区、商业区、文化娱乐教育区。他们规划主要街道30米宽，横街20米宽，两旁装上华灯，栽种绿化带，并计划建起文化康乐中心和农村公园。

我们认为，现在珠江三角洲许多地区经济实力雄厚，在经济能力允许的情况下，把城市和村庄建得漂亮一些、繁华一些、服务功能齐全一些，这与浪费和“讲排场”是不同的。相反，按照现代文明的标准建设城镇和乡村，将更能适应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和商品交换的需要，更能适应对外引进资金、人才和技术的需要，更能适应科技文化传播、丰富群众文化娱乐生活的需要，符合农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五、创建一批，巩固一批，由低到高，分层推进，坚持不懈。

广东省委和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经过研究确定，1992年我省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重点是有领导、有步骤地抓好创建文明户的活动，并争取在1995年把全省大多数的农户都创建成为文明户，同时继续推进文明村镇和各行业文明单位的建设，以此带动和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全面发展。

南海市及珠江三角洲其他市县开展文明村、户创建活动的实践表明，珠江三角洲的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方向对头，基础扎实，已经走在省内其

他地区的前列。今后，珠江三角洲创建文明村、户活动要上一个新台阶，应该做到创建一批，巩固一批，由低到高，分层推进，坚持不懈。

创建一批，巩固一批，就是要更加脚踏实地，注重实效，不要盲目追求进度和数量，不要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南海市成为全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学习典型后，一方面更加虚心地向广州市南华西街及其他兄弟单位学习，另一方面抽调干部组成工作组到大沥镇抓点，配合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抓好镇一级的精神文明建设，这既是做好已取得的精神文明成果的巩固工作，又是南海市精神文明建设的进展。原来未开展文明村、户创建活动的地方，应迅速进行规划，抓好试点。原来只在试点而未铺开的地方，应尽快协助试点单位取得经验，尽快推开。原来已普遍开展了创建活动的地方，要做好文明村、户的巩固和提高工作。各地在开展创建活动中，一定要注意不要降低文明村、文明户的标准。要按照《广东省文明单位管理暂行条例》规定的基本条件，切实做到政治思想好、生产工作好、社会风气好、阵地设施好、环境建设好。各级领导应下功夫把好检查验收这一关，做到创建一批、验收一批、巩固一批。

由低到高，分层推进，是指对经济条件、自然条件不同的地区，在要求达到创建文明村、户的某些标准和条件方面，可以按照高低快慢的要求区别对待。例如，南海市创建文明户的十条标准，这是不管经济条件、自然环境如何，各地都是应该而且可以做到的，在这方面不能降低标准，降低了就不成为文明户了。南海市对文明村的“六好要求”，也是各地都应该而且是可以做到的，否则也不成其为文明村了。但要达到对文明村的“七化标准”要求，的确有个经济条件问题。对经济实力较强的地区，可以按南海市的标准严格要求。但对于经济较落后的地区，就可以作具体分析。例如，南海市要求文明村做到“道路沟渠硬底化”的“硬底”是指铺水泥，经济条件差的地方能做到砖石铺底或沙石铺底，也可以说是达到标准了，待以后有了钱再搞水泥铺底。经济条件再差一些的地方，甚至可以暂时不搞“村头标志化”、“禽畜专栏化”，而可以先要求做到“厕所卫生化”、“保洁经常化”以及“村前村后美化与绿化”等等。待经济条件具备了，再提出新的更高

(下转第21页)

# 镇级城区精神文明建设的初步探索

——南海市大沥镇的做法与体会

关性乔

为了加强镇级城区的精神文明建设，使之与农村文明户、文明村建设相促进，我市从机关文明委、宣传、政法、工商、劳动、文化等部门单位，抽调了10多名干部，组成工作组，选定以大沥镇城区为先行点，会同大沥镇党委，开展了创建文明城区的试点工作，努力探索加强镇级城区精神文明建设的路子。

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紧紧抓住当前除“七害”这个重点，针对城区各经营单位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认真贯彻“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原则，狠抓教育人这个根本，端正服务方向，大力开展创建文明经营单位（户）活动，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据统计，1992年3月份城区发案82宗，6月份33宗，比3月份下降59.75%。另一方面，在进行打击处理的同时，我们还以城区的发廊、旅店、饮食店和娱乐场所等服务行业为重点，通过反复教育，进行整改，在普遍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开展了创建“文明经营单位（户）”的评比活动，到1992年7月底止，“四大行业”先后分两批，共评选出“文明经营单位（户）”216户，占参评总数的82.1%。通过综合治理，净化了社会风气，进一步树立了社会文明的新风尚，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有力地促进了城区两个文明建设的深入发展。

## 一、从调查研究入手认识城区的特点和现状

工作组进驻大沥之初，面对偌大的城区，如何开展工作把握性不大。为此，我们确定先从调查研究入手，通过认识城区的特点和现状，并据此制定工作方针和办法。

通过调查研究，使我们对城区的特点、地位以及当前存在的问题等方面都有了较深刻的认识。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大沥城区发展很快。

1984年前，它的面积只有0.62平方公里，城区内仅有3条小街。现在城区面积已扩大到近2平方公里，并拥有大小马路33条。城区人口也从1984年的800多户，3000多人，增加到现在的3500多户，常住人口1.5万多；加上暂住人口，共有2.3万多人。

这一新发展起来的城区，既不同于农村，又不同于大、中城市。农村是处于相对的“静态”；大、中城市虽有发展，但户口一般不易迁入，也相对稳定。而镇城区则处于“动

态”之中。人口天天增多，店铺天天增多。同时，人口有出有入，店铺有开有停。进入城区的人，有本地的，也有外地的；有山区的，也有平原的；有农民，也有城市居民；还有吃自理粮的。但大部分都是“洗脚上田”的农民。因此，它是在改革开放，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新的形势下形成的一种既不是纯粹的农村，又不是纯粹城市的新的社会形态。

二是其所处的地位十分重要。

它是全镇的政治、经济和人们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城乡联系的交汇点，是农村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改革开放对城区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比如商品经济首先在城区活跃起来。商品观念、价值观念和竞争机制亦先在这里形成。人们通过在城区的活动，可获得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更新。

但是“窗口”打开了，在吹进新鲜空气的同时，也飞来了“苍蝇”，一些丑恶的东西便不可避免，“七害”现象往往集中反映在城区。大沥镇1991年抓获嫖、赌、毒、黑等“七害”分子573人，1992年1至4月份又抓获了284人，其中70%都出自城区。

三是当前深入除“七害”，必须以发廊、饮食店、旅店和娱乐场所为重点。

我们的调查发现，发廊、饮食店、旅店和娱乐场所这“四大行业”是最容易产生“七害”的地方。据统计，大沥镇整个城区有109间发廊，104间饮食店，19间旅店，60间（档）娱乐场所，合计292间。从业人员达2200多人。在这“四大行业”中，大部分是属个体户。我们感到，“四大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两个。

一是利用色情招徕生意，诱发嫖娼、卖淫等丑恶东西滋生。

有的发廊设置暗隔、按摩床等设施，搞异性按摩。1991年曾清理过一次，并没收了108张按摩床和拆除了一批暗隔，但很快又死灰复燃。1992年初检查时，又发现44间发廊重设按摩床或暗隔。有5间饮食店共装修了60间暗房，提供色情活动的场所，并雇请一批外省女工搞淫亵活动，实行高价收费。有的旅店还容留妇女进行卖淫活动。

二是少数娱乐场所经营不健康的项目。

如有的书报摊出售黄色书刊或黄色音像带。有2间娱乐中心用出售筹码，开设抛“色子”等变相赌博项目，坑害青少年，干部群众对此反应强烈。

通过初步调查，我们认为在城区除“七害”，搞精神文明建设，抓住“四大行业”作为治理整顿的重点，是可行的、有效的。

## 二、坚持标本兼治，积极开展创建文明单位活动

在整个工作过程中，我们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原则，积极开展创建文明单位活动。

一是抓打击。

对少数屡教不改，甚至顶风作案的“七害”违法人员，实行严厉打击。近几个月来，市政法部门先后在该镇范围内进行2次大的清查行动，10多次突击性的小清查行动，并先

后在城区召开了两次宣判大会。依法判处了3名罪行严重的赌头和2名容留妇女卖淫的罪犯；逮捕11人及送劳教的嫖客、妓女及淫亵人员一批。端掉了多个赌博的黑窝和一批卖淫嫖娼的窝点。如一旅店的老板关××，长期在店内聚众赌博，自己从中“抽水”，又纵容妇女卖淫，自己还参与嫖娼活动。又如一饮食店的老板潘××，在店内装修暗房，私招外省妹，提供色情场所，从中赚钱。对于这些严重违法人员，一律依法严肃处理。通过一系列的打击活动，使城区的“七害”活动得到了控制，有效地净化了社会风气。

### 二是抓教育。

在开展活动中，我们紧紧抓住教育人这个根本，先后举办了4期服务行业法制学习班。参加学习的业主近300人。学习班坚持贯彻学习辅导与自我教育的原则，做好“三个教育”。

一、对各业主进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教育。向他们讲清楚，只有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才能使城区经济迅速发展，才有服务行业的繁荣兴旺，才有他们劳动致富的机会。并讲清楚党和政府关于工商、财税等政策是允许并鼓励他们存在和发展的，因此，各业主主要诚实劳动，合法经营。

二、对业主进行法制教育。由工作组领导负责上法制课，组织他们学习《宪法》有关《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条文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规定》、《广东省关于严厉打击“七害”活动的通知》以及省、市有关城乡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劳动管理办法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此外，为了加深他们的认识，还联系实际，解剖案例，并组织典型在学习班上现身说法，提高他们的法纪观念。

三、对业主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向他们讲清楚服务行业最重要的职业道德是搞好服务质量，以优质服务来发展自己。教育他们坚持走正道，勤劳致富，遵纪守法，不要以邪门歪道来赚钱，害人害己。

通过办班学习，使各业主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大大增强了法制观念。如有30间原来存在问题较多的发廊业主，通过学习，提高认识后，主动写了整改保证书；有的业主在检查自己错误的同时，找工作组的同志大胆揭发一些店铺业主的不法行为。有的要求在今后搞检查评比，在城区要设置检举箱，实行互相监督。

### 三是抓创建。

我们在狠抓打击和宣传教育的基础上，在“四大行业”中开展了创建文明经营单位（户）活动，以此抵制“七害”沉渣泛起，树立社会文明新风尚。具体做法是：

一、结合实际，制订标准。通过召开业主座谈会和各阶层代表座谈会等形式，在广泛征询“四大行业”业主和有关部门领导意见的基础上，制订出包括工商、劳动、公安、环保、卫生、文化、广播、计生等部门对各业主基本要求的“十要十不要”的评选标准。主要包括：

1.要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和政策规定，文明经营，不搞违法经营活动，员工没有违法犯罪行为。

- 2.要按照营业执照核定的经营项目经营，不要超越经营范围。
- 3.要做到自己领取营业执照，自己经营，自己上岗，不要转借、出租、出卖营业执照。
- 4.要遵守劳动部门的用工管理规定及时为雇工申报户口，亦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不要擅自招用外省工人。
- 5.要执行物价规定和税收政策，不要随意抬高收费标准和偷税、漏税、拖欠税款。
- 6.要诚实经营，不要设暗厢、按摩床、“三陪”（陪酒、陪舞、陪唱）和以色情、异性按摩、聚赌（或变相赌博）及其他邪门歪道招徕生意。
- 7.要做到优质服务，员工上岗仪表整洁，礼貌待客，不要拖拉懒散，怠慢顾客。
- 8.要遵守卫生管理规定，有健全的卫生保洁制度，门前“三包”（卫生、绿化、交通秩序）落实，店内保持整洁，不要出现脏、乱、差现象。
- 9.要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积极参加募捐、赈灾等公益活动，不要做损害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的事。
- 10.要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规定，育龄对象自觉落实计划生育措施，不要超生、抢生。

二、宣传发动，明确标准。我们结合举办法制学习班，向各业主讲清楚评选文明经营单位（户）的意义、做法和要求，并积极动员他们踊跃参与。

三、填表自报，检查验收。由各业主填报《文明经营单位（户）申报表》，再由评选领导小组检查验收，最后集中评议、审核、通过。

四、张榜公布，送牌上门。对被评为文明经营单位（户）的，张红榜公布，并利用城区有线电视《大沥新闻》栏目中进行播放通报，广泛征询意见，实行社会监督。最后由领导小组统一订制文明经营单位（户）的荣誉牌，并敲锣打鼓送牌上门。这一做法深受业主们的欢迎，他们高兴地说，开展评选文明经营单位（户）活动，可以提高我们的职业社会地位，我们要珍惜荣誉，一定要文明经营。

为使创建活动积极稳妥地开展，我们还制定文明经营单位（户）动态管理的措施。

第一，文明经营单位（户）每月考核一次，每季复评一次。违反标准的，视其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或摘牌处理。

第二，对于文明经营单位（户）的评选，如第一次评不上的，给予警告；第二次又评不上的，责令停业整顿；第三次还评不上的，则扣缴或吊销营业执照。触犯法律规定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三，以后凡是申请开业的，要先到城区办事处学习文明经营单位（户）的有关规定，签订创建保证书后，然后考虑是否准予开业。新开业的，从严要求，必须在3个月内达标，否则扣缴或吊销营业执照。

四是抓管理。

城区的根本问题是个管理问题。前段时间，城区的一部分行业之所以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主要是一些主管部门力量不足，工作忙不过来，该管的事情没有管好。针对这

一情况，为改变城区这个现状，我们特采取了如下几条措施：

一是加强城区的领导力量。由镇委安排，增派一名副镇长专管城区的精神文明建设。

二是强化城区办事处的人员配备。在办事处的政工行政管理办公室增加6名工作人员，新组建城监队23人，专门负责管理创建文明经营单位（户）活动和其他有关管理城区的具体工作，并建立工作人员的岗位责任制度。

三是要求城区所有企业单位，切实贯彻执行“谁主管，谁负责”和“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办好自己的事”的任务要求，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岗位责任，为建立城区的优良秩序，促进两个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 三、在实践中的几点体会

经过几个月来的实践，我们有如下几点体会：

一是抓好文明城区的建设，必须不断提高各级干部的认识。

经过几个月来的实践证明，各级干部对除“七害”，建设文明城区的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深度如何，直接关系到整个工作的开展情况。过去城区开展除“七害”，进行过多次打击，是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效果不够理想。主要原因是有些单位领导对“七害”的危害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有些同志在思想认识上存在“难免论”的看法，认为城区交通发达，商品经济活跃，人、财、物大流动，出现嫖娼卖淫、聚众赌博等现象在所难免。有的甚至错误地认为出现这些现象，正是繁荣兴旺的表现，因而思想糊涂必然带来行动的松懈，打击不力，

其次，在行动上表现重治“标”，轻治“本”，只满足一时的打击行动，而对治“本”，抓教育人这个重要方面，未有下真功夫。

第三，在管理上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每次行动像“刮一阵风”，未能很好巩固。

由于上述的种种原因，一度使城区的“七害”活动抬头，禁而不止，且有蔓延之势。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首要的一条，就是抓教育，提高各级领导的认识。我们做到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包括省、市、县驻大沥城区的各个部门、各基层单位的领导，反复学习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精神，并结合学习省委谢非同志在省政法、公安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紧密联系实际，认真领会精神实质。通过学习讨论，使不少同志澄清了模糊思想，加深对“七害”危害性的认识，增强了对除“七害”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大家一致认为，“七害”成了当前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拦路虎和绊脚石。不除“七害”，就不能把邓小平同志南巡的谈话精神贯彻到底；就不能把两个文明建设搞上去，即使我们过去做过一些工作，取得一些成绩，也会前功尽弃。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大家表示，下大决心，用实际行动，共同投入抓好城区的综合治理，既要大扫“七害”，又要狠抓教育人这个根本，广泛开展创建文明活动，为建设一个经济繁荣文明整洁的新城区而努力。

二是抓好文明城区的建设，必须齐抓共管，进行综合治理，才能打开新局面。

创建文明城区牵涉面广，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不是一个部门能够完成的，而必须贯彻以属地管理为原则，实行以块为主，条块协同配合，各行各业一起抓。只有这样，实施综合治理，创建文明城区才能迅速打开局面。几个月来的实践证明，在镇委统一领导下，由镇政府的派出机关——城区办事处牵头，取得工商、劳动、交通、公安、城建、卫生、文化等各有关职能部门的共同配合，形成合力，齐抓共管，对整个城区进行综合治理，建设文明城区，就能顺利进行，效果显著。反之，各自为政，力量分散，孤军作战，形成不了气候，就难以打开局面。

三、抓好文明城区建设，必须实施建章立制，逐步走上以法治镇的轨道。

实践使我们认识到，除“七害”，综合治理，建设文明城区，只有抓好建章立制，才能巩固和发展创建的成果，从而逐步走上以法治镇的轨道。不然，只抓创建，没有建章立制作保证，开展创建就不能持久，甚至会流于形式。为此，一开始，对大沥城区进行整顿治理，我们就抓住“四大行业”为突破口，引导他们明确目标，制订标准，建立制度，开展创建文明经营单位（户）活动。与此同时，对整个城区的各行各业，重申明确要求，全面贯彻执行近年来由镇人大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强大沥城区精神文明建设管理暂行规定》、《关于大沥城区市政设施管理规定》、《关于加强大沥城区交通管理规定》，使这一系列法规作为对城区综合治理，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依据，在实施中，树立其权威性。此外，还切实抓好管理队伍的建设，调整充实力量，使创建文明城区，走上以法治镇的轨道作出有力的保证。

作者单位：中共南海市委

责任编辑：范英

---

（上接第43页）

社会发展的战略规划，舍得花钱加强政法工作，从人财物各方面支持政法部门一心一意为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保驾护航。这方面主要是：

舍得投入改善政法部门的交通、通讯和技术装备，提高快速反应能力。顺德市从1987年以来就投入1433万元，为公安机关购置枪枝、警械、通讯、技侦装备和交通工具，提高了公安干警应付各种突发事件和侦察破案的能力。

由地方财政出钱招收地方民警，缓解警力不足的困难。四市在编公安干警一般只占总人口的万分之三左右，派出所原按一镇一所设置，警力和建制已远不适应日趋繁重的治安保卫任务。为解决这些困难，他们由当地财政出钱招聘地方民警，组建农村墟镇派出所。南海市已从1985年的5个公安分局、17个派出所增至现在的13个分

局、42个派出所，招收地方民警1100名，每年由地方财政支付工资及办公费约4000万元。

舍得花钱搞技术防范。近年来，四市在维护社会治安中，把人防和技防结合起来，投入大量资金建立技术防范网络，如安装闭路电视监控系统，防盗防抢报警装置，电动防控铁闸门和汽车、摩托车防盗装置等。1987至1991年，中山、东莞两市在这方面的投资就分别达367万元和1080万元。

作者单位：广东省委政法委员会

责任编辑：石成



# 转变观念，服务经济

——广东“四小虎”政法工作的实践与特色

郑 红

13年间，顺德、中山、东莞、南海四市经济飞速发展，除了有其优越的地理人文环境之外，最根本的是靠党的改革开放政策，靠当地党委、政府的强有力领导和干部群众的艰苦奋斗；同时也离不开作为人民民主专政重要工具的政法机关的保驾护航。改革开放以来，四市政法部门彻底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牢固树立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转变观念，大胆探索，为当地的两个文明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树立“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观念，全力为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和投资环境。**

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需要一个良好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如果社会秩序不好，治安乱糟糟，人们就无法集中精力搞建设，外商也不敢来投资办厂，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就难以顺利进行。因此，当地政法部门充分发挥专政机关的职能作用，狠狠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坚决扫除各种丑恶现象，维护治安秩序的稳定，并把这项工作看作是政法工作为经济建设提供的最重要的保证。在具体工作中，他们自始至终着力抓了以下两条：

一是坚决打击各种危害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违法犯罪活动，立足于为优化投资环境创造条件。首先对那些杀人、抢劫、爆炸和重大盗窃等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坚决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努力遏制这类案件发生。这些年，坚持每年大抓几次，集中打击和专项斗争相结合，专门工作和群众路线相结合，破大案，挖团伙，打流窜，特别是对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流氓团伙、车匪路霸团伙，露头就打，不使其形成气候，并使这些严重刑事犯罪案件逐年有所下降。人们普遍有安全感。对那些直接破坏经济建设特别是盗窃生产物

资设备的犯罪活动，他们高度重视，及时打击，维护正常的生产秩序。东莞市1990年发生盗窃程控电话线案件31宗，盗窃变压器案件25宗，盗窃电线电缆案件11宗，一些企业因通讯、供电中断，影响了生产；该市政法机关立即抽调精干力量开展侦破，不到半年就破获了盗窃通讯、电力设备的团伙7个，抓获成员38名，并依法从严惩处，有效减少了这类案件。1991年，同类案件分别比上年减少96.78%、80%和45%。此外，他们还把除“七害”、扫除社会丑恶现象、搞好社会风气作为优化投资环境的重要一环紧抓不放，哪一害严重就重点扫除那一害。今年以来，他们以实际行动落实邓小平同志年初南巡的重要谈话精神，上半年共查获卖淫嫖娼人员1875名，吸贩毒、赌博等其他“七害”人员8274名，新建了一批收容教育场所，对抓获的卖淫嫖娼人员一律收容劳动教育，使卖淫嫖娼蔓延发展的势头得到了遏制。由于坚持不懈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连续不断扫除社会丑恶现象，这些年四市治安稳定，秩序良好，外商投资有了一个更安定的环境。仅东莞市今年第一季度就新签各种利用外资项目协议386宗，实际利用外资8961万美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43.5%和57.6%。

二是以乡镇企业作为治安工作的重点，致力于在企业内部创造一个能够保障企业生产良好运转的治安小环境。据1991年底统计，四市乡镇企业已发展到5.63万家，从业人员100多万人，其产值一般占当地工农业总值的60%到80%，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早些年，乡镇企业特别是“三资”和“三来一补”企业，内部治安问题比较突出，主要是盗窃案件多，火灾事故多，严重制约了企业经营发展。四市政法部门认识到，乡镇企业的治安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当地的治安局

势，如果企业内部没有形成良好的治安“小环境”，当地治安稳定的“大环境”必将受到影响。为此，他们及时调整工作布局，把治安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乡镇企业上来，把稳定企业治安作为创造良好治安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来抓。采取了如下措施：（1）帮助企业组建安全保卫队伍和消防队伍，加强管理教育，严格训练，提高企业自防、自卫、自治能力。东莞市1986年普遍建立了乡镇企业保安队，逐步实现“企业保安化”，至目前共有企业保安队（护厂队）2998支14392人；还建立专职消防队84支，有专职消防队员285人，消防车36台。（2）不断健全安全防范责任制。主要是建立健全内部各种规章制度，推行安全生产责任制和治安防范岗位责任制，落实治安责任人。顺德市3711家乡镇企业，有90%建立了安全保卫责任制，设治安责任人，治安的好坏同经济利益挂钩，奖罚分明，责任落实。（3）定期开展安全大检查，消除隐患，堵塞漏洞，确保安全。（4）注意搞好企业周边地区的治安，开展区域联防，为企业排除外部干扰，净化内外治安环境。此外，对在乡镇企业特别是“三资”企业发生的案件做到优先立案，优先侦查，优先审理结案，保护外商的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这几年，四市乡镇企业内部的治安秩序“小环境”明显改善，刑事案件和治安灾害事故都较少发生。顺德市乡镇企业这几年发案数仅占全市发案总数的8%左右；火灾事故逐年减少，有80%的企业做到无案件、无事故、无职工违法犯罪。

## 二、树立既要坚决打击，又要敢于保护的观念，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顺利发展。

改革开放，冲破了过去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出现了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经济结构，市场调节在四市国民经济中占了相当比重，在某些领域甚至起了主导作用。四市政法部门认识到，政法工作要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必须适应发展市场经济的新形势，对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有利于人民富裕，有利于市场繁荣的经济行为，就要旗帜鲜明予以支持保护；反之就依法限制直至制裁。为此，多年来他们坚持了这样一个原则：该依法打击的坚决打击；该依法保护的大胆保护，特别是注意敢于保护在改革开放、搞活经济中勇于开

拓、敢闯敢试、做出贡献而又偶有失误的人和单位。

一是立足于保护乡镇企业的发展。如顺德市检察院专门制订了《保护和促进乡镇企业经济发展的十项措施》，明确规定“保护勇于改革的乡镇企业干部，支持他们开拓创新，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对企业的一些偏离经济政策的行为或因经验不足而产生的某些偏差和失误，不轻易当作犯罪追究”；“依法保护科技人员到乡镇企业的兼职活动”；等等。该市对涉及乡镇企业的案件，慎之又慎，不随意收缩企业资金、冻结银行帐号、查封企业财产，不轻易对企业负责人、技术骨干采取强制措施，不因查处案件而中断企业正常生产和流通。这些做法，受到了乡镇企业的欢迎。

二是正确执行政策法律，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为发展经济创造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四市乡镇企业多，在原材料供应、资金筹集和产品销售等方面，都要靠市场调节，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因此遇到不少政策法律问题。为了正确区分经营活动中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或犯罪的，四市政法部门普遍深入企业调查研究，制订出具体规定，报党委、政府或人大批准执行。这些政策法律界限大致是：把企业购回自用有余的原料进行调剂余缺与投机倒把行为区别开来；把经济活动中的交际开支同贿赂行为区别开来；把代购原料、代销产品提取一定比例的费用或酬金同贪污受贿区别开来；把厂长、经理依据承包、租赁经营合同所得的报酬、奖金同贪污公款区别开来；把政策法律无明确规定而企业为搞活经济、发展生产所采取的做法同违法生产经营区别开来；把由于不熟悉税收法规的漏税行为同有意偷税逃税区别开来；把正常经营中的拖欠同诈骗区别开来；把因经验不足而产生的某些偏差和失误同渎职犯罪区别开来；等等。这些具体规定，给乡镇企业的干部吃了“定心丸”，使他们可以放开手脚，大胆开拓试验，依法经营。

三是积极开展司法建议、法律咨询工作，扶持企业发展生产。四市政法部门结合办案，对一些企业在规章制度、经营管理、安全防范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时提出“司法建议”，帮助他们立章建制，堵塞漏洞，增强防范能力和提高经济效益。中山市政法部门1985至1991年向企业提出各种司法建议375份，其中被采纳的315份；还向党、政府和人大送了有关保护经济发展和预防

经济犯罪的报告30多份，其中被批转的20多份。顺德市政法部门主动上门为企业提供法律咨询，排忧解难，还举办厂长、经理法制学习班23期，培训厂长、经理2500多名。这些活动，受到了经济部门的好评，广大企业干部称赞政法机关既是经济犯罪的“克星”，更是企业发展的“保护神”，是厂长、经理的知心朋友和法律“向导”。

### 三、树立依法治理的观念，充分运用法律手段调节经济关系，提供法律保障和法律服务。

四市政法部门认为，在加快改革开放、扩大经济交往的过程中，需要用法律手段来调整的经济关系越来越多，各种经济活动对法律服务的需求也愈加强烈。充分运用法律手段调节各种经济关系，使之纳入法制轨道，同时优化法律服务，是政法工作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为此，他们积极参与经济活动，运用法律制约和引导各种经济行为，主动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和法律服务。重点抓了三个环节：

依法及时妥善处理各类经济纠纷案件，保证经济活动正常运行。近年来，各类经济纠纷如合同、承包、租赁、经营、债务等案件不断增多。四市政法部门从有利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出发，积极扩大受理范围，依法及时审结。特别是对国营大中型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发生的纠纷，乡镇企业尤其是“三资”、“三来一补”企业的纠纷，涉外、涉港澳的经济纠纷和涉及清理“三角债”的纠纷，以及容易导致矛盾激化的农村承包合同纠纷，做到优先立案、优先审理、优先执行。1985至1991年，四市共审结各类经济案件8191宗，解决诉讼标的金额121.23亿元，使大批因争议而呆滞或影响使用的巨额资金、物资重新投入使用，发挥了经济效益，还使一些濒临破产、倒闭的企业恢复了生机。在办理这些案件中，他们坚持在严格执行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注重社会效果和经济效益，选择最佳的处理方案，达到缓解矛盾，稳定社会，促进生产的目的。东莞市近年来把乡镇企业特别是“三来一补”、“三资”企业经济纠纷作为审理重点，1990年至1991年就审结92宗，解决诉讼标的9900万元。他们本着“审理一宗经济纠纷案件，招来一批投资者；力戒审理一宗案件，打跑一个客商”的原则，注意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处理。对于投机商、皮包商欺

诈我方，造成合同不能履行的，及时裁决或通过调解终止合同，以便将土地、人力、设备投放新的生产。对于真诚来投资，一时欠款或因某些客观原因暂时停产酿成纠纷的，不仅认真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还注意帮助其克服困难。如他们采取财产保全这一措施时，一般都采取扣押不准转移，但可以进行正常生产的做法，从而达到诉讼保全的目的，又使债务人避免了因查封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这两年，东莞政法部门扶持或救活了濒临倒闭的“三资”企业4家，“三来一补”企业6家。这10家企业在诉讼期间继续生产经营，获利润人民币250万元，创汇120万美元。

大力加强律师公证工作。他们努力拓新律师公证的服务领域，增加服务项目，扩大服务覆盖面。1985至1991年，四市律师担任企业的常年法律顾问达479家，为企业办理经济法律事务25075件，协助企业清理债务近10亿元，代理诉讼民事案件2806宗，代理诉讼经济案件3024宗，避免和挽回经济损失8亿余元。公证工作从过去办理一般公民权利业务方面的公证发展到开展经营承包、企业租赁、法人资信、补偿贸易、金融借贷、担保抵押、拍卖清算和工程招标投标等100多个项目的公证。特别是努力办好经济合同公证，保障合法经营和企业合法权益。1985至1991年，四市政法部门为企业办理经济合同公证69667件，其中涉外经济合同公证1818件。在开展律师公证等法律服务工作中，四市注意把服务重点放在促进外向型经济方面。中山市司法部近年来积极为200多家“三资”企业提供法律服务，其中担任27家企业常年法律顾问；为35家企业代理诉讼和非诉讼经济案件63宗，争议标的总额8000多万元，避免或挽回经济损失2200多万元；为60家企业办理各种公证1200多件，标的总额1.3亿多元。近一二年又积极为大中型企业办理抵押贷款公证。中山涤纶丝厂是一家年产1万多吨涤纶，产值2亿多元的大型合资企业，1991年欠缺资金购置设备，政法部门立即为其办理抵押贷款公证，向银行贷到700万美元新引进设备一套，当年产值达2.7亿多元，创税利6638万元，分别比上年增长30.2%和121.3%。四市政法部门这几年还花大力气建立健全法律服务网络，基本实现了市有律师事务所，镇有法律服务所，管理区有法律服务站，大中型企业有法律服务室。顺德市比较大的322家企业都成立了法律室，有法律服务人员

1240人。

四市把开展法制宣传当作为经济建设提供法律服务的重要一环来抓。通过法制教育，使经济管理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增强法制观念，学会运用法律手段规范和管理经济；同时通过法制宣传，引导企业学会按法律办事，学会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过去，中山市一些乡镇企业由于缺乏经济管理和法制知识，在经济交往中有过不少上当受骗的事。1986年，该市政法部门协助政府组织乡镇、企业干部学习《经济合同法》等经济法规，同时在企业内部建立健全法人代表、合同审批、合同造册登记等制度，并通过司法行政部门为企业单位办理法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书、营业执照影印件等，使经销人员在外能从事合法经营活动，从而降低了合同纠纷率，提高了履约率。近几年来，该市同外地签订经济合同达数十万件，履约率达90%以上。四市还重点组织涉外经济部门和企业学习涉外经济法规，帮助企业把外向型经济活动纳入法制轨道，同时为外商投资穿针引线，搭桥铺路。顺德市有一位港商想回家乡投资办厂，但担心政策多变而犹豫不决。该市律师耐心向他宣传我国有关涉外经济法律和政策，解答他提出的各种问题，并陪同他到一些中外合资企业参观，使他消除了疑虑，先后在北滘镇投资1.2亿港元搞家用电器合资经营和补偿贸易项目。

#### 四、树立管理就是服务的观念，为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开绿灯。

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导致了人财物超越地域的大流动。这种情况既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也给各项管理工作带来了不少新问题。在这种新形势下，四市政法部门把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作为加强各项管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确立管理就是服务的思想，在治安、交通、户籍、消防、边防和出入境等管理工作方面，都强化了服务职能，凡影响和妨碍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管理方式、方法和规章制度，都大胆改革，简化手续，减少层次，提高效率。在方法上主要变过去较多采用堵、卡的静态式管理办法为采取开放、引导为主的动态管理办法，着眼于服务和提供保障，大胆为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加快经济建设步伐开绿灯。

改善外来人员的管理。东莞市有外来人口近

百万，中山、顺德、南海也各有30万左右。这支队伍为当地的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也有少数不法分子混杂其中作奸犯科。对此，四市并不是从限制的角度看问题，而是研究采取更科学的管理措施，以有益于经济的发展。一是建立健全外来人口的统一管理机构 and 制度，逐步完善管理机制。从市、镇到管理区和企业，层层建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把外来人口居住的出租屋列入特种行业，按管理常住人口的办法进行管理，并制定劳动纪律，厂规厂纪，规范行为，减少违法犯罪。在招工用工方面，根据当地经济发展需要，开设各类劳务市场，建立就业信息网络，实行定向招工，定点挂勾，有计划、有组织地引导外来人口进来就业，减少了非正常就业人口的盲目流入。二是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外来临工的合法权益，坚决纠正工时长、工资低，劳动、生活条件差和没有劳动保险、劳动保护的现象。东莞市成立了“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劳动监察大队”，专门解决外来工同企业之间的纷争，维护外工的合法权益。三是大力加强外来临工的思想、道德和法制教育。当地普遍把他们列入普法和农村社教对象。南海市在开展“文明村”、“文明户”活动中，还将外来人口作为评选对象。四市政法部门还主动配合其它有关部门，在出入境管理、口岸管理、户政、边防、交通管理等各个方面进行改革，强化服务功能，提高运作效率，促进和保障了当地外向型经济的蓬勃发展。

#### 五、树立“花钱保平安”的观念，舍得投入资金加强政法工作。

10多年来，四市政法部门为经济建设服务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巨大的。仅就办案而言，每市每年通过办理经济案件就为当地挽回经济损失七、八千万元，为企业追回被诈骗款项不下于2000万元。实践使当地党政领导和经济部门看到，政法部门是“无烟工业”，政法工作搞好了，就能保障、促进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经济发展了，又能为加强政法工作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因此必须充分认识经济建设与政法工作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关系。据此，四市彻底改变过去那种认为搞好政法工作是单纯的消费性的观念和行爲，自觉主动地把政法工作纳入经济发展和

(下转第39页)

# 广东农村改革开放的实践与思考

马恩成

农村改革，在改变产品经济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但是新的经济体制不可能一次形成，无论是家庭联产承包制和农村商品流通体制，都有一个发育、完善的过程。广东农村在改革进入第二阶段，一方面把改革开放调动起来的积极性，引向综合开发与扩大开放；一方面不失时机地把改革引向深入，使新体制不断地扩展和提高。后者与前者一样，任务都是长期的，有些已实践了几年，有些则开始不久。深化改革、完善新体制的主要内容是：

## （一）完善家庭联产承包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把家庭承包引入集体经济，建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民群众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的伟大创造，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特色。家庭承包制继承了我国几千年来家庭经营、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又继承了我国社会主义合作制的优良传统；既符合农业生产的特点，又符合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由于它是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因此也能适应现代化生产的要求。开始实行家庭承包制时，有人认为是“分田单干”，会导致“两极分化”、“资本主义”，1985年全国粮食出现徘徊后，又被指责为“小农经济的产物”、“破坏了集体经济”，有人甚至认为它是产生经济领域“自由化的根源”。这些来自“左”的指责和干扰，阻挡不住广大农民对改革的实践。事实证明，否定家庭联产承包制就会否定中国农村改革的主要成果，就会站在广大农民群众的对立面。当然，要看到家庭联产承包制和双层经营体制，在不同地区的发展很不平衡，需要在巩固、完善、提高方面做大量工作，重点是：

1. 发展统一经营层次的经济。没有统一经营层次的经济，双层经营是空的，合作经济的优越性体现不出来，就谈不上为农民提供有效服务。农民希望集体提供服务，解决一家一户生产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如果集体两手空空，什么事情也办不成，或办事要向农民摊派，加重农民负担。所以完善双层经营体制的重要环节，是要发展集体经营层次的经济。发展集体经济应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循序渐进。发达地区应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沿海开放地区更应贯彻“贸工农”的方针，重点发展外向型骨干企业，不发达地区则应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和劳动力的优势，发展开发性农业，发展中小型企业 and 家庭、联户企业。不少山区从发展家庭小庄园做起，逐步向连片开发、规模经营和优质高产的商品生产基地发展，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对于更困难的地区，则应给多方面的扶持，如采取富裕市、县与贫困市、县挂钩；市、县的机关、企业与贫困管理区、村实点挂钩扶持；以及在条件适宜的地方集资兴办扶贫工业开发区等多种办法。

2. 加强农业的社会化服务工作。这既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广大

农民生产致富的迫切愿望。农业社会化服务有一个由少到多，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具有多成份、多层次、多种服务形式的特点。大量起作用的是合作经济组织内部的服务，解决家庭承包后分散经营的不足。一种是对水稻、甘蔗等大田作业实行“五统一服务”，即统一良种、机耕、排灌、植保、关键性技术措施。这种服务多数是优惠的，由合作经济内部采取“以工补农”、“以盈补亏”的形式进行，因此是其它经济组织不能替代的。之所以称“统一服务”，是把合作经济管理与服务的功能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提高服务的效果。通过统一服务密切双层经营之间互补互利的关系。

另一种是专业性服务，这种服务重点在乡镇，因为其职能部门比较齐全，上挂下联容易形成体系，而且具有“公司加农户”的特点，为水果、水产、畜牧等专业农户提供信息、资金、技术、生产资料供应、运输、加工、销售等系列化服务，以提高农业集约经营、规模经营水平。顺德市北滘镇从1982年起，建立农业、禽畜、花木三个公司，累计投资1.5亿元，建设禽畜水产养殖基地、饲料生产基地和农副产品加工基地。该镇与省水产公司联营的水产加工厂，开拓了水产品收购、加工、储藏、销售（北运）的一体化，去年加工北运的四大家鱼，占全省北运量的1/4；与外商合资兴建的食品发展有限公司，年综合加工禽畜能力1.5万担，90%以上的产品出口。这个镇的综合服务体系，促进了农业专业化、集约化、现代化的发展。

县一级的服务，广东曾经推广高要县综合改革试点的经验，解决长期实行产品经济体制所形成的部门林立、条块分割、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问题。改革的目标是“小政府、大服务”，实行商品经济的管理体制。顺德市、肇庆市鼎湖区的农业、畜牧水产、林业等部门率先转变职能、精简机构、兴办实体、开展服务，进一步推动了镇一级、村一级的服务，形成了网络，办起一批产供销结合、贸工农一体化的商品基地。政府部门职能的转变，需要一定的条件，或在转变中逐步创造条件。因此需要采取一些过渡的办法。在过渡中应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而不能动辄列为治理整顿的对象。县一级作为城市与农村、宏观与微观的结合部，应成为城乡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

3. 建立健全合作经济内部的经营管理制度。商品经济越发展，越要加强经营管理工作，使农村基层工作逐步做到制度化、规范化。广东从1987年起，首先抓了承包合同管理，建立起合作经济的承包合同管理制度，省政府颁发了《广东省农村承包合同管理规定》，做了承包合同的鉴证、纠纷的调处和显失公平合同的处理工作。其次加强农村集体土地的管理，主要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土地公有制，鼓励农民合理利用土地，促进农业的集约经营与规模经营。土地从分散经营到适度规模经营，是农业专业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也是提高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农产品商品率的重要途径，这需要一定的条件，即农村发展第二、三产业，转移大批农业劳动力；大部分农活实行机械化操作，提供社会化服务，以减少市场风险、自然灾害风险等。耕地的流动可采取有偿转包、入股联营、公开招标等等多种办法，规模经营的主体可以是耕田大户，也可以是集体企业。企业集中一部分土地后，大多反承包给耕田能手经营，因此规模经营是对家

庭联产承包制的发展，而不是取代和否定。为了加强土地经营管理，省委于1990年制定了《关于完善农村集体土地经营管理制度的意见》。

## （二）发展商品流通，加快市场建设

发展农产品流通，是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特别是产后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意义远不止于此。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是起点，交换是生产与消费的中间环节。商品生产决定流通，但商品生产又以商品流通为前提。商品生产越发达，流通的反作用越大。在一定条件下，流通对生产起决定作用。广东改革农产品统派购体制以后，农民进入流通领域较多，城乡市场比较活跃，但是农产品流通和市场发育仍然滞后于生产。农民生产往往信息不灵，一些产品经常出现买难卖难问题。

广东发展农产品流通的指导思想，是坚持放开、搞活，逐步减少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和比重。对于还没有放开、未完全放开的产品，积极创造条件放开（今年粮食、糖价已经放开）；对于已经放开的产品，坚持放开经营，不能由于出现暂时的困难、更不能囿于部门利益，又变相地去统；破除一切不利于商品流通的壁垒，坚决取缔乱设关卡、乱收费、乱罚款的不正当行为；继续放手组织农民们进入流通，对于鲜活、易坏的农副产品，更应重视发挥农民搞活流通、繁荣市场的重要作用，应采取多种措施，保证其合法经营；对于国营、供销社商业，通过深化改革，继续发挥其流通的主导作用，支持国营水产站、食品站、基层供销社把管理权下放到乡镇，使之真正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

广东在发展农产品流通、发育市场方面重视解决以下问题：

1、支持新出现的产供销结合、农工技贸一体化的联合、合作组织。这类组织的形式多种多样，其共同特征是：以一个或几个经济实体牵头，以建立专业化的商品基地为依托，以农民的家庭经营为基础，以系列化的服务为纽带，形成产供销结合，农工技贸一体化的体系。这种体系破除了旧体制的产供销（还有加工）分割的弊端，减少经营环节，提高了综合经营的效益；这种体系通过提供优质服务，把农民的分散生产组合起来，进行集约化、规模化经营；特别是通过产后的流通服务，把为数众多的小生产、小流通纳入社会化市场，成为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中间性组织。

这种组织有多种类型：一是国营企业牵头的，众多农户参加的联合经营。这种形式一般规模大、实力比较雄厚。二是供销合作社牵头，与农民联合兴办专业性产销合作经济组织。三是乡镇集体办起的各种专业服务公司。以这些公司企业为龙头，向农民提供系列服务，促进产供销的一体化。四是农民牵头办起的产销联合服务组织。这是农民进入流通领域后兴起的一支生力军，在沟通产销、开拓市场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是搞活农产品流通的一个重要的经营层次。

2、注意市场发育与建设。市场是流通的载体，农产品流通的发展，依赖于城乡市场的发育。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农村经济搞得比较活，集贸市场发育比较快，1978年集贸市场只有938个，1990年增加到3287个，成交金额达256.7亿元，比1978年增长11倍

多，成交额占全省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重，也由1979年的17.8%，上升到34%，居全国首位。参与集市贸易的贩运人员已达200多万人。但是集贸市场作为传统的农产品区域性集散地，仍然是只适应小生产的“小流通”，只是市场发育的开端，不适应大生产、上批量、远距离的商品流通。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专业化商品基地的扩大，需要兴办集中销售的专业市场和批发市场。这类市场经销量大，购销方式灵活，辐射能力强，更能破除地域、行业的局限。广东这类市场的发育滞后，如全省农产品批发市场只有132个，1990年成交额仅占全省集市贸易总成交额的7.8%，而且在信息传递、价格形成、市场管理方面很不规范。在全省有计划地建设一批规范化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并相应地发展期货贸易，是促进农产品流通和市场发育的重大措施。

实践表明，农产品规范化的批发市场与一般的集贸市场和行栏不同，它具有以下功能和特点：商品集散的功能，为买卖双方提供批量交易的场所，具有扩大运销规模的交易空间、节约交易费用的作用；价格形成的功能，由于参与交易人员多，市场竞争较充分，成交价格容易反映市场真实情况；信息传递的功能，容易成为商品信息中心，传递市场供求和成交结果，并与各大批发市场连成信息网络；质量检查的功能，由卫生、防疫部门进场，对动植物的质量、公害进行检验管理；综合服务的功能，向参加交易者提供金融结算、储存、加工、运输、以及生活设施等多方面的服务。批发市场应由各级政府牵头，统一规划、统一筹集资金、统一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加强管理。实行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市场收入应主要用于市场建设和市场管理。批发市场是由政府开办的服务性事业单位，市场建设要有配套的基础设施，通畅的信息系统，有通过公开竞争形成的价格机制，要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做到依法经营、依法管理，杜绝少数人垄断和欺行霸市等行为。规范化批发市场要做好两方面的衔接，一是衔接好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体的广大产区，这需要通过前面所述的各种中间组织；二是衔接好已形成的多渠道的销售网络和各种初级市场。因此这种市场也需要一个发育和健全的过程。

### （三）发育农村股份合作制

农村股份合作经济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群众在改革实践中创新的又一新事物，其类型层次较多，涉及乡镇企业和农、林、牧、渔业；不仅出现在沿海开放地区，而且出现在内陆、山区；不仅有较高层次的股份集团企业，还有低层次的股份合伙企业，从类型看，有新组建的集体与集体，集体与个人，集体与国营的联营企业，也有把股份制引入原集体企业而形成的股份合作企业，包括折股、分股、售股、扩股等形式。

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偶然的，不是人们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有其社会经济根源。首先，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为了适应市场竞争，必然要扩大生产规模，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需要的资金越来越多，仅靠原有的银信渠道和企业自己的积累已无法满足生产需要。另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农民率先富裕起来，农村越来越多的闲散资金需要寻求生产门路。据东莞市1991年对5个管理区的调查，存款最高的管理区人均高达8216



元，最低的也有2563元。在3224个农户中，家庭资产在50万元以上的有70多户，10—50万元的有900多户，二者合计占总户数的30%。可见农村集资潜力之大，也说明在农村，特别是富裕地区农村引入股份制机制，不仅必要，也有可能。

其次，农村股份合作经济是农村深化改革的产物。我国农村前一段的改革主要是围绕着集体经济的土地制度进行的。还没有触动集体企业深层次的领域。当然，要看到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成部分的乡镇企业，其经营管理体制比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灵活，就是说它一开始就没有“铁饭碗”、“大锅饭”，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积极参与市场竞争，接受市场的选择，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异军突起”。乡镇企业引入承包机制后，也解决了一部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问题。但主要是调动了承包经营者的积极性，并没有解决好集体企业与职工的关系，更未解决好集体企业与作为集体主人——农民社员的利益问题。

农村集体企业体制的弊端，大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产权关系不明确，名义上是集体所有，即在这一个集体范围内“人人都有”，但社员却难以切身感受到自己有一份。二是分配上的随意性。一些村和管理区的集体企业以利润下拨款的形式对社员进行第二次分配，但没有严格的规章制度，怎么分、分多少，实际上是少数干部说了算，有的基层干部把自己的工资、奖金提得很高，甚至出现乱支乱用、以权谋私等行为。三是缺乏民主管理和监督。企业的重大决策往往由少数干部说了算，社员既不了解，也没有发言权。上述弊端在经济不发达地方也许不尖锐，因为那里集体企业不多，企业利润不多，与社员关系不大，意见也不大。但是在集体经济发达、集体企业利润较多的地方，如宝安、东莞的“三来一补”、“三资”企业比较多，一些自然村集体经济一年的纯收入上百万元，这方面的矛盾就比较尖锐。因此，通过农村深化改革，理顺集体企业的产权关系、分配关系，建立职工、社员对企业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就越来越成为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重要措施，也是发达地区农民的强烈愿望。

农村股份合作经济出现不久，多数不完善，更不规范，但从许多方面显示了优越性：1. 具有凝聚生产要素的功能，能够聚集民间资金，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发展资金短缺的困难，有利于扩大生产规模、形成新的生产力；2. 具有适应性广、可容量大的特点，有利于各种经济成份和不同层次的联合，有利于各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3. 有明确的产权制度，能够较好地解决财产权属不清的问题，增强企业的动力和活力；4. 具有自我调节、自我约束机制，能协调所有者、经营者、生产者的经济利益，规范他们的行为；克服企业的短期行为；5. 有助于摆脱基层政权不必要的行政干预，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6. 通过集体经济参股，可以使个体、合伙、挂靠企业向股份合作经济过渡。总之，实行股份合作制，只是原来所有制结构下组合生产要素的一种形式；有些是原集体经济的一种实现形式，因此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

由于股份合作经济是农村的一桩新事物，它正处于发育之中，除部分沿海开放地区，大城市郊区为数较多外，其它大部分地区处于试验阶段，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一

些有待研究解决的问题，如：如何确定一个具体股份企业的经济性质？如何处理好企业的分配问题？如何完善股份合作企业的管理制度？等等。在农村引入股份制机制，要从实际出发，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如企业有比较稳定的效益，资金需求比较迫切，干部有较高的素质等。发展股份合作经济要因地制宜，尊重群众的意愿，采取多种形式，不能强迫命令，不能搬套别人的模式，不能过早强调规范化。对已经出现的股份合作经济，要认真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有关部门要制订相应的政策法规，以促使其循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作者单位：广东省农委

责任编辑：谭湛明

---

（上接第54页）

杆，力促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是天经地义的，世界各国无不在这方面做文章。我省财政包干体制已定延续到2000年不变，对税收问题的处理，在执行国家统一税法的前提下，应当有较大的自主权。暂时少收一点，是为了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以便将来收得更多。在征收各种税费和关税方面，参照经济特区和“三资”企业可以享受的优惠政策待遇，对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有重要作用。

6. 在吸引人才，使用人才，为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人员和商务人员参与国际交流和竞争等方面，提供更多的方便。

作者单位：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

责任编辑：郑英隆

# 广东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政策的研究

黄菊勋 谢鹏飞 莫震

## 一、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我省力争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的关键。

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今年，邓小平同志南巡，向广东提出了力争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的战略目标。如何去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呢？我们认为，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应当是最重要的突破口。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但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基础还很薄弱，目前占全省的经济比重还很小，这种状况与广东的发展要求很不协调。

1. 与广东经济要上新台阶的要求不相适应。1979—1990年我省经济的技术素质有了很大提高。12年间，全省引进了100多万台（套）设备和3000多条生产线，70%以上的工业行业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技术改造。据不完全统计，从1981—1990年，全省依靠技术进步开发的新产品达3万余种，新花色品种30万个；全省获国家、部、省优质奖的产品达5152个，其中有1000多种产品的生产工艺达到国际技术标准。“七五”期间，经省级登记的科研成果有2670项。据可直接计算经济效益的项目统计，实施一年可新增产值近50亿元，新增税利6亿多元，创汇8000多万美元。1991年获科技进步奖的128个项目中，90%已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其中可直接计算经济效益的99项，一年可新增产值39亿多元，新创税利5000多万元。这些都说明我省技术进步正在逐步发展。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我省的经济技术基础还比较差，经济技术素质还不高，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尚未形成规模。至1991年止，我省生产高新技术产品的企业虽已有357家，生产662个产品，1991年实现产值81.76亿元。但企业数仅占全省预算内企业数的1.1%，产值仅占当年全省工业总值的3.3%，且由于其企业规模小，难以形成大批量生产和获得规模效益；出口创汇能力低，出口销售收入仅占其产值的25.8%，低于全省30.7%的水平；投入产出比低，仅为1:2.26；高新技术产品采用国际技术标准的仅有181个，占产品总数的27%，而采用企业技术标准的则达267个，占产品总数40.3%。这种情况是不利于我省经济上新台阶的。

2. 与我省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要求很不适应。现在世界上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都是高科技的竞争。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科技贡献率一般都达50%以上，一些国家甚至达60—80%。我省经济增长中的科技贡献率只有19.3%，比全国平均20%左右的水平低。在国际贸易中，高科技产品出口的比重越来越大，1990

年美国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已占其全部出口额的40%，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4个成员国的制成品出口中，高技术产业的产品已达40%。我省的出口产品中，高技术产品的比重少得可怜，只占出口额的2.6%；就以1991年全省外贸收购总额计，高技术产品也只占7.19%，而且在21亿多元的高技术产品出口收购额中，属于替代进口的占11亿多元，真正出口的只有9亿多元。去年我省的出口总额虽然达到136.88亿美元，居全国之冠，但低档产品多，在国际市场上卖不到好价钱，经济效益并不高。这种状况如不改变，我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就会越来越弱，门路就会越来越窄，经济效益就会越来越低。出路何在呢？结论只有一个，就是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形成规模生产，提高高技术产品出口比重和质量档次。

3. 与国内市场竞争的形势不相适应。在国内市场竞争中，我们也应当丢掉幻想，不能陶醉于“广货北伐”的现状。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发表以后，许多兄弟省市都纷纷调整经济发展战略，相继制定了以发展高新技术为核心的规划及政策，把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放在优先的地位，采取优惠政策，集中大量资金，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江苏省提出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产业的经济发展新思路，积极兴办苏锡常“火炬”带，与南京浦口高技术开发区、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自办的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在科技力量和经济基础上形成相互衔接的区域分工，促进高新技术发展和创新传统产业。山东省在加速高新技术开发区建设，运用高新技术嫁接改造传统产业，培植高新技术产业生长点等三条战线上全面推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除了创办济南、威海两个国家级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外，省又自定创办了烟台、青岛、潍坊、淄博、枣庄等省级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并规划实施了胶济铁路沿线和胶东半岛沿海海洋经济技术二个高新技术开发带的建设。内地的兄弟省也在纷纷自办并争取国家批准举办高技术开发区。各省市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大动作，不能不给我省带来冲击，广东经济发展能否继续在全国保持领先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紧紧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上取得重大突破；取决于能否有更多的高新技术产品投入国际、国内市场。

4. 与我省力争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的战略目标要求不适应。从80年代初起，亚洲“四小龙”，特别是台湾、南朝鲜经济步入了转型和升级时期，他们为保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着手把经济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方向调整，致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目前，其科技进步的贡献在经济增长中，相对于资金和劳动力已逐步占据主导作用，科技进步贡献度普遍达到50%左右，大大高出广东的19.8%的水平。南朝鲜雄心勃勃，明确指出要在1995年跻身于世界十大科技先进国行列，他们的主要政策措施是增大投资，培养高级技术人才，优先开发核心技术，组织产业向轻型、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结构转变。他们还采取以市场换投资和高技术的措施，在禁止某些国外电子产品进口的同时，对本地合资企业的产品则允许其自由销售等。台湾从80年代以来，积极推动八大重点高科技发展，促进产业结构改变，发展脑力与技术密集的高质量、高附加值的产品，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能力；其科技研究开发

经费要提到占国民生产总值2.2%以上(广东只有0.25%),大力培养人才和建设基础设施,如各种大型中心实验室等。新加坡为了吸收国外资金和高技术,规定可给外国公司10年免税期和可全部汇出赚取的盈利,甚至规定凡外国投资兴建的新技术企业,如连续3年亏损,可给予50%的投资津贴。香港也大力发展电子工业,其产品有90%提供出口。“四小龙”都选择了微电子技术作为重点发展领域,同时在其它许多产业如汽车、钢铁、家电、服装、养殖、生物技术等,也都采用高新技术,产品逐步挤进国际市场。广东与亚洲“四小龙”相比,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现行的政策措施也还不够优惠和有力。为此,广东要实现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的战略目标,就必须使高新技术产业有一个较快的发展。

## 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应当突出重点地区和重点技术领域。

根据我省社会经济发展和智力资源、自然资源分布状况,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应当立足现有基础,突出重点地区及重点技术领域,逐步形成以高新技术开发区和珠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产业带为龙头,以高新技术企业及项目为基础,以出口创汇型高新技术产业群为重点的多元化、多层次发展的高技术经济格局。

1. 在地域上要突出珠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是我省的精华所在,是追赶“四小龙”的主力军。它在全省经济发展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发展对全省起带动和辐射作用。全国第一批27个国家级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广东有三个,全部都在珠江三角洲,即广州天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深圳科技工业园。去年3月,国家科委又批准建立珠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产业带,这是继苏锡常火炬带之后的第二个产业带。据此,我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应当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珠江三角洲,首先要办好高新技术开发区和产业带。

创办高新技术开发区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一种重要途径。我省三个国家级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到1991年止,已创办了一批企业,其中已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52家,实现产值8.88亿元,技工贸总收入10.49亿元(其中技术性收入3313万元,占3.16%;产品收入73666万元,占70.22%;贸易收入25974万元,占24.76%),利润9613万元,上缴税金4051万元,出口创汇和替代进口节汇2476.6万美元。

珠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产业带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中山、惠州、东莞等八市的市区及番禺、顺德、宝安、南海、新会、惠阳等六市县,面积16022平方公里,人口1184万人,分别占全省土地面积的9%和全省总人口的19.1%。这是我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各项经济指标都占全省比重的一半以上。据1991年的统计,产业带的社会总产值、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收入、财政收入、工业总产值、外贸出口总额分别占全省比重的58.4%、53.1%、52.8%、58.8%、62.3%、66.5%。带内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已开始起步,1991年已有生产高新技术产品的企业289家(占全省的81%),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45家(连同开发区的52家共97家,占全省的95%)、生产551种产品(占全省的83%)、产值74.5亿元(占全省的91%),出口销售收入20.5亿元(占全省的97%)。

其产品技术水平属国际领先和国际先进的占33%，属国内领先和国内先进的占62%，属省内领先的占5%；属巴黎统筹委员会控制的产品目录的有25个，属省公布的高技术产品目录的有374个。1991年投入产业带发展高新技术企业及项目的资金达32.6亿元，其中政府投入的引导资金5993万元、利用外资5.24亿元、银行贷款8.44亿元、企业自筹13.87亿元，初步形成了以政府投入为引导、以银行贷款和企业自筹为主体的投入机制。产业带中的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能力不断加强，企业自主开发了281项高新技术产品，企业与其它单位合作开发了97项，两者合计占产业带中高技术产品总数的68.6%。

2. 从经济发展水平看，要突出珠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当地的经济水平。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占领市场的激烈竞争，必然会激发起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强烈要求。目前，三个高新技术开发区和产业带都已开始起步，但其发展速度仍不尽人意，所占经济比重也较小。1991年产业带内的高技术产品产值只占该地区全部工业产值的4.87%，略高于全省3.3%的水平；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收购额只占该地区全部出口产品收购额的22.5%。这种状况，与珠江三角洲在我省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很不相称的，与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转型升级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在这关键时刻，必须抓住机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实行重点突破，才能取得带动全局的效果，改变珠江三角洲目前的被动状态。

3.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要选准目标，突出重点。我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点领域的选择，一是要适应广东的实际基础和优势，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二是不仅技术起点高而且适用面广，能带动其它技术的发展，促进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对广东经济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三是以市场为导向，发展市场需求量大，在国内外市场有强大竞争力和生命力的产品；四是以企业为主体，迅速形成生产规模，取得经济效益。因此，我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优先开发的重点技术领域，选择电子信息业、生物技术产业、新材料产业、机电一体化产业、高级精细化工产业、轻纺高新技术产业、能源与环境保护新技术产业等，是符合实际需要和发展方向的（产业带发展规划，省政府已批准实施）。集中力量在这几个重点领域发展，既能在现有基础上逐步建立有广东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又能带动和振兴相关的传统产业，对推动我省国民经济的发展，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三、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政策选择

我省高新技术产业在取得较好成绩的同时，亦存在总体发展还不快、未能形成规模的问题。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如原有的经济技术基础薄弱；不少人对发展高新技术缺乏紧迫感；企业对应用高新技术进行产品更新换代和新产品开发的内在动力不足；等等。但还有一个尤其值得重视的问题是，目前全省还没有形成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手段。我省制定了珠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产业带的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各市县也相应制订了一些发展规划，然而，有规划却缺乏实现规划的切实有力的政策保证。目前我省的高新技术产业，除了三个开发区被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列入“火炬”计

划的项目或属一般新产品享有一定的优惠待遇外，没有系统的配套政策。珠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产业带也只是国家科委给予6000万贷款规模，其他再没有什么特殊优惠政策待遇。所以，在开发区外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是徒有其名，产业带还是政策“空白带”。这种政策扶持手段的不健全，势必影响全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总的思路是要坚持放宽搞活，同时还要增加投入，减少负担。在具体政策上，我们考虑应从如下几方面进行突破。

1. 要把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优惠政策，在内容上加以深化，在范围上加以扩大。1991年3月《国务院关于批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有关政策的通知》（国发〔1991〕12号）颁发了三个政策文件，具体规定了在高新技术开发区内被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以享受的优惠政策。但它的局限性很大。内地的省市在制订和实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具体政策时，包括国家级的和省市区政府批准兴办的开发区，在政策上许多方面已各自有所突破。我省至今仍恪守成规，虽然已经认定了102家高新技术企业，却有50家在开发区外，包括其中在珠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产业带中的45家，都享受不到优惠政策待遇。我们认为，优惠政策应当向高新技术产业倾斜，既适用于开发区，也应适用于产业带，还应适用于全省；既适用于高新技术企业，也应适用于高新技术项目和产品，这样才有利于利用老企业的基础和对传统产业进行逐项改造。

2. 创办若干个省级的高新技术开发区。现在全国除国务院批准的27个高新技术开发区外，各省市区政府又自己批准兴建了一批，据《瞭望》杂志报道已有40多个。李鹏同志在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经济发展规划座谈会上的讲话，肯定了江苏昆山自费办经济开发区的经验，并提出各地可由省一级控制选择一些地方进行自费开发，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国家验收“戴帽”。据此，我省除已申报再办四个国家级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包括佛山、惠州、珠海西区、汕头外，还可再选择几个条件较好的地方，如江门、肇庆等，自费兴办省级的高新技术开发区。

3. 权放一级，凡是能够下放给市和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都坚决放下去，使下面有较大的自主权。省级有关部门应当通过深化改革，简政放权，加强宏观管理，做好策划、协调、指导、监督工作，提供支持和服务，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4. 增加投入，拨、贷资金投入都应适当向高新技术产业倾斜。高新技术产业的特点是高投入、高风险、高效益。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都舍得巨额投入，勇担风险。我们应当在组织资金投入方面，在筹集发展基金、风险基金方面采取较大的动作。在银行贷款抵押、自有资金比例等方面都应适当放宽。一般说来，高新技术企业初创阶段，所筹措的资金有限，也没有多少固定资产可作贷款财产抵押。但它们有一批科技人才的脑袋，是可以创造巨额财富的特殊宝贵财富。如果得不到资金的支持，科技人员也无法施展其智慧和才华，能够创造财富的财富也会被闲置浪费。

5. 减少负担，在征收各种税费和关税等方面给予优惠待遇。以税收等作为调节杠

（下转第49页）

# 广东利用外资的宏观策略与微观措施

张亦春 朱孟楠

## 广东进一步利用外资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及挑战

### (一) 利用外资的国际环境越来越复杂

#### 1. 国际资本流动发生了巨大变化。表现在:

(1) 在总量上全球资金短缺越来越严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目前国际资金供需缺口约达4000—5000亿美元。(2) 国际资本加强了在发达国家之间的对流。对流量现已占国际直接投资总额的3/4。在这种大前提下,国际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已越来越少,尽管对我国来说引进外资仅占国际资本流动量的3%,吸收的直接投资也仅占全球跨国投资总额的1%略强,但对广东要采取的多边化利用外资方针的执行,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3) 外国商业银行贷款将日益减少。根据巴塞尔协议规定,1992年经营国际业务的银行,必须将其最低准备金保持在其经过信贷风险调整的资产的8%水平,为此许多商业银行减少了贷款尤其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这对广东也是一个挑战。广东对外借款中大部分是外国银行商业贷款。据统计在1979—1988年间在对外借款27.03亿美元中,外国政府贷款占1.5%,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占2.6%,对外发行股票占8%,而外国银行商业贷款则高达87.9%,至1990年上半年该比例升至90%。可见,目前的形势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遇,应该乘机降低这部分贷款的比例,而提高向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4) “孔雀”东南飞之势不减。基于“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港澳台一直是我国尤其广东、福建吸引外资的重要地区,但是从80年代中期以后港台资本纷纷加大流向东南亚国家的比例,港台并其他两小龙已取代日美成为向东南亚投资最多的国家和地区。可见,广东在吸收港台资本方面具有压力也具有潜力。

2. 外商投资的选择目标发生了改变。一个国家或地区吸引外资的最根本因素有三:一是资源

优势,二是市场潜力,三是技术吸引力。过去外商把资本大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看重的是资源优势,但随着原材料替代品的出现和技术的进步,资源优势逐渐淡化,外商目前更感兴趣的是所投资国开放的广阔市场及销售渠道和对技术的消化能力。据最近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第三次发表关于发展中国家私人投资趋势的年度报告:外国投资者不再在发展中国家寻求廉价劳动力,他们需要的是大型的市场、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和高水平的技术。可见,这种变动态势对广东利用外资的前景是会影响的。

### (二) 利用外资的国内竞争压力也越来越大

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全方位开放政策,从南方到东南沿海到东北,创办了五个特区、确定了14个沿海开放城市(现又把济南、南京纳入开放城市)、建立了长江三角洲、闽南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及山东半岛经济开发区等被誉为最有希望赶上“四小龙”、带动我国经济腾飞的“黑马”地区。1990年又在闽开放台商投资区与开放浦东实行更优惠的政策。其后国务院又批准天津、上海、深圳等地设立保税区、实行自由港、自由加工区的政策。这些都使广东原先获得的地区倾斜政策优势和减税、退税、低税、优惠贷款等政策性优势减弱,从而增强了广东利用外资的竞争与压力。

### (三) 省内的一些经济基础仍然较薄弱

从总体上看,广东近年已创造了良好的经济基础,综合优势也已形成,但某些经济基础仍较薄弱,表现在:(1) 省内的“瓶颈”产业仍供不应求,“开发热”与基础设施滞后的矛盾未能彻底解决;(2) 产业技术水平仍较低。此外,以技术含量低的初级产品和粗加工产品为主的出口贸易“缓慢增长”,“三资”企业约三分之一的亏损以及省港之间生产要素互补性合作优势的逐步减弱等,都不同程度影响着广东作为整体的吸引力。

上述三个层次的因素,对广东进一步利用外资的总量和结构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 广东进一步利用外资的宏观策略与微观措施

根据广东目前利用外资的格局及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我们认为要深层次地利用外资,必须在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采取相应的策略与措施。

### (一) 宏观策略

1. 确立“发展极”<sup>①</sup>的战略观点。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要吸收外资,首先本身应具有极强的引力。引力大吸收的外资就多;反之,就少。建造“发展极”正是增强这种引力的重要措施。所谓“发展极”,实际上是一种经济活动中心,当一些主导部门和具有创新能力的行业集中在一些地区或大城市并以较快速度率先发展时,“发展极”便形成了。它是一个混合中心(生产、贸易、金融、交通、信息和决策),具有引进与输出资金、创新与扩散技术、向内与向外辐射经济能量等功能。它强调的是“极”吸引力,强调的是向周边辐射能量并产生联系效应以及强调资金集中使用的集约和规模效益。广东实际上已具备了创建“发展极”的条件,一批优势产业已经形成,最近中央又希望广东把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同全国的发展战略联系起来,把国际国内两方面的人才、资源、市场结合起来,并依托本省的经济的发展,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真正起到窗口的辐射作用,开拓出更大的市场。因此,广东应选择良好的地点建造“发展极”,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

2. 确立“圈层”经济的发展观点。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区域经济集团化、一体化,亦即走“圈层”经济的发展道路,<sup>②</sup>如欧共体、美加自由贸易区、拉美南锥体共同市场以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成长三角”。目前,海内外学者提出建立“大中华经济圈”的设想,就广东来说,各种经济圈的设想层出不穷,如粤港澳经济圈、港、深、珠、台、澳经济圈、华南经济圈等。我们认为由于广东有着毗邻港澳的独一无二的地理优势,也有着与港澳经济合作的厚实基础,而且粤港澳越来越互为依赖、融成一体,因此,从长远来看设立某种形式的经济圈具有相当大的可行性。一旦经济圈得以建立就可保证资金、商品、人员的充分流动,从而为广东利用外资提供了方便。

3. 确立全方位、多边化卷入的利用外资方针。广东的倾斜利用外资政策,已产生了一些问题,从经济角度来看,限制了广东利用更多的方式从更广的范围吸收资金;从社会角度来看,使广东的“南北”问题日益严重,靠外资富裕起来的沿海、珠江三角洲同广大山区之间的贫富差别日益扩大,“马太效应”越演越烈。据统计占面积65%人口40%的山区,工业生产总值仅占全省的1/10,200万人尚未摆脱贫困。因此,广东应扶正这个政策,在坚持吸收港台资本为主、外商直接投资为主的情况下,积极创造全方位、多边化利用外资机制,吸收日资、美资、欧共体资本及新加坡、南朝鲜等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并由此获取不同类型、层次的技术和不同水平的管理经验。

4. 确立“主动出击”利用外资的方针。由于国际资金的严重短缺和各国竞相采取措施引进外资,国际资本市场越来越走向投方或卖方市场。外商对投资环境的质量越来越讲究与挑剔,并由讲究硬环境向软环境转化,依靠资源优势尤其依靠廉价劳动力坐等外商来投资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因此,我们应该采取“主动出击”“找米下锅”的策略,走出去大力宣传,推销自己,使不同国别、不同偏好的外国投资者有深刻的认识,开辟更广的外资来源。

5. 确立引进大型资本的政策。过去由于我国对外商投资项目或企业缺乏合理导向,致使我国利用外资走向“小型化”。据统计至1991年上半年,我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项目,平均单项协议外资金额仅125万美元,有的项目仅2万美元,广东的深圳平均为147万美元,这种中小型资本项目或企业至少有四个不足:(1)资本技术含量低,无法向高层次发展;(2)有的企业是家庭式经营,缺少现代管理经验;(3)小型项目对投资环境质量要求低,从而使我国政策的着眼点也相应降低,进而使我国的投资环境质量无法满足大型资本的要求;(4)大型资本投资不活跃,又使我国对外的投资环境形象被扭曲,由此又会反过来限制中小资本的进入,造成吸引外资的非良性循环。目前广东在引进外资上已逐步从讲究数量向讲究效益转化。因此,在利用中小资本并进行导向时,积极创造条件引进大型资本则是广东下一阶段利用外资的必然选择。引进大型资本有以下几个作用:(1)可改善投资项目的规模结构,增强外商投资项目的规模效益及我方引进外资的

经济和社会效益；（2）可以改变中小企业粗放式、家庭式经营状况，吸收大型资本的现代化管理技术、经验；（3）会促使我国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满足大型资本的要求，也对中小型资本有更大的吸引力；（4）通过外商投资企业或项目规模的大型化、结构合理化以及效益最佳化，实现我国下一阶段利用外资的新目标。大型资本规模可界定在1000万美元以上，外商投资达到这一规模的予以一定优惠，如果这个大型资本是投向偏远的山区或出口比例达90%以上的，则给予特别优惠。

## （二）微观措施

1. 开放国内市场。一般来说市场大小只能影响到外商投资的多寡，而市场的开放，则是吸引外资的先决条件。许多外商来华投资看重的是我国的资源优势和广阔的市场，尤其在目前资源优势相对减弱而技术吸收能力尚未形成一种优势时，广阔的市场及销售能力就显得特别重要了。50年代以来，“四小龙”和巴西、墨西哥、印度等国在引进外资时均采用过此策。但我国目前的市场开放度极小，与外商的要求相悖。它必然地造成了这样两个后果：（1）限制了我国深层次引进外资。实际上，引进外资强调外资企业产品出口与开放国内市场允许外资企业部分产品内销，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从表面上看是对立的，但实质上是紧密联系、互为作用的。一味强调外资企业产品出口，必然地压制与扭曲外商的投资目的，挫伤他们进一步投资的积极性，阻碍我国深层次引进外资。（2）使国内企业无法摆脱国家“父爱”的保护，没有竞争压力，削弱企业的生机与活力。因此，我们应适当放开市场，让外资企业的部分产品进入国内销售渠道。这样至少有四个优点：（1）竞争对手与产品的输入，会刺激国内同行的发展；（2）如果外商投资企业的某种产品能顶替进口，则可节约外汇，起到进口替代的作用；（3）如果外商的产品是国内竞争性的产品，外商要保证产品有销路，就须以更先进的技术生产出更高质量和更低成本的产品；（4）可以得到进入国内市场的好处，增加对我国的投资，形成一个良性的投资循环。

2. 开放现代产业。这也是吸引外商的重要途径。现代产业是资金和技术密集型，这正符合外商投资的新要求。美国硅谷吸引着大量的资金，就是高科技所致。如台湾自1988年以来有10亿美

元的资金流往包括硅谷在内的高科技产业，占向美投资总额的50%。广东高科技产业相对较少，但开放相应的技术较高的产业，亦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吸收外资办法。

3. 开放金融机构。金融是经济的润滑剂，外商来我国投资就必然需要一些外资金融机构为其提供融资和其他服务。各国经验都表明，外资金融机构的引入对吸收国外产业资本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会完善一国的竞争机制，提高金融系统的经营效率和服务质量；甚至还可表明这个国家具有良好的投资环境，从而吸引更多的其他外资。就广东而言，由于存在不同的经济发展地带，因此，开放金融机构可采取四个方式：（1）扩大引进外商独资银行。目前，我国的外资银行已扩展至5个特区及浦东新区、广东应设法在沿海、珠江三角洲等经济发达地带进一步引进外资银行，且以引进国际上大的跨国银行分行为佳。（2）引进台资银行。台湾已允许台银行间接赴大陆开办金融机构开展业务。这个间接地最适点是香港，1991年也已有三家台银行在港开设办事处，而广东毗邻香港，正好可利用这个优势，“近水楼台先得月”。（3）创办合资银行。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的重要方式。它比之外商独资银行有四个特点：一是既吸收了外资，又创造了一个新金融体，有利于完善金融体系；二是可促使金融资本、金融机构双向流动，增强金融业的国际化；三是可通过共同经营与管理，更直接地学到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管理经验；四是可以保证金融宏观政策的贯彻执行。广东目前没有合资银行，因此开辟这条利用外资的新途径，意义更大；（4）扩大引进或创办非银行金融机构，如保险公司、财务公司等，为广东多边化利用外资创造条件。

4. 引进跨国公司资本。跨国公司的最大特点是拥有雄厚的资本、高超的技术和广阔的销售渠道。目前，无论在“东西”之间还是“南北”之间，跨国公司都担当着国际投资与技术转让的主角，掌握着资本主义世界私人投资总额的3/4。因此，广东应采取措施：（1）引进跨国公司来进行直接投资，（2）通过跨国公司的收购活动向现有的“三资”企业注入资金，扩大生产规模，进入国际市场。

5. 扩大B种股票发行。B股的优点在于：（1）有利于有效地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完善与

发展，(2)有利于发行B股的企业在更高的层次上国际化，(3)有利于广泛地筹集外资，并与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举债两种利用外资方式进行功能互补、互衡。这是因为：第一，B股具有灵活方便的特点，能够满足外商投资的不同偏好；第二，B股有利于将众多零散的国外小额资本集聚起来；第三，利用B股筹资可不受偿债率的制约和举债规模的控制。企业可在不增加债务负担的条件下扩大利用外资的规模，国家可在不扩大举债的条件下引进和利用更多的外资。深圳去年率先在省内发行1.6万股B股，很快被欧美、亚洲各国企业抢购一空。可见，B股行情看好，因此广东应充分利用其处于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和已获得的各种优势，扩大B股发行，在条件成熟时把股票推到香港上市，同时广东还应订出B股的管理办法，建立B股的清算与交易系统以及做好B股的承包销工作，由此增强B股的吸引力。

6. 发展共同基金。共同基金是一种通过投资组合分散投资风险的金融工具。目前在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化国家极为流行。在美国利用基金进行投资已成为最受欢迎发展最快的一种投资方式。据统计至1990年6月，美国注册认可的基金有2918种，资产达10341亿美元，全美约有25%的人参加了各种基金。共同基金的基本性能是以发行受益凭证的形式把社会上众多小额投资者的零散资金汇集起来，由专业投资机构经营管理，分散投资于高收益的金融资产或其他有价证券上，或作项目投资，然后按受益凭证共同分享投资利润或分摊损失。其主要特点是投资起点低、收益机会均等且能分散风险、费用少、专家管理及流动性强等。共同基金种类繁多、性能齐全，它象B股一样不但丰富了证券市场的证券种类，缓和证券供不应求的矛盾，同时也为我国开拓一条利用外资的新渠道。我们认为广东要拓宽利用外资的范围，发展共同基金则是可行的选择。具体方法是：(1)创办国内基金，包括以货币名称表示的特种人民币共同基金，以城市名称表示的深圳基金、广州基金及具有积极成长型性质的创业基金等，由此吸收海外投资者的资金投入国内实业。(2)引进外国基金。这是既省钱又省力的措施，它有许多优点，如可以扩大引进利用外资但无外债负担、活跃证券市场、调整产品结构及提高管理水平。(3)创办国外基金，即创办具有我国特色的境外基金。这是“主动出击”方针的具体应用。

由于该基金是在海外发行，因此它能更方便地直接地满足海外投资者的要求，从而使我方更广泛地吸收海外闲散的资本为我所用；同时通过发行基金也促使我国金融业走向国际化，增强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

7. 完善投资软环境，建立投资促进机构。改善投资环境与开放市场是我国目前利用外资的关键。尤其投资软环境越来越被外商所重视。我国目前在投资软环境方面还有待改善，应在统计、信息、分析、咨询等软科学方面多为外商提供服务，在外商集中的地方建立投资服务中心，并为外商提供一个公正、公平的竞争环境，等等。此外，我国在专设投资机构(国外)方面仍是空白，其结果使许多外商无法了解我国的投资政策和投资信息而迟疑观望。目前引进外资的国际竞争很强，因此我国应借鉴泰国的经验，在美、日、欧、中东、台湾等主要资本输出国或地区，设立专门的投资促进机构。

8. 允许外资进入流通领域。这是深层次利用外资的一个步骤。目前国际上直接投资的趋势是：外商逐渐扩大对金融、保险、房地产、商业、服务业等行为的投资。因此我国应适应这股潮流，减少对外资使用领域的限制，拓宽外商投资行业范围。印尼近年吸引外资成绩突出，其中一个政策就是开放国内流通领域。目前上海实行了一些更优惠的政策，允许外商进入金融业、流通领域，因此广东应积极创造条件，运用此策。

9. 大力发展外资“嫁接型”企业。外资“嫁接”是指通过外商投入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对老企业进行改造，促使企业产品升级换代与转换经营机制。发展这种企业，不但可以吸收外资，而且通过“嫁接”的示范作用增强外商对我外资政策、投资环境的认识，从而更大胆更多地来我国投资。广东在发展“嫁接”型企业方面已有丰富的经验，关键在于总结与深化。

10. 对外直接投资。这是我国利用外资的一种新思路，也是走出国门、“主动出击”方针的又一具体应用。从表面上看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对立的，但实质上两者是辩证统一的，是一个对立统一体。外商直接投资是比较表象的行为，对外直接投资则是更深一层吸收外资的途径。因此，我们必须构筑这种“进”、

(下转第29页)

# 试论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的国际化经营

温思美 樊均辉

珠江三角洲外向型乡镇企业的基本格局已初步形成,然而,就产业结构来看,它存在脆弱的一面;其出口行业的扩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际市场的制约,并且极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冲击。在90年代新的内外经济环境下,有必要思考珠江三角洲外向型乡镇企业向更高层次跃迁的道路。

## 一、对广东乡镇企业地位的基本认识

在农村改革之初,广东省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实现农村经济的全面增长、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和改变农村贫困状况等政策目标的主要手段。但在整个80年代,由于制度变革等因素引起的乡镇企业超常规增长,远远超过了最初的预期。用城市、农村的空间区位来划分企业实力和发展能力的时代已告结束,乡镇企业已突破传统的模式而处于更高的质量层次,它完全可以在平等的条件下与城市企业同时进入国内外市场参与竞争,其地位已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一)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广东乡镇企业的成长速度远远超过整个国民经济的成长速度,从而引起广东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而这种变化又赋予了乡镇企业新的地位。首先,乡镇企业产值已超过传统农业产值,成为农村第一大产业。1978年,广东乡镇企业总收入与农业产值的比为29:86,1986年,乡镇企业产值超过了农业产值,到1990年,二者的比上升为79:60;1991年,全省乡镇企业发展到了123.52万个,从业人员达707.83万人(不包括吸收的外省劳工),占农村劳动力的30%,乡镇企业已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1978年,乡镇企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为23%,1991年达62.27%。其次,乡镇企业与城市工业的地位逐渐拉平。1991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928.48亿元(90年不变价),占全省

社会总产值的比重为27.5%,乡镇工业产值占全省工业产值的比重超过29%;乡镇企业出口创汇达35亿美元,占全省出口创汇总额的26.4%。这些指标说明,乡镇企业已成为广东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与城市工业并驾齐驱,构成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格局。此外,乡镇企业的成长提供了多方面的积累,如资金的积累、技术的积累、人才的积累和现代化观念的积累,它们在广东农村工业化的进程中起到直接的推进作用,并将最终影响到全省经济的总量发展和结构变化。

显然,80年代广东乡镇企业的超常规增长是由一系列超常规因素变化引起的。始于1978年的广东农村改革,产生出大量廉价的剩余劳动力,成为乡镇企业的劳动力资源;价格政策的改革使农业收入大幅度提高,从而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市场放开以及收入水平提高引起农村市场急剧膨胀,为乡镇企业发展作出了市场贡献;体制变革刺激了多种经济成分的迅速发展,以及农村社区和政府为摆脱贫穷而产生的强烈的发展冲动。但也必须认识到,由于乡镇企业已形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的企业机制,即使是在常规条件下,也是一股巨大的力量。

(二)在农村二元经济转换的过程中,乡镇企业的地位不可替代。发展经济理论对解决落后国家二元经济矛盾的重大贡献是,提出了以现代工业为依托,经过二元经济结构的差异从扩大到缩小的过程,达到城乡经济同质化的目标。在这一增长过程的初期,政府政策向现代工业部门倾斜,形成倾斜的增长格局,二元结构的反差会逐渐扩大。然而,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来看,现代工业的发展往往牺牲了农村经济的成长,造成农村经济的落后、孱弱,扩大了现代工业与农

村经济之间的鸿沟，即使通过现代工业输血、拯救的方式，也极难促进农业自身成长机制的形成，农业始终成为工业化的包袱。

广东乡镇企业的发展尝试了一条在农村实现工业化，依靠农业自身的力量来实现二元经济转换目标的新路，其方法是充分利用农村政策调整所释放出来的剩余劳动力来代替资本，聚集农村生产要素以及引进外资来启动农村乡镇企业的成长。这是一种成功的尝试，尽管二元经济结构的差距还没有完全消除，但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迅速地提高了农村经济在二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使乡镇企业由自身的现代化代替了等待城市现代工业的吸纳。广东乡镇企业以至全国乡镇企业所肩负的使命——二元经济的转换——是不可取代的，将来无论是确定工业化的模式、制定产业政策、技术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都应该把乡镇企业置于与城市工业企业同等重要的地位。

## 二、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条件分析

企业国际化经营是一个内涵比较广泛的概念，它包括产品、资金、技术、技能、管理诀窍或其他资源进入另一国经济系统的一切跨国经营活动，其最高阶段是成立跨国企业，即在其他一个或几个国家设立工厂而总部设在母国。本文提倡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国际化经营是基于对这一地区乡镇企业所处内外经济环境的分析。

(一) 市场不完善条件下进入国际市场方式的选择

以比较成本学说为传统的贸易理论，把商品出口和证券投资作为国际经济交往的主要形式。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和自由贸易的格局被破坏，它面临着以下几方面的挑战：第一，由垄断而导致的不完全竞争；第二，由进出口管制等因素引起的市场不完善；第三，标准化产品资源配置的区位选择。

传统贸易理论的基本假设前提是：贸易自由化、市场透明（或完全竞争）、运输费用为零。事实上，在这些前提下，直接投资根本没有必要存在，商品贸易是对外交流的最好选择。然而：(1) 企业对专利、技术、生产诀窍、管理技能以及某些重要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垄断，使直接投资成为可能。由于垄断的存在，这些生产要素难以通过贸易的形式在国际间流动，垄断企业为

获得更高的利润，往往更愿意选择直接投资的形式。尽管这种投资会产生附加风险和不确定性，但它足以被国外投资获取的更高收益所弥补；

(2) 直接投资建立跨国企业是代替自由贸易的方式。由于各国边境政策，比如进口数量限制、出口输出自动设限以及高关税等，使产品进入他国市场或从国外获取生产要素存在困难。在这种环境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可建立横向或纵向的国际分工体系，形成企业内在化的国际流通渠道，从而绕过贸易壁垒的障碍；(3) 标准化产品①生产配置地点的选择必需考虑生产成本。从产品生命周期来看，在产品标准化的过程中，不同阶段生产配置区位的选择可能不断移动。当产品标准化时，投资者往往在接近原料产地或劳动力丰裕的地点或消费市场所在地配置生产，这时，直接投资比产品贸易更经济。

(二) 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的内部结构与国际经营的压力

珠江三角洲是我国外向型乡镇企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它集中了广东省大多数的外向型乡镇企业。1990年，广东外向型乡镇企业（注：指可以出口创汇的乡镇企业）达1.67万个（《经济日报》1991.5.7）。从这些企业的结构性特征来看，有较严重的脆弱性。据统计，在“七五”期间，广东省兴办“三来一补”企业11547个，②不计算“七五”之前的数字，“三来一补”企业占全省外向型乡镇企业的69%；1990年全省乡镇企业出口创汇26亿美元，其中9.15亿美元是“三来一补”企业的贡献，占35%。这些指标表明，广东外向型乡镇企业中“三来一补”企业所占比重偏高，它造成以下不利后果：其一，是对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弱；其二，外商控制了中间产品来源和最终产品的销路，一方面导致利益分配不公正，另一方面导致贸易间接利益的丧失，使国内企业素质难以提高；其三，“三来一补”企业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而广东的劳动廉价优势在逐步丧失；其四，是对外来冲击的吸纳能力弱。摆脱目前困境的基本出路有两条：以内向化为目标调整产业结构和提高外向型乡镇企业的结构层次为目标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很显然，以内向化为目标的调整产业结构可能付出极大的代价。第一，它有悖于设计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的初衷。80年代中表现出的沿海开放地带乡镇企业同内地原料和市场之争的矛盾仍未

根本缓解，以内地市场为导向来扩展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可能使矛盾重新激化。第二，随着城市改革的深化，城市企业经营机制将向着更有效率的方向转换，这不仅可以增加它们对内地市场的供给量；同时竞争能力也将增强。尽管与内地相比，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有竞争的优势，但有可能损失社会效益。第三，与内地企业相比，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扩展国际市场更具优势，向内地市场扩展会在一定程度上牺牲相对优势的充分发挥。第四，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是广东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如果外向程度停留在现有的阶段或在现有水平上萎缩都可能延缓全省工业化的进程。

二次大战以来发达国家企业国际化的迅猛发展以及60年代后香港、新加坡、南朝鲜、印度、巴西等国家和地区国际化的经验向我们昭示，企业国际化经营是外向型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存在与其说是经济发展水平的结果不如说是外向型经济政策的结果。外向型经济趋向于以国际市场导向来进行资源和要素的配置，如果这种交易受到阻碍或交易成本太高，对外直接投资就成为必要。事实上，珠江三角洲外向型乡镇企业的发展需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它或迟或早会发生并影响到整个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因此，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发展的一紧迫问题是提高产业结构的层次，增强抵抗和吸纳外部冲击的能力以及国际竞争能力，国际化经营是一种比较实际的选择。珠江三角洲已逐步具备国际化经营的宏观政策环境和微观基础。自80年代以来，在全国和沿海地区实施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都有助于把沿海开放地带的区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统一起来，如人民币汇率的多次调低、进口关税率的降低、许可证管制范围的缩小、取消出口补贴等政策，形成了国内企业以各种方式直接到海外投资的宏观政策环境。从微观基础来看，珠江三角洲已形成一批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外向型乡镇企业。1991年，全省乡镇企业固定资产原值超过1亿元的有29个，出口创汇超过100万美元的有500多个，创造了1100个名优产品，其中获国际认证的有300多个。<sup>③</sup>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吸收了不少国内外人才，已形成一个有向外扩展冲动的企业家阶层，已具备跨国经营的能力。目前，珠江三角洲的个别集团型企业正在尝试对国外直接投资办厂，如顺德市容奇镇的广

东大进纺织实业(集团)公司，投资100万美元，在新西兰设立合资公司，在香港也开设了一家分公司。事实上，只要有关政策进一步到位，珠江三角洲为数不少的企业或企业集团有能力从事较高层次的国际化经营。

另外，国际经济的发展态势也增加了对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压力。90年代，世界经济区域性一体化的趋势更加明显；欧洲经济共同体拟定在1993年实现区内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1989年1月1日生效的美加自由贸易协定消除了双边贸易的关税并允许区内生产要素的更自由流动；美、加、墨自由贸易区和东亚经济合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与此同时，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的谈判陷入僵局，自80年代以来所掀起的以非关税的贸易壁垒为主的贸易保护主义有增无减，形式更加多样、巧妙。以商品贸易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受到严重威胁，其产品进入其他国家和地区组织的障碍进一步增加，竞争力减弱。即使将来我国成为关贸总协定的成员国，也无法在近期内改变这种局面。目前，珠江三角洲外向型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主要方式是商品贸易，其出口商品主要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等“敏感性”商品，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在这种形势下，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有效地绕开这些壁垒。

### 三、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国际化经营方式的选择

企业国际化经营表现为从低级到高级的不同阶段。一般而言，企业往往以商品出口作为国际化经营的开始。在这一阶段，企业可以采用间接出口、直接出口、直接代理或经销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第二阶段是通过单纯资金经营的方式拥有海外的盈利性资产，其主要形态是买卖债券和股票。第三阶段是资金伴随经营权即对企业的控制权向国外转移，其主要形态是以独资或合资的方式创办新的企业或收买现有企业、或者是与国外企业合作经营、合作开发。

本文前述建议珠江三角洲外向型乡镇企业进一步扩展的目标是向第三阶段跃迁，即以直接投资模式进入国际市场。因此，需要对投资的类型、具体投资方式和推进方式进行选择。

投资类型选择：直接投资可选择的类型一般有三种，自然资源导向型、市场导向型和生产要

素导向型。④自然资源导向型指在拥有自然资源的国家投资开发油田、矿产品及林业水产资源；市场导向型是出口商品市场的开发进行到某种程度后，由于规模经济或更高获利的需要，直接打入外国市场进行生产和销售，代替产品出口；生产要素导向型是指为了使企业的经营资源与更廉价的土地或劳动力相结合，而直接把经营资源转移到国外配置生产。从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的情况来看，比较适宜选择市场导向的投资类型。因为选择资源导向和生产要素导向的投资，对这一地区来说都不太现实，而市场导向的投资可以在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现有出口规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具体投资方式的选择：按照企业在东道国拥有控制权的大小，直接投资的具体方式有独资、合资和合作几种。独资方式能使投资者拥有完全的控制权，但由于其资源委托度大、扩散风险的能力极低；合资和合作虽然使投资者的控制权缩小，但由于其资源委托度降低，承受的风险也稍低。近年，珠江三角洲通过引进外资陆陆续续地兴建了一批合资、合作企业，直接、间接地获得一些经营管理合资、合作企业的经验，宜于选择以合资、合作的投资方式进入外国市场。

推进方式的选择：虽然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在全国居领先地位，但需要正视它们的弱点，即与较先进的国家相比，企业的素质还比较低。过去，这一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是港澳地区，与远洋国家的交流不多。因此，向外直接投资的推进方式可以从港澳地区开始，利用毗邻港澳、文化背景相似的优势，先从该地区的投资获取经验，再向亚洲其他国家和欧美国家推进。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提倡乡镇企业国际化经营，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乡镇企业都可以作为一种时髦一哄而起，必须在政府指导下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引导。首先，需要促进一些创汇大的乡镇企业向集团化发展，以增加其实力，为向外扩展打下基础。其次，为某些大的外向型乡镇企业提供直接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使它们能自主地进行海外投资，并从国际竞争中提高跨国经营的能力。第三，进一步改善乡镇企业运行机制，推行乡镇企业股份制。

#### 四、结束语：有关的政策和措施

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的发展已经并正在经历

一个从最初的社队小作坊，到“三来一补”、合资合作，经过“外引内联”的方式发展到实力较为雄厚的企业集团或群体的过程，并正在迈向集团式国际化经营的新台阶。九十年代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必须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1）关于国际化经营的有关限制性政策必须取消，以便让乡镇企业能够勇敢地迈向国际市场。据顺德市的同志反映，他们本拟在泰国办一家缫丝厂，但申请了三年，一直未获批准。勒流镇的“555”牌风扇被古巴看中，出口一条生产线的协议也拖了三年才得到出口许可。因此，建议建立一个由计委、财政、外贸、银行等有关机构组成的对外投资委员会，统一协调企业的国际化经营，避免部门条块分割引起的互相推诿现象。（2）对外汇的出入境管理和结算方式应进一步放宽，做到创汇与用汇真正挂钩，使乡镇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无后顾之忧。（3）要允许经营好、竞争力强的乡镇企业或企业集团实行股份制，并逐步发展到向国外发行股票。（4）对某些资源型产品，可考虑向印度支那地区转移，直接投资办厂或合资合作经营。（5）应在政府的适当部门（如乡镇企业局）设立类似于国际调研中心的机构，配备适当数量的专门人才，并邀请一批高水平的国际经济方面的专家，专门从事国际市场的研究和咨询。可以预料，九十年代的最后几年和下世纪初，珠江三角洲一批实力雄厚的乡镇企业将陆续摆脱目前较低层次的外向型模式，走向更高层次的跨国经营。

- ① 标准化产品：指技术已经成熟而为世人共知的产品。
- ② 陈文学《外向型乡镇企业向多元化高层次发展》。（马恩成主编《在改革中前进的广东农村》）。
- ③ 黄柱良“广东省乡镇企业情况汇报提纲”。
- ④ （日）小島清，《对外贸易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

作者单位：华南农业大学农经系  
责任编辑：郑英隆

# 市场经济与东莞速度

袁学君

改革开放以来，东莞的经济发展很快。1990年，东莞市社会总产值、国民生产总值、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分别是1980年的9.6倍、8.6倍、8倍和8倍，这四个主要经济指标平均每年的增长率都在20%以上。1991年，东莞市国内生产总值达73.77亿元，人均5557元，居广东“四小虎”之首；农民人均纯收入1459元，城镇职工人均收入3777元，平均生活水平已达到小康标准。

## (一)

回顾东莞经济发展的历程，可以得到一个明确的启示，这就是：抓住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坚定不移地走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经济之路，使整个经济面向国内外市场。具体表现在：

1. 大力发展“三来一补”企业。说东莞人从一开始就认为从事对外来料加工是搞市场经济，未免牵强；但若说东莞人从1978年9月引进第一宗来料加工业务之后，即发现干这种事可以赚钱，这个买卖做得，却是事实，否则就无法解释何以直到如今，他们仍以极大的热情和创奇迹般的速度去发展这项事业。1980年以前，“三来一补”累计投产709宗；“六五”期间，发展到1592宗；1990年和1991年，分别达到3880宗和5056宗，年增长超过1000宗。“三来一补”不外是外商的资金和信息、东莞的土地和劳力（包括招用外地劳工）这些资源的一种配置形式。“三来一补”完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组织生产、加工，在这里，包括资金、劳力、土地、技术、信息在内的生产要素都是市场化的，全部企业面向市场，而且是国际市场。东莞人对于市场经济这种资源配置手段的认识、领悟较早，干得较好，所以发展也就较快。

2. 善于利用香港。因香港对市场最熟悉，且其经济向来就面向全球市场，东莞正好利用它的这个优势，来发展外向型经济。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引进。截止1991年底，通过香港共引进“三来一补”和“三资”企业5700多家，外资13亿美元，先进设备43.81万台(套)。二是借助香港的销售渠道和信息网络发展对外贸易。从1978年至1991年，东莞贸易出口总额由3938.2万美元增加到7亿美元，增长了16.8倍，其中的绝大部分



是经由香港实现的。三是通过香港引进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方法、国际贸易经验，促进了本市的经济体制改革，培养了一大批外经外贸经济人才，极大地增加了全市干部群众的市场经济意识。最后这一点往往被人忽视，其实却是带根本性的东西。

3. 积极发展商品性农业。东莞三大产业协调发展的基本经验在于：十分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让市场去调节农产品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不断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首先是根据市场需求和作物效益调整种植业结构。80年代粮食与经济作物的用地比例从1980年的72：28调整为1990年的42.5：57.5，结果是1990年的农业总产值比1980年增加4.6倍，平均每年增18.9%。其次，大搞开发性农业。典型的例子是全市范围内持续不断的种果热潮。据统计，1990年水果的种植面积、产量、产值，分别比1980年增长4.1倍、11倍和33倍，当年农村人均纯收中仅水果一项就达438元。再次，发展创汇农业。以养殖业为例，引进和培育大批优良品种，如瘦肉型猪、美国皇鸽、樱桃谷鸭、加洲鲈鱼、鳗鱼、对虾等，大批投入生产，产品打入国际市场。1990年，全市农副产品及加工制品外贸收购额达2.9亿元，直接出口创汇5382万美元。复次，以科技进步为支柱。据有关研究部门最近测算，东莞市农业产值中科技的贡献率已达40—45%。

4. 抓流通促生产。商品生产以商品流通为前提，没有流通的大发展，就没有商品经济的大发展。东莞人抓流通的主要做法是：市、镇、区、村、户多层次投入流通，构筑起一个上下配合、活动自如的立体式流通格局；国营、集体、联合体、个体一齐上，组成一个多渠道、全方位的流通阵容；采取自购自销、站台交货、代销、赊销、联合购销等手段，全开放搞活购销。经10余年的努力，东莞已建起一个多层次、多渠道、开放型的流通体系，从而使工农业产品源源不断地推向国内外市场。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大批农民进入流通领域一事。以盛产香蕉的麻涌镇为例，户户参与香蕉流通，最多时达1.28万人，超过总劳力的一半。1990年该镇自产香蕉63万担，但营销量却达150万担，占全省上市量的7.8%。

5. 敢于投资，投资的主体是集体和个人。在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经济的环境里，商品生产者一旦发现厚利所在，必然激发起投资冲动和竞争行为。这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这一点在东莞甚为明显。撇开外商投资不谈，单是乡镇企业的固定资产，1984年至1991年就净增了18个亿，其中大部分是集体的投入。农村中星罗棋布的工业企业，是集体、联合体和个体靠土地、劳力资源和少量资金投入滚动发展起来的。1983年以来东莞农民对种果投入资金达7亿元。许多农民不仅在本地承包开发数十亩、几百亩的荒山种果，而且敢于走出家门，到外市县去投资。1985年前后，仅东坑镇就有数百户农民携带400多万元到外地承包种果1万多亩。

## (二)

发展经济既然是以市场为导向，政府和管理部门就要根据市场反映出来的总的需求变化状况，遵循市场运转的客观规律，运用各种调节手段，实施宏观调控管理。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东莞经济的高速发展，特别是“三来一补”遍布城乡、橙柑荔枝满山遍

野、10万农民（高峰期）进入流通领域这三大经济景观，或曰三台经济好戏，全是由市委、市政府“导演”，在市场这个“舞台”上演出的。

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作用主要体现在：

1. 制订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政策、措施。早在1981年，当时的县委就响亮地提出了“把农民搞富”的口号，帮助农民树立商品经济观念，提高商品生产经营能力。为了推动“三来一补”的发展，政府制定鼓励政策，成立领导小组，设置“对外来料加工装配办公室”，总结推广成功典型，务求取得实效。在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方面，为使农业不致短腿，市政府利用财政这根经济杠杆补农、支农，每年由财政贴息拨出的支农款项，光是围垦和养猪的贷款就达4000万元。在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时，市委、市政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进一步改革那些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管理体制，简政放权，对现行经济政策进行一次梳理，将属市掌握的部分权限，下放给镇（区）管理，进一步完善“一个窗口对外，一条龙服务”的管理体制。

2. 引导农民以集体经济为依托，走共同富裕之路。在东莞领导层的意识里，发展经济以集体为主，这一条是很明确、很坚定的。包括集体所有制在内的公有制经济成分，占90%以上，明显处于主导地位。“三来一补”和“三资”项目，凡经济效益好的，都由集体来干。得益于大办来料加工和大搞商品性农业，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迅猛。1990年，全市每个农村经济联合社（管理区）的集体财产总额、自有资金（资产）和纯收入，平均分别为406.6万元、214.4万元和69.8万元，其中纯收入一项比1980年增长6.3倍。由于集体经济实力大增，共同富裕的范围不断扩大，程度不断提高；为每个农户提供就业机会，使其收入不断增长；增加和新办为生产、生活服务的公共设施，改善农民的生活和居住条件；为农户解决承包土地生产基金如水电费、机耕费、水利费的全部或大部；实行农民退休制，按月给符合条件的农民发退休金；对实行计划生育的纯女户提供5000至10000元的福利基金，等等。对于少数年纯收入在10万元以下的经济联合社，市里决定进行“扶贫”。主要措施两条：一是从1990年起连续三年，每年拨出2000万元的贴息贷款，扶助其发展经济；二是安排市属50个部门和单位实行挂钩支援，帮助其举办能够尽快获取效益的项目。

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事实证明，东莞人在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经济的十多年实践中，始终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共同富裕这两条，也就是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本质。

3. 及时提出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实施宏观控制。以引进“三来一补”为例，起步之初，为消除干部群众的疑虑，排除“左”的干扰，东莞实行大小不拘、全面开花的指导方针，待到这项事业形成气候时，则制订出台一系列“规定”、“条例”，加强对新办项目的审批管理，严格限制档次低、效益差、污染严重的项目，提出对“三来一补”进行消化吸收的导向意见，引导它上水平、上规模、上效益；1988年，新成立的市委明确提

出,东莞工业要改变小而分散的局面,以高技术、高质量、高效益为目标,合理调整和优化工业结构,组织骨干企业上马;去年以来,又提出要外引大老板、大财团、大公司,内联大企业和科研部门,举办大规模、高科技、高效益的项目,推动东莞工业从总体上跃上一个新台阶。

4. 转变政府职能,抓好社会化服务。例如,为了发展水果的商品化生产,市政府动员和组织各方面力量,专门成立了水果发展总公司(附设水果技术培训学校和果树技术研究所),建立起产前、产中、产后综合性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在产前,主要做好提供信息、筹集资金和种苗的准备,重点抓好优良品种的推广和种苗的供应。单是技术服务,就贯穿从生产管理到加工包装的全过程,包括技术培训、指导、承包等,并建立起市、镇、区三级农业技术服务网。在产后,做好水果的收购、储藏、运输、销售等服务工作。不少镇、区领导亲自出马到北方搞市场调查,建立销售网点,切实解决农民“卖果难”的问题。

5. 致力于优化经济发展的环境。市场经济要求有高度发达的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东莞市的领导者在这方面作了极大的努力。1979年以来,共投资60多亿元,新筑和铺设水泥、柏油公路1600公里,新建和扩建桥梁111座,使市内每百平方公里有公路里程73公里,远远高于全省平均30公里的水平,形成了以4条超一级主干公路和13条二级联网公路为主体的发达公路网;新建成全国第一个城乡数字程控电话通讯网,使电话装机容量增加到10.5万门,一两年内还将增加15万门,还建成了无线电话、无线传呼、用户电报、图文传真等多个现代化通讯系统;新增发电能力30.6万千瓦,新建输变电站25座,新增输变电容量122万千伏安,使全市年供电量达24亿千瓦时,人均年用电量达1800多千瓦时。

现在,东莞市经济活动的90%以上都通过市场进行。可以预期,经过十多年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经济的实践,东莞经济必将在新一轮经济建设高潮中,发展得更快,取得更高的效益。

作者单位:东莞市委政策研究室

责任编辑:郑英隆

# 成功的奥秘

——中山市板芙镇的思维特色

穆木

位于中山市南部的板芙镇，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曾率先在全省进行农业改革的尝试——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然而，农业的改革并未给板芙人带来经济的起步和发展，直至80年代末期，这个镇仍是“寂寂无闻”，鲜为人晓的小地方，是中山市五个重点扶持镇之一。跨进90年代，仅两三年的功夫，这个镇却奇迹般地“暴发”起来，被省市列入“改革开放成功地区”而受到通报表扬，一举成为工农业总产值超双亿元的新兴工业卫星城镇。这一巨大的反差，其发展的迅猛势头和鲜明特色，已日渐引起人们的注目。一般人为其繁荣的气象而赞叹和仰慕，而不少决策者和新闻理论工作者则着力于探究其发展的内在原因。笔者就是出于这样的动机前往板芙镇讨教的。热情的镇委书记李俭忠同志打开话匣，道出了板芙镇迅猛发展的奥秘。

## “眼光独到，先走一步”

大自然本来就赐予了板芙以优越的地理环境：东傍五桂山，西临珠江，南毗特区，北枕铁城，二零五国道、歧江河纵贯南北12公里。然而这一地理优势一直未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致使经济滞后，过往的人流“只知有‘食为先’（一家私营酒家），不知有板芙镇”。这使镇领导感到愧对板芙的3万人民。他们决心要改变这一面貌，一方面检讨、反思过去的策略和实践，总结经验教训；另一方面则探求振兴板芙经济的新方法和路子，经过反复的思索，他们大胆地制定了以“先”“快”为指导思想的决策。

所谓“先”、“快”是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体现出来的。当时，全国实行治理整顿，银根抽紧、基建压缩、市场呆滞、产品积压、效益下降。在这一大气候中，全国都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中山市的工业发达镇也举步维艰，发展速度明显放缓。面对这一现实，为板芙的出路冥思苦想的镇领导班子，此时却兴奋和清醒起来，他们认为，先进地区发展速度的放慢，恰好为后进地区提供了缩短差距、迎头赶上的机遇。因此，他们在顺应国家调整政策大气候的同时，积极发展地方小气候的“软件”，把治理整顿作为自我发展的一个契机，在他人徘徊、观望、等待的时候，“先迈一步”，打破以往单一的经济结构模式，大力发展村镇工业，开发部分土地为启动来带动连片土地的开发，优化投资环境以及制定优惠政策以吸纳各方面的资金。正是这一“先”、“快”的思路和行动，启动了板芙经济建设的起步和发展，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使板芙脱颖而出：1991年全镇工农业总产

值达2.2238亿元,比1989年增长近1倍,其中工业产值1.5058亿元,创汇3700多万港元,利税1300万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倍、2倍和3倍,经济实力从1989年全市排行第23位上升到1991年的第15位,1992年市下达的镇村两级工业产值综合排全市第11位,“三来一补”创汇跃居市前十名。

#### “以一当十,借风扬帆”

几年前的板芙,曾经形成这样一种恶性的局面:一方面由于经济实力薄弱,无力改善投资环境以及一些配套设施,因而外商望而却步,金融机构避而不贷;另一方面,由于得不到金融机构的支持以及外商的投资,又使板芙的经济雪上加霜。无情的现实使板芙镇的决策者们认识到优化投资环境在发展经济中的重要意义,因此,他们在借贷困难的条件下,以自筹资金为主,争取少量的贷款,用于公用设施建设。两年多来,他们先后花了2000多万元建成板芙大道,河西公路硬底化,全面开通程控电话,架设工业开发区用电专线,两次扩建自来水工程,平整土地1480余亩。正是这笔有限的资金,改善了投资环境,外商纷至沓来,先后有港澳台独资企业14家落户板芙,中外合资、合作企业有3家,新签“三来一补”企业60多家,实际利用外资达3.22亿港元,吸纳国内游资5000多万元,是该镇投入资金的十多倍,实现了“以一当十,借风扬帆”的设想。由于有大批资金的投入,至目前为止已建成厂房近25万平方米,在建5.3万平方米,使板芙的经济建设进入了“黄金季节”。这种用有限的资金来吸纳大量的资金,进而加速经济的发展,是板芙镇的显著特色之一。

#### “欲取之,先予之”

经过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制定优惠的让利政策来发展经济已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但这种认识的程度是因人而异的。珠海西区的决策者们曾提出“今天借你一杯水,明日还你一桶油”的口号,而板芙镇的领导班子则实施“今天让君一杯水,明日酬我一桶油”的策略。这“让”与“借”一字之差,这先“予”后“取”的方略,反映出板芙镇决策者们的胆识和勇气,尽管有人对此有不同的意见甚至非议,认为这样做是吃“太公山”。但他们认为这样做是正确实施上级给予的优惠政策的具体体现。基于这一认识,他们制定10条优惠措施即:税收从优,厂租从惠,地价从低,管理从活,水电通讯安装从快,出入境手续从便,自带生活用品从宽,协办项目从简,劳务收费从廉,奖励从重。这些措施的出台及实施,一下子便吸引了大批外商前来购地投资,至目前为止,已经转让和正在转让的土地超过1900亩,房地产市场迅速兴旺起来,地价随之上扬,收益大增;其次,由于外商纷纷投资办厂,不但提供就业机会,而且还招收大批劳工,协办服务费就十分诱人。如香港美力时塑料制品厂(中山)有限公司三年内计划投资总额1.5亿港元,总建筑面积达10万平方米,三年内招收劳工10000名,公司每年就向板芙提供十分可观的服务费;而且外商的大规模投资,伴随着各种新兴行业应运而生,综合经济效益迅速提高,1991年,仅税收一次就是1989年的三倍多。板芙人终于尝到了先“予”后“取”的甜头。

###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板芙镇之所以能在短短的两三年内，吸引大批外商来投资，除了上述的各项措施外，还在于板芙人的“诚信”和“务实”的作风。镇委李书记曾深有感触地说：“招商办厂，心要诚恳，言要诚实，行要诚信”。他们在与外商接触中，对办厂的形式、程序、政策如何优惠、收费如何计算等均和盘托出，绝不含糊，能办的事努力去办，办不到的事不随便许诺，不言过其实。为了方便外商投资，镇里专门设立外经工作办公室，国土管理所，房地产开发服务公司等机构，以第一时间为客商协办立项、征地文件、申领牌照、开设银行帐户等手续，还经常组织供水、供电、通讯、城建等部门联合现场办公，为外商排忧解难，解决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正是板芙人这种“诚信”“务实”的作风，深深打动了外商的心，不少外商不仅自己扩大投资规模，还牵线搭桥，介绍其他商人前来办厂。有这样一个事例：港商黄泽鸿先生十年前就在板芙办了一间艺术蜡烛厂，但一直对板芙缺乏足够的信心而无扩大生产规模，经济效益不佳。经过近几年的接触，黄先生确实被板芙的领导者的作风所感动，下决心全力投资板芙，征地97.8亩，首期投资585万美元，以独资方式办起了美力时塑料制品厂(中山)有限公司。此外，他还邀请台湾、香港两家公司的洪姓、陆姓的先生来投资办厂。所以板芙人风趣地对黄先生说：“过去是黄先生一枝独秀，现在又多了洪(红)、陆(绿)两色，真是一花引来百花开，万紫千红进军来呀！”

板芙人的“先”“快”的指导思想、“借风扬帆”的策略、先“予”后“取”的战术、“诚信务实”的作风、“开拓创新”的精神，终于使板芙脱贫致富，经济建设有了质的飞跃，并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党的十四大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给板芙人以更大的鼓舞。因此，当李书记谈及今后的发展时，提出了更大胆的构想：一方面要继续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外商来投资；另一方面，经过几年的努力，板芙已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因而要大力发展属于自己的企业，要从“借风扬帆”向“造船出海”迈进，把板芙建设成具有现代特色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多功能的卫星城镇。

责任编辑：有能

# 价值转化规律论 (上)

——《价值转化工程》之一章

黄锦奎

整个完整的价值学体系是由价值哲学、价值学、价值转化学、价值转化工程组成的庞大学科体系。价值哲学主要研究价值观,价值学主要研究价值的本质特点与运动变化规律,而价值转化学属于技术科学,主要研究价值转化规律与方法,价值转化工程是研究价值转化的软技术。鉴于国内外对价值学的研究主要是价值哲学,对真正意义的价值学研究甚少,而对研究价值转化规律与方法的价值转化学则几乎空白。所以研究价值转化工程,首先必须研究价值转化规律。

价值转化规律是价值按自身本质特点,在主客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下发展变化的规律,是价值学研究的核心。价值转化规律根据不同层次和各自的分类特点,可分为一般规律、宏观规律与微观规律以及特殊规律、软价值转化规律等。

## (一) 价值转化一般规律

价值转化的一般规律,是价值转化宏观规律、微观规律、软价值转化规律等的共同规律,是这些规律的抽象,带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本人认为,价值转化一般规律,可以包括价值转化能力律、最小量律、最大量律、时态律、稀有价值律、风险价值律、空间价值律、相关效应律、滚动增值律、良性循环律、信息律、系统律等十二条规律:

### 1. 价值转化能力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一致规律(能力律)

价值转化最主要的是人工创价转化。人工创价,是人类根据自己的价值意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工艺与工具进行改造客观世界,促使价值转化,创造出有价值的东西,以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它是与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的能力相一致的。而能表现人类征服客观世界的的能力的重要标志,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所以说,价值转化能力取决于人类征服客观世界的的能力,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一致。这个规律告诉人们,只有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才

能为社会创造更大财富,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主要取决于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例如,电磁理论转化为电工技术,使生产电气化;又如,化学反应催化剂,使正常条件下需要数年才能进行完毕的反应在瞬间完成,生物工程技术缩短了植物和牲畜的生长周期。这些价值转化的现象,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或增强了人类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的能力。

科学技术使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不断提高和深入,同时,使人类越来越多地认识对人类有价值的东西,发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的价值资源。因此,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也使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内容得到扩大和更新。

就任何一种物质财富来说,其价值来源首先出自它的自然属性,是它所具有的使用价值。科学技术对直接生产力的变革首先是就劳动对象而言的。劳动对象内容的扩大与更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石器、青铜器、铁器分别是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标志。近代大工业形成以来,钢材为主要材料,化石燃料成为主要辅助材料。材料的性能主要取决于分子结构。在量子学、结构力学进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分子工程学,专门研究微观分子结构与宏观性能,并且有目标地设计分子结构,根据该结构来生产材料,使其性能适应不同产品特殊的使用价值。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已深入到分子的层次,从而对材料自然属性的调节已进一步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各种塑料、化纤、橡胶等高分子材料的性质,各种合金以及化工中的特殊催化剂,都是随着分子工程学的发展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分子生物学、量子生物学使生物工程得到突破,人类将有目的培育出各种特殊用途的物种。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开拓新的能源,各种形式的自然能源随着技术的不同渠道转化为直接的社会生产力。劳动对象内容的扩大与变革不断扩大与更新着构成物质财富的实体,又解决着用加工这个财富实体的需要的能量等问题。

人类按照物的规律改造物，运用自然的能量改变物的客观属性，生产出具有特殊用途的产品，创造出社会的物质财富，又取决于劳动资料的技术水平。随着劳动对象的扩大与更新，劳动资料内容也得到扩大与变革，劳动技术水平也得到了不断地提高。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劳动工具发生了质的飞跃性变革，这种变革突出地体现在电子计算机上。从而使人类劳动工具不仅仅是直接操纵工具的劳动器官的延长、扩展、提高，而是人类社会劳动的智力的结晶，机器代替、扩展、提高了体力功能，而计算机在工业中的应用代替了人脑的许多功能。随着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发展，计算机运算速度，存储能力不断翻倍，使生产在许多方面达到了单靠人脑所达不到的水平，将生产的自动化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使人类的价值转化能力发生神奇的新变革。如果把今天的世界与300年前的世界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人类的物质文明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蒸汽机、内燃机、电动机、铁路公路网、通讯网、电力网、汽车、火车、喷气式飞机、火箭、人造卫星、电视、录像、冰箱、高级音响、计算机、机器人、高层建筑、核能、电子对撞机、登月工程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人类物质文明的代表作。在30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历史与实践证明，人类的价值转化能力与创造价值的能力，取决于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取决于人类科学技术发达的程度。也就是说，人类的价值转化能力是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一致的，价值转化能力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综合表现。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愈高，价值转化能力越大，其价值转化速度愈快。这是一条重要的价值转化一般规律。

## 2. 价值转化最小量规律(最小量律)

法国著名的农业化学家李比希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就是最小量定律。最小量定律认为，农作物的产量往往取决于所需要的最小量元素。由于每种细胞都是由几十种元素组成的，而且每种元素都有特定的作用，不能互相代替。如碳，虽然在细胞中其含量最多，但如果只有碳是构不成细胞的。构成细胞的蛋白质不但需要碳，还需要氢、氧、氮等基本元素，如缺少了铁就形成不了血红蛋白。又如钴在一般脊椎动物细胞里仅仅含有万分之一，而缺了它细胞却不能生活。据统计，现在发现的动植物细胞含量极少，但不能没

有的微量元素就有十多种。至于特定元素就更多了。最小量定律在农作物生产、动物饲养和人体健康等方面有着重大的意义。同样，作为价值转化基本规律之一，也有价值转化最小量定律，它是价值转化理论的基石。价值转化最小量定律认为，价值转化往往取决于所需要的最小量的因素与条件。价值转化受各种因素与条件的影响。就组成价值本身也是由许多因素所决定的，每个因素起特殊的作用，相互不能代替，缺了一个因素就会使某一东西贬值，或者形成不了价值。有时组成价值的某一因素虽是微不足道，但它却是极其重要的，缺了它就不行。在价值转化过程中，有时只差举手之劳的某一条件，就使“大功”不能告成。

价值转化最小量规律告诉我们，研究价值转化工程，必须认真分析影响价值转化的“全”因素与条件，特别是那些构成价值影响价值不可缺少的特定因素与条件。而在现实客观世界中，往往又有许多缺少最小量的因素与条件的价值转化对象物，存在于人们的视野之外，却又是价值转化工程的最佳选择的价值对象。所以，价值转化的最小量规律对于我们研究价值转化工程、选择确定价值转化对象、分析其转化因素与条件、探索其转化途径与方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最小量规律的另一面是价值转化的最小量代价。香港经济起飞发展的高增值加工业，投入少量的劳动或技术、或工艺，便使价值大大增加，就是运用价值转化最小量规律的成功例子。现实经济生活中也有许多例子。如巧用包装可以坐收渔利。报载：榨菜是四川特产，大坛包装获利甚微，上海有商店买进后，将大坛改为小坛，获利见涨；香港人更精，买入后破坛切丝，装入铝箔小袋中，获利又倍之。乌龙是福建名产，日本人酷爱。我国年年出口皆以木桶储之。日本人买入后送往加工厂，拆桶煮茶，成乌龙茶水，装入易拉罐，年销量达三亿美元。这些例子就是价值转化最小量规律在日常经济生活中精彩的应用。

## 3. 价值转化最大量规律(最大量律)

也称价值转化的资源最大量利用的规律。价值转化实质上是资源利用的转化，也就是要求我们最大限度的有效利用资源。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通过合理的资源有效配置，可以使资源得到最大量的利用与转化，从而使一定的投入得到最大



的产出。这就是价值转化的最大量规律。资源包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资金资源、设备资源、信息资源、知识资源等等。资源配置是指各种资源在不同各种使用方向之间的分配。而资源有效配置指这些资源发挥了它应有的效益，在经济学上讲的是生产要素最佳组合达到利润的最大化。经济学家认为，凡是生产要素的配合比例能够改变生产函数，一般都具有如下特点：如果其他生产要素固定不变，仅增加某种生产要素而达到效益，那么效益迟早会出现递减现象。这就是边际递减规律，它的意思是让在技术水平不变而生产要素的组合比例可变的条件下，其它投入要素保持不变，只连续增加某一生产要素的投入量，产品在增加到一定程度后便呈现递减趋势，甚至出现负值。这个规律要求的是生产要素最适组合，也就是合理有效配置。不同层次有其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与有效性，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较高层次可以影响较低的层次，宏观上的资源分配不合理必然使微观上的资源利用率降低。另一方面微观层次上的资源利用率提高，有助于资源配置的调整，使其合理化。宏观层次的合理的资源有效配置主要是使每一资源合理分配，使之进入最适宜的使用方面，通过生产要素在广泛范围内全新组合，使生产要素发挥最大的作用，其实现的有效手段与途径主要有市场运行机制、宏观产业政策与管理体制以及国家宏观调控手段等等。微观层次的合理资源有效配置主要是如何在有限条件下组织和利用资源，即发挥现有资源，发掘潜在资源，使一定的投入能有更多的产出。其手段和途径主要是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强化科学的组织管理等措施来实现。资源配置过程在不同的层次可以表现其不同的运动过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过程首先表现货币全商品活动运动过程，因为货币要素是一切生产要素的代表，通过全部活动实现资源配置过程货币化进而导向资源配置的方向、规模、结构，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 4. 价值转化时态规律（时态律）

价值转化时态规律是指价值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同一价值在不同时间里表现其不同的价值；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由于具有不同的时态，使价值实现了转化。

时态律告诉我们，任何价值的东西都不是恒定不变的，也就是价值的时态。价值在不同的

时间内，由于受各种主客体因素影响，受资源、社会需求、社会经济条件、政治经济形势等影响，表现不同的价值形态，实现其价值转化。在一个历史时刻内颇具价值的东西，在另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里可能一文不值；在一个历史时期内的不毛之地，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可能价值连城。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很难找到不受价值转化时态规律支配的地方。人们习惯认为黄金可以保值，所以在政治经济动荡时期，热衷于储藏黄金。孰不知黄金也是随着金融市场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并不是恒值的東西。

时态律告诉我们，任何物品本身具有时间的价值。经济学有个时间价值原理，一笔货币作为储藏手段储存起来，数年之后，仍为同等量的货币，其价值可能贬值。但是，同一笔货币，如果作为社会生产资本或资金数年之后，就会带来利润，使自身得到增殖。这种现象被称为货币的时间价值，并在实践中被人们广泛地应用于投资决策和企业经营管理。

时态律要求人们，任何一个投资项目，不论证券、股票、外汇、房地产等，都是随着某种时间态势发生波动、推移、变化。参与这些项目的投资者要想取得利润，必须站在这一时间态势的同一走向，逆时而动，可能倾家荡产。因此，人们正是利用这一规律，因势利导，掌握发财时机。

时态规律还要求人们要有预见性，不能盲目“跟风”。古代范蠡的经营之道：“早则资舟，水则资车”，就是购进商品必须选择那些将来消费者最需要的商品暂且积累起来，以期将来市场缺乏之时销售。

#### 5. 稀有价值转化规律（稀有价值律）

稀有价值是价值资源的数量表现。价值资源数量稀缺，其价值本身表现为稀有价值。如钻石和铝都是碳元素组成，但钻石数量极为稀少，研磨后又能放射绚丽的光彩，因而价值千金。当人类能够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利用高温、超高压技术批量生产钻石之后，钻石也可能象红宝石那样大幅度降价。

稀有价值转化规律是价值跟资源的数量成反比的价值转化规律。也就是俗话说的“稀者贵、多者贱”。稀有价值规律在市场上的表现为供求涨落规律，稀有价值规律是调节资源合理配置基本规律，是观察市场的“晴雨表”。大家知道，商品的供求关系是市场问题的核心。在商品的供求矛

盾运动中，矛盾双方处于什么地位即那一方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并对矛盾的发展起主导作用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当生产不足、市场商品供不应求时，消费需求得不到满足，这使商品在自身的价值基础上增加了稀有价值，实现稀有价值正向转化，企业在市场上处于有利地位。相反，当生产过多，市场出现供过于求时，销售困难，商品积压，稀有价值规律产生负向价值转化，企业可能亏本或破产。因此稀有价值规律是价值转化一个很重要规律，也是市场经济一个根本规律。

稀有价值规律还为人们提供一条经营之道，即通常所说“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经营致富之道。古代商人范蠡“贵出贱取”就是这一高招。大家知道做生意是为了赚钱，贱买贵卖，获取尽可能大的差价利润。但何时买，何时卖，却大有学问。范蠡指出“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就是一种聪明的赚钱方法。有一故事，讲的是美国早期开发西部时，曾兴起过一阵“淘金热”，众多淘金者都想抱回“金娃娃”。有个叫亚默尔的贫穷农夫，也被这股热所吸引，来到了这片疯狂的土地，那时，山谷里气候燥热，水源奇缺，寻金人干渴难熬，甚至有人叫嚷：“要给我一壶凉水，我就给他一块金币”。这个农夫见状，断然放弃淘金而去寻找水源。挖水渠，引入水池，用细沙过滤，积储了大量的清凉饮水。当人们还在苦苦地寻找金矿时，他却赚到了大笔金钱，几年功夫便成了美国的大富豪之一。水，本身不如金的价值，但在水源奇缺这个特定的条件下，成千上万的淘金者的需求，使水身价百倍，成为稀有价值。农夫弃“热门”而求“冷门”，实现水的稀有价值转化而赚了大笔金钱。

稀有价值规律受时态规律的支配。稀有价值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不同的时间内同一价值的东西又表现其不同的稀有价值。

#### 6. 风险价值转化规律（风险价值律）

风险是指可能发生的危险。风险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不确定性。从事风险投资的人，有时一夜暴富，有时一落千丈，倾家荡产。人们有的对风险投资跃跃欲试，有的却望而却步。风险投资具有风险价值，从而带来丰厚的风险利润。风险价值转化一个基本规律就是，投资越大，风险越大，越富于投机性风险价值转化速度越快，所取得的利润与效益越大。巨额的财富收入与风险并存。

风险投资的行业有几个基本特征：(1)不确定因素多、干扰大、风险大、成功率低。(2)一旦成功，经济效益惊人。(3)情报信息灵，应变能力较强，投机性大。(4)需要有较多的资金保证。(5)知识技术密集、高级技术人才、专门人才荟萃。风险行业主要有股票市场行业，高技术商品生产经营等。股票市场是从商品市场演化发展起来的一种高级市场，与商品市场一样，它调整着资金资源的流动从而达到优化配置，创造最大的社会效益。但它比商品市场更具有意义的是把从前无法进入商品市场进行交易的整个企业化整为零，带入股票市场进行更广泛更活跃的买卖，扩大了市场的外延，为全社会所有资源的合理利用提供了有效的组织方法和调控机制。股票市场是经济和社会的“晴雨表”。在西方发达国家股票市场繁荣还是萧条直接反映了经济和社会的状况。目前，公认的最经常使用的经济和社会“晴雨表”，要数“股票价格指数”。大家都知道，1987年10月19日美国纽约华尔街股票市场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数一天之内暴跌508.32点，跌幅达22.62%，意味着持股者手中的股票一天之内就贬值二成多，5000亿美元随风而去，相当于美国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8。华尔街之上空的这场龙卷风瞬间变成了全球大风暴，使伦敦股市、东京股市、香港股市出现历史性大暴跌，对美国以致全球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

高技术商品生产经营企业，由于探索性强，技术复杂或技术不成熟，不确定因素较多，创新程度高，因而在技术开发应用中，遭到这样或那样的失败，是屡见不鲜的。据有关专家估计，美国风险企业中，十个中有两个完全失败，六个经受挫折，只有两个可获成功，其成功率只有20—30%。但是风险企业若经营得法，一旦成功，就能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减低生产成本，大面积扩展国内外市场，获取惊人的巨大的利润与财富，使企业兴旺发达。高技术商品生产经营企业原材料、消耗和能耗低，产品成本低，产品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高，容易赚钱。另外，高技术产品附加价值较高，产品一旦装上微处理器，价值就大不相同，生产效率也随之大大提高，出售的价格就能提高几十倍、几百倍，由此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效益就难以估量。美国的软件开发公司，一个空白磁盘只值五、六美元，若一输入程序，作为软件出售，就身价百倍，价格

可达到四、五百美元。所以风险企业为人家带来巨大风险利润，象磁铁一样吸引人们。

### 7. 空间价值转化规律（空间价值律）

空间价值是指某一东西在空间关系上形成的价值。空间价值转化是较为普遍的价值转化。大家知道，资源在空间有不同的分布，同样价值在空间也呈不同的分布与差异。同一东西由于本身所处的空间关系的不同，表现出来价值也不同。价值在不同空间分布产生差异流动，实现了价值的转化。

空间价值转化规律表现为(1)“低往高处流”，价值资源多而价值低的向价值资源缺价值高的方向流动。(2)聚集效益，价值资源密集的空间，价值资源互为条件、互相补充、互相促进，形成群体协作的“密集效应”，价值转化能力强，价值转化快，空间价值高。(3)空间价值转化受信息的制约，其价值转化程度与信息量成正比。空间价值转化的这三条规律反映了价值资源的流向，价值资源的密集效应及信息在空间关系上的基本特点，它是投资环境理论、区域经济理论以及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理论基础。

对空间价值及其关系的研究，许多著名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观察与研究。有法国地理学家拉采尔的环境决定论，德国经济学家屠能的孤立国理论，韦伯的工业区位论，德国的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的城市区位论，迈达尔的极化效应理论。不少国家应用了这些理论。如日本根据克里斯塔勒中心地理论形成日本的东京、近、中部、北九州四大经济圈，虽然这些经济圈面积只占整个国土的24%，却拥有日本人口的60%和工业总产值的75%。四大经济圈的形成与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日本经济的起飞，使日本一跃成为仅次于美苏之后的第三经济大国。联邦德国根据迈达尔的极化效应理论，形成了高度密集的德国重心区，象鲁尔区，它不仅以其生产力的高度密集而闻名于世，还以其相当高的经济效益使世人刮目相看。在这一地区，由于生产力的集中配置有利于各种生产要素的相互补充和综合利用，产生了

巨大的地区综合效益。还有美国根据韦伯工业区位论，形成了东北部的制造工业带，石油化工工业带以及农业的“玉米带”“棉花带”“小麦带”及其它谷物带等几十个农业经济地带。美国经济地带的形成和发展，使美国的地理资源和资金优势得以充分地发挥，尽管战后世界经济形势风云多变，美国仍保持着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位置。

近几年来国内兴起了投资环境评价的研究。所谓投资环境，就是投资地点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中影响投资的一切因素的总和。实质上是投资空间的价值转化因素，核心是空间价值的问题。为什么外商要到你这里投资，不到别的地方投资，这里就涉及到空间价值转化的最一般的问题。国外对投资环境理论研究始于60年代末，经历了二十多年，形成了多种投资环境评价方法，代表性的有(1)以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斯托栢的“等级尺度法”。(2)美国经济学家依西阿·科得弗克和彼得·班尔的“冷热法”。(3)美国道氏化学公司的投资环境评估法。(4)香港中文大学闵建蜀教授在罗伯特提出的“等级尺度”法基础上提出的“多因素评估法”。还有详尽分析法。这些评价方法对我们评价投资环境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外商投资，其根本目的是获取高额利润，实现资本增值。其主要通过稳定地获取廉价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以及占领海外市场，利用优惠的政策等实现投资的目的。所以外商投资者选择预期目的好、风险性小、获利机会多、经营环境好的地方，进行投资。良好的投资环境，必须具有优越的地理环境条件，资源丰富，良好的基础设施，包括邮电通讯、能源水电供应、交通运输等，此外要有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雄厚的科技实力立足的科技人才和劳动力。投资环境的评价实质上是一个对投资地点空间价值转化关系各因素的综合评价。

(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深圳市卫生局  
责任编辑：石成

# 当代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和经济改革

何 东 霞

现代产权概念是一个包括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和使用权在内的多元权能结构，以现代产权概念对中国当代农村土地制度加以剖析，把中国土地制度中体现的人与人的经济关系进行层次分析，我们会有一些新的发现，以致不得不从传统理论的误区中走出来，重新整理深化农村经济改革的思路。

## 一、农村集体是土地所有者吗？

根据1988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集体是劳动者的联合体，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前，农村中联合劳动的真实集体确实存在过，农村生产队是一个统一经营管理的经济组织，一个纳税人和土地所有权的法人代表。但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后，集体经济组织名存实亡，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不复存在。在土地所有权的真实主体缺位的情况下，我们不禁要问，农村集体是农村土地的所有者吗？

从理论上说，虽然“包干到户”，农村集体经济处于“统一管理、分散经营”状态，基本性质未变，但是，许多地区的实际调查表明，集体经济基本处于“空壳”状态，有“分散经营”而无“统一管理”，而这种现状在中国农村的存在又有其客观必然性。因为一方面，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力基础是传统农业技术，我国农村平均每361个农业劳动力拥有一台机引农具，每万名农业劳动者拥有一台联合收割机，每672人才有一台农用载重汽车，<sup>①</sup>农业生产中主要沿用牛拉犁、手插秧、肩挑担、锄松土、镰割稻的生产方式，只有手工劳动基础上的简单协作，简单协作本身并不产生以自然村或行政村为单位统一管理的必要性。另一方面，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后，“统一管理”已不具备“责、权、利”基础，在可能性上也被否定了。土地按人口平均承包后，每个人都只是自己“份地”上的代表，无权代表别人或整个集体，“村民委员会”只是在土地分配和土地调整时起作用，一旦土地承包稳定下来，这些委员们就只拥有管理自己的土地。即使个人有高度责任感，愿意承担管理义务，也不会给简单协作的农户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因而农户不会为此支付管理费用。从整个社会来看，管理费用的负担加大了农产品成本，降低了农业比较利益，不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没有经费支持的管理是不可能长久维

持的。

在土地所有权没有集体经济组织作为载体的情况下，在农村，土地所有权的归属仍然是不确定的。如果说集体在土地制度中也扮演一定角色的话，集体只是土地占有者，而占有并不等于土地所有权权能结构中的土地占有权，因为集体的占有没有任何经济利益的实现形式，集体不能征收地租和土地财产税，它不是所有权的一部分，以村社为单位占有土地，仅仅是排他性占有，使村与村之间有了明确的土地界定。占有是一种事实状态，占有是永恒的，在国家和法都消失了的时候，占有依然存在。

## 二、谁是农村土地的所有者？

在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关系中，国家的土地所有权权能是最全面的。表现在：

第一，国家的土地收益权。现代所有权观念已经由绝对所有权向收益权转化，所有权的体现形式就是收益权。国家从农村土地获得的收益有：通过征收农业税、农林特产税获取土地地租；通过农产品“合同订购”形式索取剩余农产品或农业剩余价值。除了国家之外，农村集体无权向农民征收贡赋。农民在“交够国家的”之后，“留足集体的”，而“公益金”“公积金”性质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它与土地几乎没有关系，相当于互助合作基金或共同基金。

第二，国家的土地交易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但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农用地向工业用地的转化、向城市建设用地的转化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国家向集体征地过程就充分体现了国家作为土地所有者主体的地位。首先，国家向集体征地，集体（使用土地的农户）只有被征的义务，而没有拒绝被征的权利。其次，征地的补偿条件由国家明文规定，集体讨价还价的余地只能在估算、计量方面回旋。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交换是所有权的让渡，价格作为交换所有权的条件，是应该由双方协议决定的。而目前国家征地取得土地所有权，就象一个商品买者自己订价而不需要卖方同意，这样做可以行得通，唯一的解释就是卖者所卖商品本来就是买者的，国家本来就是土地所有者。

由于国家掌握了土地收益权和土地交易权，在土地所有权权能结构中，国家有土地所有权、支配权、收益权和转让权。广大家庭承包户从土地所有权中分享的权能是土地占有权和使用权，在土地承包期限内，农户占有和使用土地，在土地上耕种，土地上收获的产品，在完成国家义务后的剩下部分，就是农户土地占有权和使用权的经济实现。

## 三、土地制度和农业的困境

当代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实质是，土地国家所有、农户经营，而采取了土地集体所有的形式。正是这种形式本身，使农业经济发展受到限制，造成农业落后和徘徊。

首先，这种基本处于无主状态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因为没有一个是行使土地所有权来操作土地经营的主体，也就不能以效益原则来搞活土地经济，农业中土地这种基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被固定下来，以不变应万变，造成农业经济动力不足，没有活力。

十多年改革后的中国城市工业，已经有国营、集体、私营、中外合资和合作、外商独资、个体经济等各种经济成份，而在农业方面，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集体所有制，却是农村中基本的和唯一的经济成分。虽然在深圳等地有农村股份合作制的尝试，在一些地区进行了“两田制”、“三田制”改革，但仍然以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基调，农业经济比较繁荣的地区，是活一块，死一块，在土地之上尽量掠夺地力，获得短期收益，对土地本身的保护与管理没有兴趣。虚的土地所有制形式甚至将改革前的国营农场和农民自留地也淹没其中，国营农场被承包，自留地也转化为承包地。因此，在城市工业经济中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各种收入分配形式和各种投资经营形式并举的万马奔腾的竞争市场之时，农村仍然处于单一所有制结构、单一收入分配形式和单一投资主体的刻板模式之中。

农村中没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农业生产力的成长就要受到阻碍。生产力经济学认为，生产力的成长表现为它的性能和水平的更新换代，每一代生产力都要经过“孕育→诞生→成长→成熟→蜕变”的循环，而每一代生产力都必须以前一代生产力为既定的基础和前提，新一代生产力对老一代生产力起“催化”和“催熟”作用，老一代生产力又对新一代生产力起“催产”作用，所以生产力应该是“多代同堂”的。生产力多层次要求生产关系采取多种形式，单一的所有制形式破坏了生产力成长的周期规律，新一代生产力产生和发展受到旧所有制形式束缚，使农村落后的生产力难以被替代、被扬弃，农业现代化难以实现。

其次，这种土地集体所有制形式造成小规模、小而全经济遍地开花，阻碍农业的专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这是中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迈进的主要障碍。既然作为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发包方”——农村集体没有自己的独立经济利益，没有土地收益权，农村集体分配土地就只有采取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以公平优先，不考虑土地经营效率。掌握了土地经营权的农户，在农产品生产和销售中遵循市场价值规律，收益好坏有差别，但是他们永远不会失去土地，土地也不会转让到高效率的农户手中。这样，农村中分散的小规模经营格局很难打破，生产社会化和分工协作关系难以形成，农村市场发育极其困难。有些学者曾经对我国商品率进行过估计，我国目前农业商品率在40%左右，<sup>②</sup>而在这40%的出售商品中，国家定价比重为24%，国家指导价比重为19%，市场调节价为57%。<sup>③</sup>如果把国家定价和国家指导价出售的商品扣除，农产品完全由市场调节的比率在25%左右。我国这种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农业生产，正如发展经济学所指出的，是一种市场对供给调节不力的低敏度经济。当农产品价格上升时，农产品的供给量不象工业品的供给量那样随之上升；当农产品价格下跌时，农产品的供给量也不象工业品的供给量那样随之下降。农业生产对市场价格信号反应不敏感，甚至有时候，市场规律起反向调节作用，当农产品价格下跌时，农民反而扩大生产和“倾销”农产品，使得农产品过剩和谷贱伤农的情况愈加严重；当农产品价格上涨时，农民不仅不扩大生产，反而产生“惜售”心理，减少农产品卖出，甚至可能成为农产品的买主。

农业中的这种自然经济运行机制，使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功能不能充分发挥，小农

业和大工业矛盾突出，反过来限制了农业的发展，使农民陷入贫困恶性循环之中。

#### 四、出路——改革现有的农村土地制度

生产力落后和商品经济不发达是当前我国农村经济中的最突出、最严重的问题，而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是这两大问题的症结所在。解决农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必须从改革现有土地制度方面入手，而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取消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把土地所有权落到实处，所有者、使用者、支配者都以法人身份到位，实现明确的土地所有权关系、经济利益关系，推动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我们的基本思路是，目前国家实际上是农村土地的所有者，土地的特点，它在一般生产资料所有权含义上，还外加了主权的内含，土地所有权又是一国主权的象征；同时，土地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它是国家和民族的共同财富，土地的治理、保护是全局利益所在。由于土地的这些特点，在很多私有制条件下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对土地实行国有化管理。我国是一个生产资料公有制国家，又是土地资源短缺、人多地少的国家，在改革中农村向城市化发展，在开放中利用外资开发土地和资源，都需要有一个全局的、统一的土地管理中心，应该实行农村土地的国有化。

具体设想是：在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已实施几十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不宜以“土地国有化”运动来冲击现有的稳定的土地所有制，只能通过改革租税制度逐步使土地国家所有的事实合法化、明朗化，让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形式逐步消失。

第一步：把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统一到土地财产税上来。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是对农业收入征税，不是直接对土地使用者征税，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的征收既不能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也不能保证土地的稳定贡献，还要以“合同订购”形式作为国家收入的补充，对此学术界异议较多。1988年9月国务院颁布了《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规定了各类城市土地使用税税额，对抑制滥占、滥用土地起到了一定作用。在农业方面，学术界提出征收土地财产税，也是直接向使用土地的农户征税，农户直接向国家交纳土地财产税，就建立起了一种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的关系，并且逐步形成统一的城乡土地税税额，实现土地国有和宏观土地利用效益。

第二步：取消合同订购制，直接向土地耕种者收缴地租。目前的合同订购制既不是税收也不是地租，而是农民对国家贡献的主要途径。如果国家直接以土地所有者身份出现，向农户征收地租，省却了商品交换的形式，同样可以得到稳定的收入。在全国16亿亩土地中，高产田每亩缴实物地租150斤，中产田每亩缴100斤，低产田缴50斤，每年就可征得1400~1500亿斤粮食，其实，保证全国城镇人口口粮和工业用粮，有1000亿斤粮食就够了。国家征收实物地租的好处在于，一方面，通过县一级政府出租国有土地，为了获得稳定的地租收入，出租者会选择高效率的农户经营土地，这就保证了土地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租得土地的农户可以选择合作、私营等各种形式经营土地。另一方面，国家以经济手段管理土地，地租之外的农产品完全由市场调节，可以促进农产品商

品率的提高。

第三步：在统一土地财产税和地租收益，实现了土地国有化以后，耕种等量等质土地，向国家、向社会尽义务相等，这是一种新的平等。竞争环境的平等，打破了原来土地占用均等的僵化无效率局面，体现效率优先原则。生产者在完成国家义务后，销售农产品收入全部归个人，但是土地规模经营是农户有利可图的前提，这就必然有一些人租种大面积耕地，这样有利于专业化协作和分工，有利于机械化、化学化；一部分人从土地上分离出来，可以从事农村的服务业、农产品加工业，为在农田上高效率生产富起来的农民提供生产、生活服务，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 and 多种经营形式并存为那些不直接租种土地的人提供就业机会，也为农业生产积累资金，这样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就有希望了。

①见熊映梧、吴国华等《论产业结构优化和适度经济增长》，《经济研究》1990年第3期。

②、③见林文益《略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市场发育》，《商业经济与管理》，1991年第3期。

作者单位：广东商学院经济系

责任编辑：郑英隆

---

（上接第84页）

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3）改革农业科研、教育体制，兴办科技实体，开辟农村科技市场，提高科技成果的商品率。（4）建立强有力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在价值规律和生态规律的支配下，促使科技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均衡。

（五）价格、金融、财政和税收等政策 持续农业发展要面向市场。为此，国家应制定并实行合理的农产品价格政策，逐步消除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使农产品总价格水平不低于农产品总价值。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建设农产品批发市场和专业市场，开展期货交易，并逐步开放生产要素市场，制定严格的市场规则，加强市场管制。改革农村金融体制，实行政策性功能与营利性功能分离的金融政策，应设立主管农业中长期投资的专业银行——土地银行，政府以无息、低息、贴息贷款，委托放款，税收优惠等方式和手段，进行政策诱导，促使土地银行积极资助土地开发、国土整治、土地转让和发放农业中长期投资信贷，全面改善农业的基础生产条件。国家和各级政府财政应重点支持农业科技进步，大型农业生态工程建设，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后备资源开发。改革税制，把土地税从农业税中分离出来，建立土地税制。土地税制的建设，应从耕地入手，逐步覆盖其他农业资源以至整个自然资源。当前可以开征四种土地税：一是土地收益税；二是宅地占有税；三是土地增殖税；四是土地特殊税，包括农地占用税、土地闲置税和土地保护税。通过税率水平和结构的灵活调整来有效地调节农业资源配置结构，并规定将一定份额的土地税用于土地开发和设立农业发展基金。

①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经济调整中的农业危机与出路》，《管理世界》，1990年第1期。

②参看拙作《要素创新：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抉择》，《粮食经济研究》1991年第1期。

作者单位：南京农业大学经贸学院 责任编辑：谭湛明



# 我国农业向持续农业转化的政策选择

高 波

## 一、农业机制的困境及其改造

改造传统农业是发展中国家长期不懈的经济行为，中国也不例外。进入80年代以来，我国传统农业改造步入突进发展阶段。从整体上判断，当代中国农业正处于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混合的特殊时期。但是，这一阶段农业机制的演化，又使农业陷入了结构性的困境之中。一方面，传统农业机制的生产力增长潜力已达到了极限，集中反映在两点：一是在现有农业技术条件下，农业投资报酬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递减趋势；<sup>①</sup>二是作为中国农业主要的生产投入要素——土地和劳动对农业生产力增长的贡献日益下降。由于土地稀缺，农业扩张的空间十分狭小，而劳动投入对土地和资本的替代效能释放殆尽，劳动集约度的加深对农业的增长几乎是无效的。另一方面，尽管现代农业要素向传统农业机制的渗透与转换是快速的，但不能不承认现代农业因素的成长对农业增长的贡献仍停留在短程和局部的意义上，基本上是由良种繁育与推广、化肥、农药、灌溉、电力、机械和大型水利工程的发展来推动的，而这些要素的配置机制发育不健全，一旦来自要素供给或需求方面的动力不足，必然引致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因而一种对农业发展产生持续、富有成效影响的农业机制尚未形成。而且，由于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在要素结构、资源配置、技术体系等方面的显著差异，传统农业机制和现代农业机制的撞击和磨擦还可能对农业增长带来不利的震荡和扰动。我国农业出现滑坡的隐患正在于此。

诚然，掣肘农业增长的因素不只是农业机制方面，还有来自体制、政策等社会经济环境方面和农业资源方面的约束。社会经济体制及其宏观环境对农业增长的作用反映在资源配置效率上，这类障碍可以通过继续深化改革和政策调整来排除，而农业资源禀赋作为一种客观历史与现实的延伸，是中国农业增长与发展的硬约束条件，不能指望仅靠几项改革措施而速见成效并一劳永逸，从总体上看，中国农业资源的特点是：自然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极度稀缺，技术资源与物化资本短缺，农业劳动力过度剩余但人力资本却十分贫乏，而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条件正在恶化。因而即使现代农业要素发育成熟，我国脆弱的农业资源支持系统也很难维系现代农业机制的现实运行。<sup>②</sup>中国面临着与工业化国家不同的发展环境与增长机会，在资源刚性约束下，不得不寻求新的农业长期发展的模式。

因此，必须从长远和全局的意义上，重新构造我国农业机制，充分考虑现实农业机

制、社会经济体制和资源生态条件等约束变量，培育出一种生态上健全、经济上合理和技术上适用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农业机制，即实现由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混合的农业“双轨机制”向持续农业机制的变迁。所谓持续农业是指以要素创新为手段，以农业结构改造为动力，以在生态环境资源良性循环基础上追求经济指标的最大化为原则，自然发展与经济发展相配合，从而实现农业总和生产力的阶段性、持久性的稳定、协调增长的一种农业发展模式。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倡导的生态农业建设对发展持续农业意义深远，甚或我国的生态农业实践将是持续农业发展的现实途径之一。可见，建设持续农业既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必然选择，又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当前，应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明确农业机制转换的政策含义，构建强有力的政策支持系统。

## 二、持续农业发展政策的目标取向

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启动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混合的“双轨机制”的转轨，诱致持续农业机制的成长，从而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是我国农业长期发展政策实施的基本任务。持续农业发展政策应包含三项政策目标：

第一，建立生态良性发展、资源稳定增长和环境持久改善的农业自然再生产系统，为农业发展提供良好的自然资源基础和生态环境条件。农业是与自然再生产过程联系最为紧密的产业，农业机制的发育与运行和农业发展受到自然再生产过程显著的制约。从本质上说，农业自然系统的发展意味着农业的长远和谐发展。一般而言，农业自然系统的发展目标是：（1）一定时期内自然资源的再生产量足以补偿其消耗量，使自然资源总供给的增长速度不低于资源总消耗的增长速度。（2）培育地区性可更新替代资源。（3）实现自然资源实物量和价值量的双重增殖。（4）保护农业自然环境，增进环境承载力。（5）逐步改善农业生态条件，维护生态系统动态平衡，增强农业生态系统的抗干扰力。当然，上述目标不是短期内一蹴而就的，关键是必须坚持合理开发利用和适度消耗的原则，进行强制性约束，从而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资源的浪费和破坏。随着经济的发展，对改善自然资源供给条件方面的投入越重要，因而必须培育自然资源投资主体，刺激他们向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进行投资。当前，就农业自然再生产过程而言，短期行为仍很严重，农业自然系统的过度利用和粗放经营现象并存，导致农业资源消耗的收益率很低。因此，应把提高农业自然生产率和资源产出效率作为农业体制改革、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经济结构转换升级的关键。

第二，推动农业经济稳定增长和经济结构优化，使人们生活质量长期改善的需要尽可能得到满足。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升级换代是持续农业发展的中心目标，在自然资源、环境、生态约束条件下追求经济目标的最大化乃是持续农业的本质，忽视了经济目标，农业就没有生命力，而超越自然条件的限制盲目追求经济增长，农业则会失去永续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在尊重自然规律，重视自然发展的前提下，农业发展的主要经济目标包括：（1）不断增进产品的产量和质量（清洁食品），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生活质量

改善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2) 在逐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保持土地生产率的持久增长。(3) 推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规模效益。(4) 开展技术创新,推广适用技术,促使农业技术效率的实质性进展。(5) 及时调整农业经济结构,推进经济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高度化。(6) 继续深化改革,建设规范、健全、高效的农业经济体制。结构改进是持续农业发展的关键,因而投入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乃至产品结构的安排和转变是实现经济目标的根本。近年来,农业发展的最大障碍是农业投入不足且缺乏足够的投资动力,农业的经济环境全面趋紧,不改变这种状况,则将阻碍持续农业机制的成长,农业持续发展的经济目标则成为空中楼阁。因此,必须改善农业投资环境,合理增加农业投入,切实增强农业发展后劲,实现持续农业的发展目标。

第三,促进农业资源配置结构合理化,实现农业生态经济的协调发展。从本质上说,通过协调农业资源配置比例关系,促进农业自然因素与经济因素的合理组合,可以推进农业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形成相互适应的良性循环,不断增进农业资源的总供给能力,实现农业的长期、稳定、协调发展。因而构建高效、灵敏、生态经济协调的资源配置机制是培育持续农业机制的基本任务。持续农业的资源配置机制必须由农业系统自我反馈机制、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机制密切协作耦合而成。自我反馈机制是第一层次的配置,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环境因子与生物因子的调节和平衡作用,籍以抵御外界因素的干扰和保持系统的相对稳定,因而它是其他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违背了自我反馈机制对农业资源系统的调节和覆盖,其他机制的效能则会下降。而市场机制则是核心层次的资源配置,是自我反馈调节基础之上极其重要的再覆盖,因为农业资源的组合配置若缺乏反映其稀缺性的价格信号和来自市场的魔力,就无法逼近最大的经济效率。当然,排斥基础层次配置且没有任何干预的纯粹市场机制,在分配资源方面也有其天生的缺陷,这种机制对资源价值的评估完全是由供求平衡关系决定的,有时则会扭曲资源价值的度量,尤其是在地质时间意义上形成的资源价值往往被低估了。由此可以看出,资源配置不可缺少最高层次的政府调控和相应的法律约束的覆盖。总之,自我反馈机制、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机制在农业资源配置过程中各司其职且具有互补性,不可或缺。现阶段,我国农业的市场化程度还很低,特别是尚未真正启动市场机制对农业自然资源进行价值评估,因此在培育资源配置机制的同时,要创造农业统一的市场环境,推进市场发育。

持续农业资源配置机制的运行目标是要取得最大的资源配置效率,形成合理的农业资源配置结构。持续农业资源配置结构合理化应符合以下四条标准:一是在资源数量配置上与资源的总量稀缺性高度一致。任何资源都具有稀缺性,具有供给的数量极限,绝大多数农业资源在一定时期内相对于需求的供给数量是有限的,因而有限的资源必须分配到生态效率和经济效率同步提高的生产项目上,数量供给短缺程度越高的资源越要安排好组合比例关系。与此同时,要积极寻求替代资源,提高替代效率,并推行资源发展策略,尽力增殖稀有资源。二是在资源的质量组合上与资源禀赋充分适应。不同生产项目对资源的品质要求不同,而丰度高、品位高的资源极其有限,因此应把优质的资源安

排到对资源品质要求高的生产项目上。资源供给质量的合理利用,无异于对资源数量的节约或高效利用。三是在资源的时间安置上与资源的时序性完全相当。自然资源虽然某些可以再生,但生成时间较长,如矿藏等资源甚至在地质时间尺度上才有再生的可能,因此应考虑资源开发利用的延续性,避免资源集中过量消耗,以至资源后续跟不上,形成资源断档。一般而言,资源也有一定的时效性,如劳动力等资源若不及时使用就不能创造财富而造成浪费,所以在一定时期内要千方百计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免资源闲置。四是在资源的空间搭配上与资源区域异质性密切吻合。我国各地区农业发展的自然、经济和社会条件千差万别,农业资源配置应当考虑各地区的差异,反映各地区的特点,诱发农业区域发展的活力。因此,要构造有序的区域配置机制,打破“区域壁垒”的障碍,建立区际间资源流动的规则,实行产业与地区适度倾斜的结合,完善对边远落后地区的扶持政策 and 模式,逐步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总的说来,持续农业机制的运行要求资源配置在数量上具有均衡性,在质量上具有级差性,在时间上具有长期性,在空间上具有全局性。

### 三、构造持续农业生长的政策支持系统

近年来,农业滑坡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向农业倾斜的呼声很高,但农业发展的宏观环境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善,并未从根本上建立农业长期持续发展的机制。农业的基础地位意味着只有农业走上了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才有希望实现国民经济的长期繁荣。因此,要从政策、科技、投入等各个方面改造当代农业,培植持续农业机制,促进农业的健康发展。从持续农业成长的政策供给角度考虑,要建立由如下几个层次形成的政策支持系统。

(一)自然发展战略 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系统的发展是持续农业成长的基础和基本前提,要在改善生态条件、加强环境建设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富化稀有资源。实施自然发展战略的关键是要处理好自然发展投资负担与分享问题。诚然,自然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改善及升级,必然引致农业自然生产率的长足提高。而自然系统发展给人们带来的实惠不只局限在农业方面,环境容量、生态承载力、资源供给量(可再生量)、自然景观的发展,不仅可以给整个经济增长注入强劲的活力,还能给人们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使人们在优美的大自然的氛围中得到陶冶。由此可见,自然发展的结果将引致全社会公共福利的提高,因而不能只靠农业来承担自然发展的投资,必须由国家和地方政府联合生产者和全社会的力量支撑自然发展,与此同时,要深入推行生态资源、环境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有偿使用,加强资源的价值核算,确定合理的资源价格,逐步积累自然再生产补偿基金。

(二)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策略 长期以来,我国采取工农产品“剪刀差”的形式强制农业剩余转向工业,强迫农民“纳贡”,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资本积累,这在工业化、城市化初期无疑是正确的。但时至今日,非农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农业不应再向工业提供剩余而必须转向于自身发展,工业也应支持农业发展。因此,从现在起

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政策不能再以牺牲农业为代价，而要为持续农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第一，从根本上改革现有城乡隔绝体制，使城乡和工农经济利益关系调整到互惠共荣、健康发展的轨道上来。第二，推进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创办股份制城市，打开农民和乡镇企业进城的绿灯，从而加速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转化。这里想就建设股份制城市的构想多解释几句。创建股份制城市要以现有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依托，选择少占耕地、景观优美、自然条件良好具有发展前景的地区，用于扩展的基地，进行股份制城市长期发展的全面规划设计，根据规划发行城市建设债券与股票，购买债券或股票达一定数额的农民和乡镇企业即可进城创业，并将城市土地折股用于筹集城市建设资金。建设股份制城市，由于节约交易成本利用外部经济并受到集聚效应的辐射，使进城的农民和乡镇企业得到很多实惠。与此同时，国家不仅减少了大量投资，而且随着城市化的进展还能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更重要的是，农业人口的相应减少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使农业资源结构得以优化，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创造契机，有利于农业的长期发展。第三，创建乡镇工业开发区，并与股份制城市建设相结合，实行乡镇企业在空间布局上向股份制城市适度集中。同时，要建立和完善乡镇企业的分配体制、积累机制和运行机制，积极推进乡镇企业股份制的改革。随着乡镇企业的健康发展，持续农业成长的经济环境将更加宽松。第四，积极扶持农用工业的发展，合理积聚农业物质资本。第五，制止污染行业向农村转嫁，逐步消除工业重污染源，强化农村环境整治。

（三）产业政策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农业与农村经济、农村经济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显得更加突出。因此，国家必须通过强有力的产业政策进行合理的结构调整和推进有效的产业组织成长，为农业的持续发展给予引导、调控、支撑。产业政策实施的重点是坚持向农业适度倾斜和适度发展自然产业，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化，支持农村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促进农业的综合经营，扶持农业服务产业的发育以及促使农业高新科技的产业化，限制和调整那些资源消耗大、经济效益低、环境污染严重的产业和项目。

（四）农业科技进步 科技进步是持续农业发展的支柱。促进农业科技进步的关键是建立农业科技投入的动力机制，增强供给能力，刺激有效需求。（1）明确农业科技发展的方向，在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大力开展应用研究；在重视农业适用技术研究的同时，重点加强适合农业本性的生态技术、生物技术和系统工程技术以及适合于农业的高新技术的开发研究，适当进行科技储备，提高农业科技供给的数量、质量和速率。（2）切实增强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者素质。劳动者对科技的吸纳能力和消化能力制约着农业科技的需求强度，而这种能力又与劳动者的科技文化水平以及掌握和应用科技的能力密切相关。因此，必须从战略上重视智力投资，加强农村的基础教育，发展职业

（下转第79页）

## 中共事前得知“西安事变”消息说质疑

蒋文祥

中共何时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有人认为，中共是事前得知，并言之凿凿：“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零时三十分，在‘西安事变’爆发前夕，张、杨就已经把将要发动‘西安事变’的消息，秘密电告了中共中央。”“这样，中国共产党在事变爆发前的五个小时就得到了‘西安事变’的消息（原文注：‘西安事变’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五时三十分爆发的）。”还说，“中共得到这一消息后，极为振奋。红军战士当夜举行灯火游行庆祝。”<sup>①</sup>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 一、事变爆发前夕，张、杨有何必要冒此风险事先电告中共中央？

据在“西安事变”前后一直担任杨虎城机要秘书的王菊人回忆：“事先，是不是通知共产党呢？这件事往返商量了好几次。第一次决定当晚（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晚上）通知，准备请毛主席派驻十七路军的代表张文彬（曾经担任过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以他们自己的通讯密码发报通知。决定这件事已到了下午六时左右。杨（即杨虎城）怕无线电报被南京方面窃收偷译出来，使机密泄露。叫人问十七路军总部李致远（原文注：专门窃收各方密报的工作人员），共产党的无线电报南京方面译得出来否？李说：南京方面偷收红军的无线电是能办到的，我当年在阎锡山那里，收到红军电报很多，但能翻出的很少，南京方面我不敢绝对保险译不出来。这时，电文已拟就，为了极端机密起见，准备请张文彬以他的名字或他的化名拍发。电报是发给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原拟电文为：‘闻此间即以实际行动，停止内战，迫其抗日，请迅速准备。’经过第二次和张（即张学良）商量，觉得等电报到了中共那里，我们把蒋介石已扣起来了，事先不必冒此风险。至于设想的中共准备工作，迟早也不在这几个钟头。这样，电报决定不发，当即在张、杨面前，把电稿烧了。”<sup>②</sup>

这段回忆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张、杨原来确实是准备打电报事先告知中共中央的，且“电文已拟就”。这就造成了外间不知内情的人把“准备打”误认为“已经打”。第二，事实上这封电报后来“没有打”。没打的原因是“怕无线电报被南京方面窃收偷译出来，使机密泄露”，而且“事先不必冒此风险”，反正“迟早也不在这几个钟头”。——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出自草拟电文的当事人之口，应该是较为可信的。

当然，最具权威的还是“西安事变”直接当事人张学良自己的回忆。张学良所撰的《西安事变回忆录》（台刊发表时标题为《西安事变忏悔录》，后又改题为《西安事变反省

录》)中说,他在同杨虎城计议,对蒋介石“决行强谏劫持之谋”时,“对于共党方面并未征询商议”,“知此者,除杨外仅少数人而已”。他还不止一次说到“谋变事前,并未同共党商讨”。<sup>③</sup>

那么,“共产党人究竟在西安事变中扮演何种角色呢?……他们与蒋介石的被俘事件没有任何牵连。”这是英国记者贝特兰在西安事变爆发后不久,经过43天实地调查考察得出的明确结论。

贝特兰在1937年7月由英国麦克米兰公司出版的《中国的危机》一书(1938年在美国出版时,改名为《中国的第一幕——西安事变的故事》)中说,“那晚参加策划举行兵变会议的人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员。设在陕北保安的‘中国苏维埃’总部,对这一计划毫不知情。”<sup>④</sup>

我认为,这三个人的回忆和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一个共同的事实,即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爆发前根本没有与闻这件事。

## 二、事变尚未发生,中共中央有何必要向红军战士发布事变预告?

既然说红军战士曾经“当夜举行灯火游行庆贺”,那么,红军战士是怎么得知这一消息的呢?根据逻辑推理和定向思维,只能是张、杨事先打电报通知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在得到这一消息后,又立即传达给了广大红军战士。

如前所述,张、杨事先并没有打电报给中共中央。退一步说,即使张、杨把事变将要发生的消息电告了中共中央,在事变爆发之前,中共中央也是决不会把这个消息立即传达到广大红军战士中去的。因为:第一,消息未经证实,是真是假不得而知。第二,消息如果属实,过早泄露就等于通知了蒋介石,出卖了张、杨。第三,传达总要表明态度:支持还是反对?反对,固然不会;支持,又难免有同谋之嫌。第四,中共此时作为一个已经成熟的政党,也绝不会就如此重大的问题轻率表态。

事实上,即使在事变发生以后,张、杨把这个消息电告中共中央时,中共中央也感到十分震惊。这也有张学良的回忆为证。他说,事变之后,“榜徨束手,问策无人”,便“立即电请周恩来来到西安,共商决策”。而“周等到西安时,告知良彼等初闻西安之变,亦深为惊讶”。<sup>⑤</sup>

还有张国焘的回忆可以从旁佐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近午,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我们阅看张学良发来的急电,其内容大意是:他曾向蒋痛陈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蒋则一味拒绝。他不得已实行兵谏,已将蒋氏及其亲信随员妥善看管,促其接纳抗日主张,不达目的不止。电报并说即派机飞延安,迎接共方代表周恩来等来西安共商大计。又说他和杨虎城的部队向西安潼关线集结,希望红军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区,衔接前进,以防不测。这个突如其来的电报,使我们都大为激动。”<sup>⑥</sup>

中共中央在得知“西安事变”消息后,经过了激烈的争论、冷静的思考和科学的分析、认真的研究,“考虑到保安(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地处偏僻,消息闭塞,不可能全面迅速地了解到西安的情况及国内外的反应,因此,决定暂时不发表声明,一切事

宜，包括对蒋的处置以及各种在保安难以估计到的复杂问题，均由周恩来来到西安后相机处理。”<sup>⑦</sup>

直至12月17日晚，周恩来一行赶到西安，当夜听取张学良介绍了局势变化和各方反应后，才第一次明确表态“中共中央对于事变的意见，主张和平解决。”<sup>⑧</sup>

12月18日，“中共中央才第一次公开发表宣言，致电国民党，呼吁和平解决。”<sup>⑨</sup>12月19日，中共中央才向党内正式下达《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

中共中央如此审慎地就这一重大事件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足以说明中共中央决不可能轻率地将尚未发生之事变向广大红军战士作新闻预告。

### 三、一点余论

事实已很清楚，张杨事先并未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也绝无可能事先向红军战士发布事变预告，因此可以肯定，在“西安事变”爆发之前根本不会发生红军战士举着灯火游行庆贺的事。

事实上，红军战士“举着灯火游行庆贺”的事是有的。不过，那不是事变爆发之前，而是在事变发生之后。而且这时候张、杨早已把蒋介石扣起来了，红军战士“举着灯火游行庆贺”的就是张、杨“临潼扣蒋”这件事。你想广大红军战士对在十年内战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蒋介石，个个无不恨之入骨，人人恨不能寝其皮、食其肉，现在听说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捉住了蒋介石，他们怎能不欢呼雀跃、游行庆贺呢？

然而，感情不能代替政策。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中共中央从一切有利于抗日、一切有利于人民的大局出发，理智而果断地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终于使“西安事变”成为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正确方针的确定，决不是因为事先得知了事变将要发生的消息，而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从遵义会议以后，已经从一个幼年的党成为一个成熟的党。它也充分说明了党的瓦窑堡会议确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

① 娄树石：《谁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最早倡导者？》参见《中学历史》1987年第3期第55页。

② 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参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146—147页。

③、⑤ 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录》，参见姚北桦、曹明撰《千古功臣张学良》一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97页。

④ 贝特兰：《中国的第一幕——西安事变秘闻》，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5—146页。

⑥ 张国焘：《我的回忆》，参见《一个叛徒的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288页。

⑦、⑨ 李海文：《周恩来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贡献》，参见《红旗》1987年1期第28—29页。

⑧ 高崇民：《西安事变杂谈》，参见《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页。

作者单位：江苏如皋市委党校 责任编辑：凌峰



# 罗素访华缘起

冯崇义

罗素是西方最后一代百科全书式大思想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中国思想界千载难逢的五四时期来华讲学，本是中国知识界的盛事，也是现代中西文化交往史上的盛事。但是，以往国内学术界却一般认为，罗素只不过是当时中国政治上反动或思想上保守的某一党派的客人，是梁启超等人将罗素请来为他们助威。这是一个大误会。

造成这一误会的原因很复杂，但主要是因为五六十年代那种特定的政治和学术氛围中，学术界形成了对罗素、梁启超等人的政治成见，并以这种成见为前提来评判罗素的中国之行。今天，我们才有机会去揭示历史的真实。

## 一、罗素是一位激进的思想家

事情还得从罗素其人谈起。应该说，罗素是一位很容易引起误会的人物。他生于1872年，卒于1970年。在他长达98年的生命历程中，罗素共出版了70余部著作、论文不计其数，其内容几乎涉及人类知识的一切方面。他是非常杰出的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又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他在物理学、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历史学等方面也很有建树。罗素思想的特色之一便是复杂多变，而且在他的心路历程中不乏象梁启超那样“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喜剧。因而，正确地理解罗素诚非易事。不过，对于罗素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思想，西方学术界所争论的只是激进的程度。象中国人这样将罗素视为一位保守人物，这在西方学术界简直不可思议。

自从罗素开始独立地思考政治问题，他便是英国统治集团的叛臣逆子。无论是作为一位和平主义者、作为一位社会主义者，还是作为一位独立不羁的知识分子，罗素与英国统治集团以及世界资本主义秩序战斗了一辈子。

在这里必须特别指出的是，罗素在20年代曾经为中国人的解放事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1920年10月至1921年7月，罗素在中国既看到了富有

魅力的古典美，也看到了中国的灾难与贫弱。他不象当时那些外交官和外国军人那样满以为中华民族软弱可欺而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也不象一些骄傲自大的西方传教士们那样一心只想著如何增加基督教徒的数目；更不象那些唯利是图的西方商人那样为了自己的钱袋处心积虑地利用和维持中国的落后。罗素殚思竭虑地思索的问题是：如何能够使中华民族摆脱备受奴役的地位、复兴其源远流长的文明，并从而使中国文明在整个人类文明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为了这，罗素诚挚地表示：“我愿为中国人竭尽微诚。”<sup>①</sup>

从1921年罗素访华归国一直到20年代末，罗素成了西方最走红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他在归国之初便连续不断地在英美一些较有影响的报刊上发表文章，谴责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与掠夺、探讨中国所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办法、展望中国文明的前景和出路。1922年，罗素在这些报刊文章的基础上写成了题为《中国之问题》的专著，在英、美两国同时出版。1924年，当港英当局支持的商团叛乱正密锣紧鼓地进行的时候，罗素发表文章揭露英帝国主义者这一可耻行为，而为孙中山所领导的广州政府辩护。<sup>②</sup>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罗素著文严正驳斥英国造谣惑众的官方舆论。<sup>③</sup>在1925年省港大罢工期间，罗素著文呼吁全世界良知尚未泯灭的人们都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sup>④</sup>当1926年北伐战争胜利进军、帝国主义列强策划进行武装干涉的时候，罗素又著文号召西方所有进步人士都行动起来，阻止列强在中国打击进步势力、维护最腐朽的军阀统治等等无耻行径。<sup>⑤</sup>罗素上述那些文章之立论尖锐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他在英国的一些好友也公开讥讽他神经错乱，英国的情报人员更将他列为危险人物。<sup>⑥</sup>

罗素的社会主义思想比起他的和平主义来要复杂得多。罗素的社会主义信念萌芽于1895年，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完全确立。1895年，

刚从剑桥大学毕业的罗素带着新娘到德国去研究“社会民主主义”，那时的“社会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1896年罗素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德国社会民主主义》。他对《共产党宣言》以及马克思的整个思想体系给予很高的评价，但当时罗素的另一只脚仍然留在自由主义阵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罗素对世界资本主义秩序完全失望，他1913年正式加入了英国工党，并开始理论上系统地清算他以往所宗奉的自由主义、阐述他的社会主义理想，从而完成了向社会主义者的转变。

但是，那个时代也与今天一样，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存在着很多流派。罗素认为社会主义各流派的主要分歧在于国家学说：马克思派的国家社会主义很利于实行，但它将太大的权力赋予国家，终将为其所累；无政府主义从理论上说最符合人类理想，但它的实践意义非常有限；基尔特社会主义则正好介于两者之间，作为代表消费者利益的地缘组织，国家被保留下来，“基尔特”则作为代表生产者利益的产业组织来发挥其职能，形成一种国家和“基尔特”同时并存、各司其职而又互相制约、互相协调的体制。因而，罗素在思想感情上倾向于基尔特社会主义。在他看来，在基尔特社会主义制度中，既不会使社会陷于无政府状态、又充分保留了产业团体的自治权力。全体工人则依靠“基尔特”这种自己的组织来享受法律范围以内的最大自由，每个社会个体既是直接支配生产过程的、从而是充满主动积极精神的生产者，同时又是充分地享受幸福生活的消费者。再加上既保障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活、又刺激杰出人物创造才能的分配制度，人类将在物质生产方面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在精神方面也将摆脱有史以来的种种奴役而获得真正的解放。<sup>⑦</sup>

基于这样的思想信念，罗素对俄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即布尔什维克主义便不可能顶礼膜拜。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曾经一度给他带来狂欢，他一度号召英国工人在英国建立苏维埃政权。<sup>⑧</sup>但是，1920年5月11日至6月16日的苏俄之行改变了罗素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看法。他当时认为，苏维埃制度并不是西方社会主义者所想象的那种新型民主政治，而只不过是“革命贵族”的专政。罗素进一步断言，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离社会主义还相当遥远，因为他们并没有打破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垄断，而是造成了更

高度的权力垄断，他们没有改变工人阶级的地位，而只不过使工人从资本家的雇佣工转变为国家雇佣工。基于上述判断，罗素提出了一个著名论点：布尔什维克并没有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而且其方法完全不值得西方效法；布尔什维克主义充其量只不过是工业落后国家迅速地实现工业化并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的一种特殊方案。<sup>⑨</sup>由于罗素认定，西方人不能走俄国人的路，他站在西方社会主义者的立场上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是必须指出，在另一方面，罗素热情地号召中国人走俄国人的路，指出这是中国的最佳选择。<sup>⑩</sup>中国学术界误解罗素的主要根源在于忽略了罗素批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角度与用意。

## 二、罗素是中国新知识界的共同客人

访华之前的罗素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与真实的罗素完全一致。如果说访华前的杜威因为在中国有一批得意门生广做宣传而闻名于神州，当时中国新知识界对罗素也并不陌生。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罗素因为他在数理逻辑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他在和平主义运动等方面的惊世骇俗之举，在西方世界早就名声大震。时时刻刻关注着西方、如痴如醉地追求西学的五四群英，没有理由忽略罗素。在1920年5月向罗素发出邀请之前，中国人便在一定范围内了解到罗素的生平和著作，而且他们所了解的罗素绝不是可以与保守、反动分子为伍的。

1919年间，罗素的一些重要著作如《哲学问题》、《政治理想》、《自由之路》等已在中国的一些重要报刊上被译载和介绍。<sup>⑪</sup>特别是北京大学物理和哲学系讲师张崧年（即张申府）写了三份很有份量的罗素传略，介绍罗素为和平与进步事业奋斗的业绩以及罗素的《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改造原理》、《论几何学的基础》、《数学原理》、《哲学论文集》、《哲学问题》、《柏格森的哲学》、《哲学中的科学方法》、《战时之正义》、《政治理想》、《自由之路》、《数理哲学导论》、《神秘主义论集》等十余部著作的梗概。<sup>⑫</sup>1920年初，张崧年著专文介绍了罗素的人口理论，高一涵著专文述评罗素的社会政治思想，余家菊则将罗素的《社会改造原理》全数译出并在《晨报》上连载。<sup>⑬</sup>1920年3月间，杜威在演讲中以《现代三个哲学家》为题对罗素所作的介绍，更以其权威性提高

了罗素的声望，④

罗素本就是站在时代的前沿指导潮流的一位进步人物，从上述那些人的介绍中根本看不到罗素可以给保守反动分子提供任何可乘之机。透过那些介绍，倒是可以看到罗素在如下一些积极的方面深深地打动着“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第一，罗素是主持公道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旗手之一。我们知道，对于“五四时期”中国那些具有满腔爱国情怀而又痛感民族危机的知识分子来说，“巴黎和会”给他们带来的心灵创痛是无法比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巴黎和会”对他们的影响并不亚于俄国十月革命、前者所带来的屈辱悲愤与后者所带来的鼓舞可以等量齐观。张松年所翻译的《独立精神宣言》正是罗素和罗曼·罗兰等人为谴责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而于1919年6月在巴黎发表的。该宣言呼吁全球的“精神劳动者”自爱自重，不要被各国政府利用去从事侵略和战争，而是要“为人类全体”而工作。

第二，“罗素已经完全成了光明磊落的根本改造论者、世界改造的引导者”。在罗素访华之前，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广泛地开启了人们的心智、当五四爱国运动强烈地激发了人们的政治热情，“社会改造”的呼声从1919年下半年起便响遍了大河上下、大江南北。“彻底改造家”被渴望“社会改造”的人们引为同道和导师，顺理成章。按照张松年的介绍，罗素痛恨现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并从大哲学家的高度提出了美妙的社会改造方案，“同情他的人已经遍处都有，罢工的工人也找他去指教”。张松年还说，“罗素是极能洞烛社会的根本、现代的病原的，所以他主张改造要从根本下手，绝不枝枝节节而为之”。具体地说，他以无政府主义制度为终极的社会理想、在现实改造中倾向“行会Guild社会主义”，主张以能否发展人的“创造冲动”、减削人的“占据冲动”作为评判社会制度好坏的最高标准，崇拜老子所倡导的那种“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境界，将学术、艺术、自由、爱情等置于人生的最高位置之上。这就难怪“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视罗素为“今日我国所亟亟需要者”。

第三，罗素具有高尚的人格。那种刚直不阿、威武不屈的铮铮铁骨，对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魅力。在张松年笔下，罗素正是这样一种人格典范。他因为反对英国政府的战争政策并为善良的民众鸣不平，被英国有关当局罚了

款、判了刑、禁止他出国讲学、革掉了他的教席，但罗素并没有屈服。相反，“他的勇气却越发旺起来、他的智慧之光越发亮起来、他的头脑越发冷静心越发热起来、他的学者的良心也越显露出来、他的改革论越发盛起来、他的主张越加公正起来”。

第四，“罗素是现代世界至极伟大的数理哲学家”。张松年指出，“数理逻辑”是在当代科学思想的发展史上“开一新时期的一种最高妙的新学”，而罗素则对这样一种新学“很有创发而且集大成”；他在哲学中所创立的新方法——“逻辑的和解析的方法”，在现代哲学界和思想界“最有影响”；他与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是“数学艺术的金字塔”；他还是一位“散文的天才”，他“文章的明晰透澈、周密锐利、真是一时无比”。当时求知欲极盛的中国知识分子自然对这样一位饱学之士仰慕之至。

而张松年等人对罗素的这些颂扬得到正在中国讲学的杜威博士的首肯，更变得不可争议。杜威将“尚为少年”的罗素与实用主义哲学的奠基人和“生命哲学”的创始人柏格森并列、作为“世界三大哲学家”之一介绍给中国人，罗素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可想而知。杜威从“理论哲学”和“实用哲学”两个方面来归纳罗素的思想。他说罗素的“理论哲学”高深无比，因为罗素用“最抽象、最近法式的数学”来作他的哲学方法，用“最普遍、最抽象的共相”去探求永恒的“知识的共相”。杜威甚至说他没有能力完全理解罗素的“理论哲学”，他这样表白：“有人说，世界上真能够懂得数学的哲学的人，至多不过二十人，我既不是二十人之一，我也不能懂得。”所谓“实用哲学”，杜威指的是“人生哲学”、“政治哲学”或“社会哲学”。他介绍罗素思想的这一侧面也足够使中国人动心。他说，象罗素那样在“理论哲学”上主张绝对摆脱个人情感、而在“实用哲学”方面则倾注宗教般激情的人，在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杜威指出，罗素在伦理的、社会的著作中爱憎分明，特别是他的《社会改造原理》、《政治理想》和《自由之路》三本书，其主旨是要追求一种完美的社会制度，以便刺激人类“高等的冲动”而减弱“下等的冲动”。杜威还具体说明，罗素强烈谴责私有财产的祸害、国家对个人的压迫、帝国主义对弱小民族的压迫，是因为在罗素的观念中，“如财产，本以占为己有为中心，如国家，在内面保护私有财产、

帮助富人、压制贫人，在外面利用国家的势力，欺凌弱小的民族，发展帝国主义”。杜威对罗素的介绍，最后这样作结：“罗素主张广大的、普遍的、不偏于个人的知识补救直觉的不足，使人类在往前奋进时有一种指示。这是罗素的贡献”。

也许有点令人困扰的是，邀请罗素来华讲学的总负责人，不是创办《新青年》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打头阵从而博得新文化运动“总司令”雅号的陈独秀，不是主政并革新北京大学、倡导“兼容并包”宗旨从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提供舞台的蔡元培，不是借狂人之口控诉“吃人的礼教”、发出震聋发聩之音的鲁迅，不是呼唤“赤旗的世界”和马克思主义从而将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引上新征途的李大钊，也不是因为倡导“文学改良”与“文艺复兴”而顿成明星的胡适，而是发表了悲凉的《欧游心影录》而在五四时期又领导着由“进步党”演化而来的“研究系”、从而有“保守”和“反动”之嫌的梁启超。

其实，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五四时期的梁启超视为保守、反动分子。从政治方面说，自从1918年段祺瑞借参战机会肥私祸国并改选国会之后，梁启超便同皖系军阀分道扬镳了。正是梁启超及时从巴黎发回专电透露危急信息，促成了北京学生的“五四”大游行示威。梁启超当时在学术文化方面的进步倾向则更为明显。毋庸置疑，到了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思想文化上“执时代之牛耳”的殊荣早成过去，指导潮流的责任已转到了陈独秀等人肩上。但是，梁启超也并未象他早年的师友康有为、严复那样完全落伍。人们都乐于引述《欧游心影录》的最后几句，以表明梁启超在五四时期已成老朽之徒，这并不公允。通读梁氏全文，不难看出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最后一段的本意并不是要中国青年守旧，而是号召中国青年创新。特别是梁启超在五四前后对“少年中国”的呼唤、对“思想解放”的礼赞和辩护、对五四思潮的鼓励、对中国传统学术病弊的针砭和对科学思维的讴歌，于今读来仍然非常感人。<sup>⑮</sup>

退一步说，即使梁启超等人没有激进到人们所希望的程度，我们从梁启超等人邀请和接待罗素的具体过程中也看不到他们为保守、反动势力张目的形迹。<sup>⑯</sup>给罗素的邀请信系由当时的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傅铜执笔，先由傅铜寄给他在英国伯明翰大学留学时的指导教师缪尔赫，再由缪尔赫于1920年5月31日加上他本人的介绍信转寄

给罗素<sup>⑰</sup>。关于罗素来华讲学的主聘单位，当时新闻界有如下这些说法：一说“北京大学聘请哲学大师罗素来华”；<sup>⑱</sup>一说“英国哲学家罗素由讲学社聘请来华讲演”；<sup>⑲</sup>一说“罗素此行为尚志学会、北京大学、新学会、中国公学等四团体所公聘”。<sup>⑳</sup>依笔者之见，这几种说法都对，因为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基本上是同一班人马。除北京大学外，上述几个团体的总负责人都是梁启超，而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代理校长蒋梦麟又都是“尚志学会”和“讲学社”的发起人。事情的原委可能是这样：动议和邀请罗素来华讲学是北京大学、尚志学会、新学会和中国公学所采取的联合行动。在1920年9月“讲学社”成立之后，罗素讲学事宜才由“讲学社”主办。但“讲学社”只是一个空架子，其基础还是上面提到的那些学术团体。“讲学社”的董事会也网罗了当时仅有的几所大学的负责人，如北京大学的蔡元培、蒋梦麟，南开大学的严修、张伯苓，东南大学的郭秉文等。它公布的“规约”载明：“本社因欲将现代高尚精粹之学说，介绍于国中，使国民思想发扬健实，定拟逐年延聘世界专门学者来华，巡回讲演。……各地演讲事宜，及讲费分担方法，由总务干事随时与各学校各学术团体接洽办理”。<sup>㉑</sup>而无论是由哪一单位主聘，有一点是清楚的：人们邀请罗素完全是出于纯学术的动机，人们是将罗素视为“新时代的大哲”、“世界哲学泰斗”迎进古国之门的。

当我们细心地考察梁启超等人接待罗素过程中的言行，可以看到他们将罗素访华视为有助于中国进步的学术活动。罗素于1920年10月12日抵达中国。10月14日，设在上海江苏省教育总会、中华职业教育社、新教育共进社、中国公学、时事新报社、申报社、基督教救国会等七个团联合设宴为罗素接风，“讲学社”的十六位董事没一人出面。江苏省教育总会负责人沈信卿代表在席中中国主人发表即席演说，所强调之点恰恰在于：“罗素先生主张改造社会与思想，而今日我国所亟亟需要者，即在于此。是所望于罗素先生在此一年之间，予我中国以种种指导，俾完成我国之改造事业也”。<sup>㉒</sup>

一个月后，罗素辗转抵达北京，“讲学社”才于11月9日正式出面借美术学校礼堂开会欢迎罗素。梁启超也第一次出面代表“讲学社”向罗素致欢迎词。梁启超的演说词主要是阐述“讲学社”不分畛域门户、广纳天下才智的宗旨。他说：“我们

对于中国的文化运动，向来主张“绝对的无限制尽量输入”。……至于讲学社，是一个介绍的机关。只要有价值的学说，我们不分门户，都要把他介绍进来。好象我们开一个大商店，只要是好货，都要办进，凭各人喜欢买那样就买那样。我常说中国学问的衰落，由汉朝的表彰六艺、罢黜百家。无论他表彰的罢黜的对不对，总是把思想的自由锢蔽了。所以我们要大开门户，把现代有价值的学说都要欢迎、都要灌输，这就是讲学社的宗旨”。说到邀请罗素的理由，梁启超特别提出两点。其一，“我们认为往后世界人类所要求的，是生活的理想化、理想的生活化。罗素先生的学说，最能满足这个要求”。其二，罗素先生的人格值得钦佩，因为他具有“真正学者独立不惧的态度。这是真正为人类自由而战的豪杰”。梁启超对罗素提出的具体要求，只是要罗素将如同吕纯阳能点石成金的手指那样的“研究学问的方法”，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中国人，而并未表示对罗素某一思想主张的偏爱。<sup>③</sup>

依据上述事实，我倾向于认为，罗素应该被视为当时中国新知识界的共同客人。实际上，罗素甫抵中国之际，不但中国一般学界欢欣鼓舞，思想上最激进的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也都对罗素表示欢迎，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陈独秀、张崧年等还参加了上海七团体欢迎罗素的宴会。<sup>④</sup>可以这么说，邀请罗素来华讲学之举，体

现着中国五四时期那种放眼世界、广纳新知的时代精神。时至20世纪20年代，“新学”或“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已有80年的历史，它发轫于林则徐、魏源等清末地主阶级改革派对治国安邦新术的诉求。后经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鼓吹、特别是1915年以后陈独秀等人的摇旗呐喊，学习和传播“西学”已经“蔚然成风”。西学的内容也已经从最初的西方科技器械、中经西方的政治法制、而逐步涵盖西方的人文哲学并以后者为主。而“西学”在中国从最初播种到根繁叶茂，它所结出的最宝贵的果实，是为中国培育、造就了一个“新知识阶级”，也就是罗素笔下的“少年中国”（“Young China”）<sup>⑤</sup>。新知识分子群在近代中国一直担当着中华民族前驱的角色，他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令人心醉的契机和一次又一次令人心碎的厄运。而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群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这不仅是指他们更加自觉地充当“国民先锋”，更主要地是指他们将思想文化置于首要地位的心态和他们全面地吸收世界先进文化的开放心灵。邀请罗素来华讲学正是这样一种心灵发出的呼唤。

当然，罗素来华之时，中国新知识界在如何改造中国这一根本问题上已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他们都从各自的角度来期待、理解和解释罗素，以至于闹出满城风雨，这将留待另文去论述了。

① 罗素致奥托塔，1922年1月31日，原件存加拿大罗素档案馆。

② 罗素：《英帝国主义在中国》，《新导报》（英国），1924年9月24日。

③ 罗素：《评英国的对华政策》，《祖国博览》（英国），第37卷，第16号，1925年7月12日。

④ 罗素：《为中国松绑》，《新导报》（英国），1925年7月10日。

⑤ 罗素：《白祸在中国》，《新导报》1926年9月17日；《中国向何处去？》，《先驱报》（英国）1927年2月13日；《英国人在中国愚不可及》，《祖国》（英国）第124卷，第3217号，1927年3月2日。

⑥ 参阅罗纳德·克拉克：《罗素的一生》，第408页。

⑦ 关于罗素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想，参阅罗素：《社会改造原理》，伦敦1916年版；《政

治理想》，纽约1917年版；《自由之路：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伦敦1918年版。

⑧ 斯拉特：《里兹发生了什么？》，《罗素》（加拿大）第4期。

⑨ 关于罗素的上述思想，参阅罗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伦敦1921年版；《工业文明的展望》，伦敦1923年版；《布尔什维克主义和西方》，伦敦1924年版。

⑩ 罗素：《中国人到自由之路》，《东方杂志》第18卷，第13号。

⑪ 徐彦之（译）：《哲学问题》，《新潮》第1卷第4期，1919年4月1日；张东荪：《罗塞尔的“政治理想”》，《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1号，1919年9月1日；沈雁冰：《罗塞尔“到自由的儿孙拟径”》，《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7号，1919年12月1日。

⑫ 第一份是张崧年在《男女问题》一文后所附的

罗素简介,《新青年》第6卷第3号;第二份是张崧年附于译文《独立精神宣言》之后的罗素介绍,《新青年》第7卷第1号;第三份是张崧年写的《志罗素》,《晨报》1919年12月1日,此文后来又附上《罗素著作目录》,转载于《新青年》第8卷第3号和《东方杂志》第17卷第18号。

- ⑬ 张崧年:《罗素与人口问题》,《新青年》第7卷第4号;高一涵:《罗素的社会哲学》,《新青年》第7卷第5号;余家菊(译):《社会改造原理》,《晨报》1920年3月22日—27日。
- ⑭ 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3月:2日—27日。
- ⑮ 参阅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欧游心影录》的《思想解放》一节、《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等。
- ⑯ 关于梁启超别有用心之说可能肇始于胡适等人。还在罗素来华之前,当赵元任准备应聘为罗素翻译的时候,胡适、胡明复、胡敏复等人就怀着门户之见警告他不要上“进步

党”的当。参见《赵元任早年自传》,《纽约1925年版》,第2卷,第104页;又见赵元任:《与罗素一起在中国的日子》,《罗素》第7期,两封信的手稿均藏加拿大罗素档案馆。

- ⑰ 《晨报》1920年7月11日。
- ⑱ 《东方杂志》第17卷,第21号。
- ⑲ 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10月13日。
- ⑳ 《时事新报》1925年9月14日。
- ㉑ 《沪七团体欢迎罗素记》,《晨报》1920年10月16日。
- ㉒ 《讲学社欢迎罗素之盛会》,《晨报》1920年11月10日。
- ㉓ 《各团体欢迎罗素博士记》,《申报》1920年10月14日。
- ㉔ 罗素:《中国之问题》,1922年纽约版,第77页。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凌峰

(上接第97页)

⑧ 爱斯特拉达等:《厄瓜多尔发现的一组可能来自太平洋彼岸的证据》,《美国人类学家》,1961年第5期。

⑨ 埃克霍姆:《越太平洋交往》,《美洲史前人类》,杰宁等主编,芝加哥,1964年。

⑩ 兰兹:《玛雅艺术中的睡莲》,《美国民族学会报告》,1953年,第151期。

⑪ 费德尔:《美洲史前史》,剑桥大学1987年,第七章。

⑫ 科亨:《史前食物危机》,耶鲁大学1977年,第225页。

⑬ 王仲尧:《中国和美洲大陆人民历史悠久的文化交往》,《当代国际问题研究》,1991年第4期。

⑭ 爱泼斯坦:《美洲发现的前哥伦布时代旧大陆钱币》,《当代人类学》,1980年第1期。

⑮ 孟德克:《美洲的蛇崇拜》,《当代人类学》,1976年第3期。

⑯ 房仲甫:《殷人航渡美洲再探》,《世界历史》,1983年第3期。

⑰ 《1955年拉文塔发掘报告》,华盛顿1959年。

⑱ 张小华:《中国与大洋洲、美洲古代交往的探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

⑲ 王家祐等:《玉米的种植与美洲的发现新探》,《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3期。

⑳ 《古代已有亚洲移民到美洲的新论证》,《世界历史》1981年第2期。

㉑ 石钟健:《古代中国船只到达美洲的文物证据》,《思想战线》1983年第1期。

㉒ 《人类学学报》1984年第3卷第2期,第158—163页。袁义达等人文章。

作者单位:杭州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凌峰

# 关于古代中国与美洲的交往问题

龚缨晏

五百年前，哥伦布“发现”美洲。在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之际，探讨古代中国与美洲的交往问题，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从18世纪中叶起，国内外史学界对古代中国与美洲的交往问题进行了多次热烈讨论。自本世纪50年代开始，这一问题又成为人类学、考古学的一个重要课题，至今悬而未决。

现代学术界探讨古代中国与美洲的交往问题，并不是为了猎奇，它实际上涉及到这样一些基本问题：美洲文化是独立发展起来的，还是外界影响的结果？在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到底是各地区独立发明所起的作用大，还是相互传播所起的作用大？人类文化的发展规律，在本质上是发明，还是传播？<sup>①</sup>那些认为外界影响在美洲文化形成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学者，被统称为“传播论者”。

传播论者的理论基础是：古代世界的发明创造是极少的；只有在特定的文化、历史、环境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才会导致发明创造；由于导致发明创造的各种特定因素不可能在不同的时空中重复出现，因此，不同地区所存在的相似的文化特征一定是相互传播的结果；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会引发新的发明。

—

传播论者提出了一系列的证据，来证明早在哥伦布到来之前美洲就已与外界发生交往。其中较重要的证据是动植物材料。

葫芦的原产地是非洲或亚洲，但在墨西哥的奥开普洞穴（距今9千年前）、提瓦坎（距今7500年前）、秘鲁的华卡·普利塔均有发现。甘薯原产于美洲，而波利尼西亚也有许多种甘薯，这表明甘薯传入此地的时间很早。<sup>②</sup>在大洋洲，甘薯被统称为“库马”，而在美洲，只有哥伦比亚沿海的一些印第安人才用此词称呼甘薯。有人认为，“库马”原为大洋洲词汇，泛指各类可食用的根块植物。后来大洋洲居民到达美洲后，就把甘薯这一新的根块植物也称为“库马”。这个词在这一地区就这样被沿用了下来。椰子本是东南亚的植物，但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即已传入美洲，在美洲有许多原产于亚洲（中国、印度等地）的鸡，其蛋壳略呈棕色。印第安人饲养这些鸡主要用于宗教巫术活动，这与亚洲的风俗又颇为相近。后来西班牙人带来的鸡主要食用，蛋壳为白色。<sup>③</sup>我国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发现过一些地平龟的甲壳。鉴定者写道：“所有地平龟属的化石种都只限于北美

……美洲以外的其他大陆上，从未有过化石种或现生种的记录”。<sup>④</sup>许多人以此作为古代中国与美洲交往的证据。中国至少在七八千年之前就已大量种植粟，中美洲最早种植的谷物也是粟，时间在九千至七千年前。有人提出美洲的粟栽培技术来自中国。其它被引作传播论证据的植物还有花生、芒果树、菠萝、玉米等。

在传播论的证据中，最丰富、同时也是最复杂的是考古学材料。在美洲早期陶器中（公元前二千年代至一千年代），有许多器物类似于中国的鼎、豆、盘等。约公元前1500年，中美洲出现了制作树皮衣服用的翼子板，一直被使用到近现代。在台湾，这种翼子板早在公元前2400年即已出现。这类翼子板在整个太平洋地区广为流行。托尔斯托指出，在翼子板的121个特征中，有92个特征为中美洲与东南亚所共有。因此翼子板被认为是文化传播的物证。<sup>⑤</sup>

约公元前1200年，在墨西哥湾地区突然兴起了美洲最早的文明——奥尔梅克文明。由于奥尔梅克文明与当地以前的文化传统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它的来源问题便成了一个学术难题。有些学者认为，奥尔梅克文明源自中国的商文明，它与商文明之间存在着以下这些类似之处：都有文字，其中三个字符相似；都重祭祀，都有人牺人祭；都崇拜高山，而且都认为山神与下雨有关；都崇拜猫科动物，而且艺术表现手法也相同，例如一般没有下颌，犬齿明显夸张突出等；奥尔梅克文化中的另一主神“火蛇”，与中国古代的龙极其相似，尤其是拉文塔遗址19号石碑上的蛇，与中国的龙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在全世界的古代文明中，唯有中国与奥尔梅克文化以制作精美的玉器为特征，玉器被视作最贵重的器物。古代中国把圭璋视作权力与地位的象征，而在奥尔梅克文化的石碑上，统治者们也手持圭璋一类的器物；有些玉器器形相似，加工技术也雷同；在古代中国与奥尔梅克文化中，都有颅骨变形习俗；建筑物都是南北朝向，都有排水系统；等等。<sup>⑥</sup>1975年，有人提出奥尔梅克文化中已有了指南针。后来又有人写道：“原先一直认为是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但现在必须考虑（指南针）最终起源于奥尔梅克文化这种可能性”。<sup>⑦</sup>海因——格尔德等人认为，南美洲的查文文化也是在古代中国文明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如猫科动物的纹饰一般没有下颌。

传播论者的证据还有很多。例如，厄瓜多尔出土的陶屋模型与亚洲的陶屋模型很相似，屋脊均为二端上翘的马鞍型，而当地的房屋屋顶单坡屋脊平直；中国古代流行以扁担负重，美洲则主要用背带背，但厄瓜多尔发现的一只纺锭上，刻着一个用扁担挑货物；近代美洲还在使用的竹排，其建造方式及结构与台湾的竹排十分相近；厄瓜多尔出土的陶枕头、人物雕像、六排管箫、陶权等，也与亚洲的颇为相似。<sup>⑧</sup>埃克霍姆认为，中美洲出土的带轮子的陶玩偶源自欧亚大陆；公元初蒂奥提瓦坎的三足陶筒与中国汉朝的鼎及陶仓十分相近；中美洲文明中的部分建筑及雕刻艺术来自印度。<sup>⑨</sup>有的学者还指出，中国与美洲在古代都有这样的习俗：在死者口中放入谷物或玉器，随葬用的玉器通常染成红色；美洲的家狗主要用作祭祀，可能也传自中国。中美洲的一些睡莲图饰可能来自印度。<sup>⑩</sup>此外，被引作传播论证据的还有语言学、神话、游戏、魔术的材料。



尽管国内外的一些学者提出了一系列物证证明古代中国与美洲之间的交往，但我们认为，就目前的材料而言，下此结论还是为时尚早，主要根据如下：

首先，传播论者的这些物证都是间接的材料，至今为止尚未发现确切无疑的直接物证。而且，新的考古发现不断地否定一些传播论者的物证。例如70年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沿海发现了据称是三千年前的中国石锚，这些石锚曾作为中国古代居民到达美洲的有力证据，而在国内外广为引用。但新的研究表明，这些石锚是19世纪的。厄瓜多尔的瓦尔迪维亚所发现的公元前3600年的陶器，曾一直被认为是美洲最早的陶器，由于其制作技术及纹饰与同期日本的陶器很象，因此人们认为美洲的制陶术来自日本。但70年代，在瓦尔迪维亚发现了更早的陶器，从而否定了美洲陶器外来说。<sup>①</sup>以前人们认为中美洲没有玉石矿，因此提出奥尔梅克文化中的一些玉器产自亚洲。可是新的研究表明，奥尔梅克文化的玉器产自墨西哥的巴尔萨斯河流域。以前还有人将亚洲与中美洲的玉器进行光谱分析，认为一件中国软玉与中美洲玉器之间有极为明显的相似之处。但后来有人指出，这种结论在矿物学上是站不住脚的。

其次，传播论者的材料，往往存在着年代学的问题。美洲的太靖式纹饰与中国周、秦时代的器物纹饰极为相似，几乎难以分别，但太靖式纹饰的年代为公元300—700年，与周、秦相去太远，不能以此作为相互接触的证据。再例如，花生的原产地一般认为是中美洲，在中国的良渚文化中（公元前3300至前2200年）发现了花生，国内外都有人把这些花生当作古代中国与美洲交往的物证。但中美洲最早是在距今3800年开始种植花生的，晚于良渚文化。<sup>②</sup>这又如何解释呢？是否有可能中国也是花生的原产地呢？1982年，台湾出版了卫聚贤的《中国人发现美洲》，所引材料很多，但大多没有年代学根据，不能证明古代中国人到达美洲。例如该书说在美洲发现过一些陶片，上面刻着“亚”、“凡”等中文。即使如此，这些陶片也都没有地层与年代，很可能是近代人带入美洲的。这可以古钱币为例。国内许多人都引证说，在美洲的博物馆中有中国王莽时期的钱币，这是中国古代居民到达美洲的证据。<sup>③</sup>但据作者所知，美洲大陆发现的最早的古钱币为北宋时期。研究者指出，所有这些中国古钱币都是近代流入美洲的。<sup>④</sup>

其三，传播论者的证据，大多是根据器物类型的对比而得出的。但离开了具体的文化内容及地层年代而进行简单的器物类比，往往要得出错误的结论。如古代亚洲与美洲都曾崇拜蛇，并且关于蛇的一些艺术品也十分相似。但研究表明，蛇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意义。在印度，蛇象征生育，而在美洲，蛇与生育无关。<sup>⑤</sup>又如，中国商朝与美洲奥尔梅克文化都崇拜猫科动物，艺术表现手法也颇为相近。但美洲虎是奥尔梅克文化的主要崇拜对象，具有祖先图腾的意义，而商代的图腾是鸟，殷商器物上的虎纹仅仅表示辟邪。此外，虽然商代动物纹饰与美洲的十分相似，但人们往往没有注意到，商代纹饰主要表现在青铜器上，而美洲则主要刻在石头上，两者的表现媒介是不同的。

其四，许多主张古代中国人早在哥伦布之前就到达美洲的论著，往往引用一些错误

的材料，以讹传讹。此类例子甚多。在奥尔梅克文化的拉文塔遗址中发现过一组石刻人像，共16个。有人说：“其面型都是中国人的样子”。<sup>⑥</sup>但印第安人与中国同属一个人种集团，有基本相同的体质特征，本来就很难区别，况且，从发掘报告上看，这些人像与同期中国人的人像明显不同，如头颅特长。<sup>⑦</sup>所以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有人根据河姆渡第二层与美洲蒂瓦纳库城都发现“中国人”的头像，认为这是古越人与南美人直接交往的证据。但是，河姆渡第二层的年代约为公元前4000年，蒂瓦纳库的年代是距今3600年，两者相差二千多年，而有同志竟说“时间上也基本吻合”。<sup>⑧</sup>而且，查找所引照片，实在看不出“中国人”的样子。还有同志认为河南济源发现的扶桑树图案就是美洲的玉米，可是从所引照片上看，根本不象玉米。<sup>⑨</sup>

其五，中国与美洲古代文化之间的相似之处固然很多，但不同之处更多，而且基本方面是不同的。从生产技术上讲，中国早已进入青铜时代，而美洲一直没有金属工具。从文化遗存上讲，美洲那些重达三十吨的巨大人头石像就不见于中国商代。另外，在宗教、服饰等各方面，也都有巨大差别。如果中国人果真在很早的时代就与美洲发生交往，为什么不把青铜以及冶铁技术带入美洲呢？这类传播论者无法解决的矛盾还有很多。

最后，我们坚决否定那些认为古代中国人曾大规模到达美洲的观点。例如认为被商朝打败的东夷人逃到美洲，被周朝推翻的商遗民逃到美洲创造了奥尔梅克文化，<sup>⑩</sup>被中原王朝打败的百越人逃到美洲，<sup>⑪</sup>等等。我们只要引用人类学的简单事实，就可以说明问题。例如美洲印第安人对欧亚大陆的一些常见流行病(如麻疹)普遍缺乏免疫力，这说明印第安人与欧亚居民长期隔绝。在美洲，特别是中美洲，几乎是百分之百的O型血，没有B型血。而东亚是世界上B血型出现频率最高的地区。据1981年以后的调查，我国华北汉族的O、B、A型血的比例分别为：33.44%、29.37%、28.44%。<sup>⑫</sup>如果古代中国居民曾大规模到达美洲，那么势必造成混血，中美洲地区也就不会出现百分之百O型血的情况了。

总之，从目前材料来看，还不能完全解决古代中国与美洲的交往问题。我们认为，即使古代中国与美洲确实存在着某种形式的交往，那也是极其偶然的，其历史意义也根本无法同哥伦布相比。

①谢南德：《跨越太平洋的史前交往与文化变迁理论》，《美国人类学家》，1977年第1期。

②卡特：《越过太平洋的植物》，《美国考古学会会刊》，1953年第9期。

③卡特：《农业单源说》，《农业的起源》，芝加哥1977年。

④《大汶口》，文物出版社1974年，第159—160页。

⑤杰宁：《古代美洲土著》，旧金山1978年，第605页。

⑥米格斯：《中美洲文明的越太平洋起源》，《美国人类学家》，1975年第1期。

⑦杰宁：《古代美洲土著》第611页。

(下转第93页)

# 晚清“厘金”起源新探

俞志生

厘金是晚清创办的一个新税种，属于商品流通税性质。它的出现，很快成为当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据1916年商务印书馆发行的贾士毅著《民国财政史》（上册第13页）论及“晚清咸丰时之财政”中说：“咸丰三年（1853）……军饷之取资于此（厘金）者，十盖八九。所入当岁在千万以上。”《清史稿·食货·会计》中载，光绪十七（1891）年，全国厘金收入1630余万两，约为地丁收入2360万两的69%。1840年鸦片战争后，厘金又成为满清政府向帝国主义列强赔款的主要来源之一。这项税种一直延续到1931年元月（湖北于1930年底）才被南京国民政府裁撤而告终。

厘金的出现是中国近代财政史上的一件大事，多年来，众多的财政史专家、学者，从不同的侧面，就厘金起源的历史背景、地位和作用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基本上形成了一致的观点。现将几种著作对厘金的解释爰引如下：

191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贾士毅著的《民国财政史》（上册第13页）是这样叙述的：“咸丰继位，府库已绌，而东南洪杨之变，西北英法之役，擲款至鉅，论者多谓其时财政……而自雍正以来，度支出入之定程，迄是不能确守矣。其恃以应急者，一曰厘金。咸丰三年，雷以械于江苏试办抽厘，各省踵而行之。”

1984年7月，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孙诒刚、李渭清编的《中国财政史》，对“厘金”一词是这样解释的：“咸丰三年，副都御史雷以械以刑部侍郎在扬州帮助军务，兼保东路，因训练乡勇需饷，奏请于里下河设局劝捐……创办一种类似捐输而又能行久的捐厘办法。三年九月派人到扬州城的仙女庙、邵伯、宜陵等镇，劝谕米行，捐厘助饷……大约每百分取一分。咸丰四年三月，上奏中央，请求在江苏其他各州县仿行……至咸丰末年（公元1861年），全国已有十九个省仿行。”

由王承仁等编的《中国近百年史辞典》（1986年8月版第458页）对“厘金”是这样表述的：

“1853（咸丰三年）7月，清朝帮办江北军雷以械首先在江苏扬州仙女庙开设厘局，向商贾收取税，随积推广于各省……税率为值百抽一，后来部分货物改为从量征收。厘金的创立和推行，为清政府筹集了大批镇压太平天国的经费，给人民增加了沉重负担……。”

再看198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三卷本（上卷第390页）亦作了类似上述的说法：“厘金亦称‘厘捐’或‘厘金税’。旧中国的一种商业税。主要是在水陆交通要道设

立关、卡征收。1853年（咸丰三年）开始实行。当时清政府为筹措军饷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最初在扬州仙女镇（今江都县江都镇）设厘金所，对该地米市课以百分之一的捐税。百分之一为一厘，故称‘厘金’。以后各省相继仿行，遍及全国。”

通过上述材料来看，对厘金的认识是明确和一致的：

一是“厘金”的起源：从当前见到的所有著作中都认为厘金起源于1853年（清咸丰三年），地点是江苏扬州仙女镇，其首倡人是当时的副都御史雷以械；二是厘金的确切含义及征收：一般著作称官府对各地米市课的百分之一的捐税。“百分之一为一厘，故称‘厘金’”，主要靠设厘卡、厘所进行征收；三是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已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真可谓内外交困，经济危机，外有帝国主义侵略，内有农民起义的太平天国革命，满清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筹饷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军事费用而推出具有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的一项可解燃眉之急的新税种。

但根据新发现的一份史料来看，对这一定论尚有重新认识的必要。

这份新史料就是“道光十三年（1833）九月十五日光化县正堂加十级记录十次 陆炯为出示晓谕事”一文。原文为木刻板，无断句，有少量错字。光化县即现湖北省老河口市，原件现存湖北省老河口市档案馆。

这份由光化县县衙于公元1833年（清道光十三年）发出的关于治水修堤的文件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厘金”一词的确切含义。现将“晓谕”全文摘录如下：

“特授光化县正堂加十级记录十次陆炯为出示晓谕事

照得老河口一带石矶炮岸，去岁连遭大水，□多坍塌。业经本县亲诣查勘，劝谕各绅商土绅，捐资修建，并将该□土等议□派捐修章程出示晓谕在案。兹查石矶炮岸工程虽不日即可告竣，第此项劝捐，本县不啻舌敝唇焦，该绅商等，虽属捐输，亦未必不筋疲力尽。况且堤之坍塌，难以预料；水之泛涨，更属靡常。如工程业已竣事，并不予为□□，设或将来再有崩泄，即难收拾。应即按照该首士等所议，飭令各行等，抽收厘金，以为未雨绸缪之计，询于地方工程，两有裨益，诚恐客商投行买卖，未能周知，办理掣肘，合行出示晓谕。为此，谕各行人等知悉，即以七月十五日为始，尔等各行人以客商人等，务当遵照该首士等所议章程，合慎买卖二察，每银一两，各抽银一厘；每钱一千，各抽钱一文。每逢月望，送交公局首士查收，以备不时之需。如该行以及客商人等，隐瞒不抽，一首士人等查出，如隐瞒银一厘，罚银一分；隐瞒钱一文，罚钱十文。隐瞒之数由一厘而至一分，由一文而至十文。所罚之数即由一分而至一钱，由十文而至一百文。推而上之，由此递加，决不姑宽。至该首士等收过何行何店抽交钱文，务须逐一分析登记，亦不得稍涉疏忽，致干未便。其各稟遵毋违。特示

右通知

道光十三年七月 日示

告示 实贴 晓谕”

以上所录，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几点认识：

第一，厘金起源于1833年（道光十三年），而不是1853年（咸丰三年）。

第二，首倡者是陆炯，而不是雷以鍼。

第三，地点是湖北光化县，而不是扬州仙女镇。

第四，税率是千分之一，而不是百分之一。

据史料载，清代实行银两与制钱并行本位制，但日常贸易往来主要以银两计算，而“两——厘”或“厘——两”均是四级逢十进率，即“两——钱——分——厘”；反推亦然。一厘即为一两的千分之一；按制钱来说，则是每千文抽一文，也是千分之一。从“晓谕”中亦能得到证实。如“每钱一千，各抽钱一文”，“隐瞒银一厘，罚银一分……所罚之数即由一分而至一钱”等字句，悉可佐证。

第五，厘金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是为了适应当时治洪的客观要求，开辟财源，解决财政困难，防患于未然的结果，绝非为了筹措军饷，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权宜之计。

作为新出台税种的稽征，必须具备征收的先决条件：征收对象、比率（即税率）、稽征方法及查处的手段。关于征收对象，“晓谕”一文确为买卖二家，比率是“每银一两，各抽银一厘，每钱一千，各抽钱一文”；稽征办法“每逢月望（十五），送交公局首士查收”；处以罚款的规定是：“隐瞒银一厘，罚银一分……”是为隐瞒数额的十倍罚鍰。所罚之数，自然是“由一分而至一钱……推而上之，由此递加，决不姑宽”。同时对征方的稽征管理要求也很明确：凡“收过何行何店抽交钱文务须逐一分析登记，亦不得稍涉疏忽”。综上所述，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具备上述完整的征管制度，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这就使晚清历史上出现的“厘金”，已经具备了税收经济杠杆的全部特征。

作者单位：湖北鄂西州财政局修志办

责任编辑：凌 峰

## 谈中西文论的比较研究

蔡钟翔

近年来，中西文论的比较研究有很大进展，这对于深化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的研究，加强当代文艺学的建设，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这里仅就如何作比较研究谈几点看法：

### 一、概括性与准确性

既然是比较研究，理所当然地要概括中西文论的不同特征。如果只是琐碎地罗列现象，就谈不上把握中西文论的精神实质，也可以说没有达到研究的目的。这概括必须不仅是简要的，而且是精当的。无论是中国传统文论还是西方文论，其内容都不那么单纯划一，各自内部包含着种种流派，形形色色的观点、理论，相互差异，甚至相互对立。假若不考虑到这种复杂性，其结论就难免会以偏概全。

例如，曾经颇为流行的一种说法：西方文论重再现，中国文论重表现，因其论断鲜明扼要，博得不少研究者赞同。但仔细推究，这样概括是不够准确的。

诚然，西方文论中有极重再现的理论，如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的“镜子说”（“画家是自然的镜子”）。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弗洛贝尔认为，“艺术家不该在他的作品里露面，就象上帝不该在自然里露面一样”。（《致乔治桑》）俄国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倡导“现实的诗歌”，“它的显著特色在于对现实的忠实；它不改造生活，而是把生活复制、再现，……”（《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里君的中篇小说》）然而，我们又看到西方文论并不都是重再现的。黑格尔《美学》中讲到古典型艺术时说：“古典型艺术的对象并不是单纯的自然而是由精神意义渗透了的自然”。这就是说，在再现中已包孕有表现的成分。而对于浪漫型艺术，黑格尔则指出其“真正内容是绝对的内心生活，相应的形式是精神的主体性”，而且把这种主体性称为“绝对的主体性”。在浪漫型艺术中，表现已压倒了再

现。席勒在《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一文中提出了相近的观点，他认为素朴的诗人的任务是摹仿现实，感伤的诗人的任务是表现理想。“古代诗人打动我们的是自然，是感觉的真实，是活生生的当前现实。近代诗人却是通过观念的媒介来打动我们”。前者是重再现，后者就是重表现。浪漫主义重表现是世所公认的。而在颓废主义、唯美主义者中，重表现尤为突出，如19世纪法国诗人波德莱尔这样说明“什么是浪漫主义”：“浪漫主义不在于题材选择，也不在于准确的真实；浪漫主义完全在于一种感情。人们总是从自己的身外去寻求浪漫主义，但浪漫主义只有从内在的方面才寻求得到”。（《1845年的沙龙》）在现代西方的各个文学流派中，重表现的倾向更占优势。如意大利的表现主义美学家克罗齐驳斥了“艺术模仿自然”说及其变相“艺术理想化自然”说，他认为“艺术家并不是从外在现实出发，改变它，使它逼近理想；而是从外在自然的印象出发达到表现，这表现就是他的理想；然后再从表现转到自然的事实，用它做工具去再造理想的事实”。（《美学原理》）当他论及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时又指出：“古典主义坚定地倾向于再现，而浪漫主义则倾向于情感”，但这两个学派的最优秀的大师的作品中绝大部分“是不能称为浪漫的，也不能称为古典的或再现的，因为它们既是古典的，又是浪漫的，既是情感，又是再现”。（《美学纲要》）从以上的引证来看，西方文论是无论如何不能概括为“重再现”的。

再说中国的古代文论。中国诗学有“言志”、“缘情”的古老传统，似乎是重表现的。然而重再现的论调也俯拾即是。如《古今诗话》说：“卢延逊献太宗诗卷中，有‘栗爆烧毡破，猫跳触鼎翻’之句。后与潘美枢密在内殿议事，令宫人煨栗，俄有数栗爆出，烧损绣褥；又尝烧金鼎，宫猫相戏触翻。因举前诗曰‘词人作诗，信无虚语’。”（见《诗话总龟》卷之四）此例亦见王士禛《池北偶

谈》。这两句诗并无佳妙的意境，只因如实描述了宫廷生活，而受到后人的称道。至于大家名句，论者也往往叹赏其绘写实境的细腻工切。周紫芝《竹坡诗话》云：“余顷年游蒋山，夜上宝公塔，时天已昏黑，而月犹未出，前临大江，下视佛屋峥嵘，时闻风铃，铿然有声。忽记杜少陵诗：‘夜深殿突兀，风动金琅玕。’恍然如己语也。……又暑中颍溪，与客纳凉，时夕阳在山，蝉声满树，观二人洗马于溪中，曰：此少陵所谓‘晚凉看洗马，森木乱鸣蝉’者也。此诗平日诵之，不见其工，惟当所见处，乃始知其为妙。”曾季狸《艇斋诗话》引述了苏轼的观点：“东坡作诗，喜对景能赋，必有是景，然后有是句。若无是景而作，即谓之‘脱空’诗，不足贵也”。可见，即使对侧重于抒情的诗歌，文论家也是很强调自然的再现的。

当然，宏观的概括是就大体而言，不能要求涵盖一切，应该容许有例外。但如果例外太多，会失去立论的基石，人们将怀疑其可靠性。实际上，中国古代文论毋宁说是表现与再现的统一，虽有偏向一端的倾斜，却没有趋于两极的分化。其主流总是讲究形神兼备，不即不离。西方的艺术则分化为模仿自然的艺术和抽象的艺术两种形态，与此相应，在理论上则出现了自然主义和形式主义两种倾向，而且营垒分明，主再现者否定表现，主表现者鄙薄再现。然而，在西方持统一论者也是不乏其人的。例如黑格尔把戏剧体诗列于诗乃至一般艺术的最高层，就因为它是“史诗的客观原则和抒情诗的主体性原则”这二者的统一。（见《美学》第三卷下）席勒则预期未来的诗和艺术将是“素朴”和“感伤”的综合。甚至号称表现主义者的克罗齐也认为伟大的艺术作品“既是情感，又是再现”。

## 二、辨异与认同

由于哲学意识、文化心理、价值观念、思维方法乃至文艺创作发展道路的歧异，中西文论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面貌。从范畴体系来看，可以说是相去悬绝。即使是论述实质相同的问题，表达内容相近的见解，也会有视角、思路、表述方式等等的差别。因此，在中西文论的比较研究中辨异无疑是重要的。然而，文艺创作具有共同的规律，虽然中国古代文论家与西方文论家因时代和地域的悬隔，没有交流，却在某些方面不谋而合达到了一致，因此认同也是不应忽视的。

中西文论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第45节说：“自然显得美，如果它同时象似艺术；而艺术只能被称为美的，如果意识到它是艺术而它又对我们表现为自然”。而蔡梦弼的《杜工部草堂诗话》引洪迈《容斋随笔》里的话说：“江山登临之美，泉石赏玩之胜，世间佳境也，观者必曰‘如画’。至于丹青之妙，好事君子嗟叹之不足者，则又以‘逼真’目之”。杨万里《诚斋诗话》又用诗句来印证：“杜甫《蜀山水图》云：‘沱水流中座，岷山赴北堂。白波吹粉壁，青嶂插雕梁。’此以画为真也。曾吉父云：‘断崖韦偃树，小雨郭熙山。’此以真为画也”。这不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吗？金圣叹曾自述：“仆尝弱时欲作一文，偶以他缘不得便作，至于饭后方补作之。仆便可惜粥与之一篇也”。（《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英国美学家科林伍德也讲到了同样的事情，只是把金圣叹个人的经验提升到理论的普遍性上来阐述：“在特定场合由特定艺术家所作的作品，不只是因为它能够创作它而创作的，并且是因为他必须创作它。……每部作品的创作都是表现一种情感，这种情感是在他一生中那个时刻而非其他时刻在他身上所出现的情感”。（《艺术原理》）关于比喻，新批评派提出了“远距离化原则”，瑞恰兹说：“如果我们要使比喻有力，就需要把非常不同的语境联在一起，用比喻作一个扣针把它们扣在一起”。（参见赵毅衡《新批评》）而刘勰说的“诗人比兴，触物圆览。物虽胡越，合则肝胆”（《文心雕龙·比兴》），不正是“远距离化”吗？中国文论中内容丰富的自然论，在西方文论中也能找到类似的论述。中国古人把“自然”解释为“无意”。苏洵认为，“天下之至文”是如同风水相遭，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遇，自然成文的。（见《仲兄字文甫说》）黄庭坚称赞杜甫：“子美妙诗处，乃在无意于文”。（《大雅堂记》）叶梦得以为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此语之工，正在无所用意”。（《石林诗话》卷中）西方文论家则非常看重创作中的无意识状态。18世纪英国诗人杨格说，创作是“无意识的”自然生殖。现代法国的天主教文艺批评家马利丹认为诗产生于“精神的无意识”。美国美学家苏珊·朗格写道：“艺术冲动有时也可以是自觉的，艺术作品也可以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诞生；但是，它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却是在无意识状态下完成的”。（《艺术问题》）语义学派的英国批

评家瑞恰兹说到“在各种艺术中经常出现的一种很奇怪的现象”：“最本质的东西往往好象是无意中完成的，好象是个副产品，是个偶然伴生的东西”。（《文学批评原理》）但也有些文论家提出了不同意见。如唐代诗僧皎然就不赞成“不要苦思，苦思则丧自然之质”的说法：“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诗式·取境》）其后王安石有诗：“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也是此意。王世贞赞赏谢灵运的诗：“秾丽之极而反若平淡，琢磨之极而更似天然”。（《书谢灵运集后》）近代词人况周颐更提出：“所谓自然从追琢中出也”。（《蕙风词话》）都认为艺术成品有似自然，正是精心琢磨的结果。这种见解在西方也有共鸣者。如罗马时期的朗吉努斯说：“技巧唯有在似乎是自然时才臻于完美，而自然唯有在含有不露痕迹的技巧时才得到成功”。（《论崇高》）黑格尔也认为，简单而自然“是辛勤的结果，要经过多方面的转化作用，把繁芜的、驳杂的、混乱的、过分的、臃肿的因素一齐去掉，还要使这种胜利不露一丝辛苦经营的痕迹，然后美才自由自在地、不受阻挠地、仿佛天衣无缝似地涌现出来。……”（《美学》第三卷上）看到了中西文论共通的普泛性，就不大会轻率地断定某种理论或某种观念是中国所特有的了。比如源自道家思想的虚静说，其实西方也有，只是所用概念不同，表述方式有异罢了。如济慈指出莎士比亚有一种“消极能力”，“也就是能够处于含糊不定、神秘疑问之中，而没有必要追寻事实和道理的急躁心情。……就是说，对一位大诗人来说，美感是压倒其他一切的考虑的，或进一步说，取消一切的考虑”。（《致乔治·济慈》）这种“消极能力”可以说就是保持虚静心态的能力。苏珊·朗格说：“艺术品的情感表现——使艺术品成为表现性形式的机制——根本不是征兆性的。一个专门创作悲剧的艺术家，他自己并不一定要陷于绝望或激烈的骚动之中。事实上，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他处于上述情绪状态之中，就不可能进行创作；只有当他的脑子冷静地思考着引起这样一些情感的原因时，才算是处于创作状态中”。（《艺术问题》）为了说明这一论点，他还引了前人的经验为佐证。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发现：诗歌并非情感紧张的征兆，而是它的一个意象——“于万籁俱寂中

汇集起来的情感”。排除情绪波动的干扰，进入万籁俱寂之中，也就是一种虚静状态。又如杂文学观念，似乎是中国文论的特色，其实在西方又何尝没有拥护者。英国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一书，首先对“什么是文学”的问题作了辨析，他说到：“在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学的概念并不象今天那样有时只限于创造的或想象的写作。它指的是全部受社会重视的写作：不仅诗，而且还有哲学、历史、论文和书信”。“关于文学这个词的现代看法只有在十九世纪才真正流行”。可见，在英国长期通行的也是杂文学观念。科林伍德认为，诗歌和哲学同样可以表现理智水平的情感，因此二者之间不存在截然分开的鸿沟。他说：“好的哲学与好的诗歌并非两种不同的写作，而是同一种写作；两者都是好的写作。只要两者都是好的，就风格与文字形式而论，两者是殊途同归了；而且在两者都达到它应有的优秀水平的有限场合，两者之间的区别也就消失了”。（《艺术原理》）<sup>⑥</sup>他否定好的诗歌与好的哲学之间的本质区别，实际上就是倾向于杂文学观念。苏联汉学家费德林也非常赞同中国的杂文学观念，他把《左传》、《书经》都列入文学作品。

然而在认同中还须注意辨异。例如不少研究者以中国文论中的“风骨”、“雄浑”同西方文论中“崇高”范畴相比拟（“崇高”的同义词也译作“雄浑”）。它们确有共同点，但又不可简单地等同起来，其中的差别是显著的。首先，在西方“崇高”这个概念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其内涵的前后变化很大，最早形成于修辞学之中，后来成为美学的基本范畴。历代的文论家或美学家对于“崇高”并无统一的理解，有些见解是大相径庭的。因此，我们只能具体地说“风骨”或“雄浑”与某一家的崇高说相近似，不能笼统地说与西方的“崇高”相对应。其次，即使与某一家作比较，也只是部分相合，而不是全体一致。我们且以罗马时期的朗吉努斯、18世纪的康德和19世纪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例。朗吉努斯，非常强调文章的力度，说“崇高风格到了紧要关头，象剑一样突然脱鞘而出，象闪电一样把所碰到的一切劈得粉碎，这就把作者的力量在一闪耀之中完全显现出来”。这同“风骨”要求力度是吻合的。但朗吉努斯却十分重视惊奇感的效果，说“崇高的语言对听众的效果不是说服，而是狂喜”，这一点为后代的美学家所继承，惊奇感又演化为恐惧感。而风骨论却没有这



种意思。朗吉努斯又十分重视思想的高尚，他认为崇高语言有五个来源，“最重要的是庄严伟大的思想”，“崇高就是伟大心灵的回声”。而风骨论则限于文风，不涉及思想的高下，所以刘勰把潘勖加魏公九锡的策文也作为风骨的范例，世称“建安风骨”亦不意指建安文学有“庄严伟大的思想”。朗吉努斯《论崇高》是一部修辞学（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文章学）著作，“崇高”是贯穿全书的中心，文章的谋篇布局、选词炼句以及修辞格的运用，都以崇高为旨归。《文心雕龙》也可说是一部文章学著作，却并不以风骨为“文之枢纽”。至于“雄浑”与朗吉努斯所谓的“崇高”差别更大，只是指众多风格中的一种。康德解释“崇高”为数量上绝对的大：“崇高是一切和它较量的东西都是比它小的东西”。然而绝对的大事物在客观世界里是不存在的，“所以应该称做崇高的不是那个对象，而是那精神情调，通过某一个的使‘反省判断力’活动起来的表象”。这个涵义与“风骨”似乎沾不上边，而与“雄浑”较接近。康德又讲到“力学的崇高”，这与“风骨”的涵义有一致的地方。但康德说的是：“自然，在审美的评赏里看作力，而对我们不具有威力，这就是力学的崇高。”“假使发现我们自己是在安全地带，那么，这景象越可怕，就越对我们有吸引力。我们称呼这些对象为崇高，因为它们提高了我们的精神力量越过平常的尺度，而让我们在内心发现另一种类的抵抗的能力，这赋予我们勇气来和自然界的全能威力的假象较量一下”。这是说，崇高感来自人对自然威力在精神上的超越，是从恐惧感的摆脱转化而来的。这样意义上的“崇高”，无论与“风骨”还是“雄浑”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则认为：“崇高的事物就是指在范围上较之和它相比的事物超出很多的事物而言；而崇高的现象则是指一种较之其他和它相比的现象更要强烈得多的现象而言”。那就与“风骨”或“雄浑”没有多少可比的了。

总之，在中西文论比较研究中，辨异与认同常常是紧密联系着的，辨的是同中之异，认的是异中之同，宜并举而不可偏废。

### 三、互补与互释

中西文论存在互补性。中国传统文论所忽略的问题，在西方文论中却受到高度的重视；相反，西方文论未尝涉足的领域，却可能是中国传统文论探讨的重点。而且，即使是共同关注的课

题，也因考察角度不同，立论基点不同，指导思想不同，表述方式不同，而各有千秋，也可以取长补短。因此，中西文论的融汇交流，互相补充，必将促进文艺学的充实和发展。

中国文论的范畴异常丰富，数量之多超过了西方文论，而且大都是通行的，不像西方不少范畴只为一家一派所专用。其中一部分（如“意境”、“神韵”）至今仍有生命力，不是西方的范畴所能替代的。而西方的文论范畴，已为中国所大量吸收，构成了现代文论范畴体系的支柱，近年来又被陆续引进。由于西方小说、戏剧的发达早于中国，叙事学理论就比较成熟，而中国在这方面的遗产是薄弱的。但是，中国的诗论是强项，这个宝库值得发掘、整理，并向西方介绍。西方文论长于逻辑思辨，作细致入微的辨析，注重概念的明晰界定，倾向于理论的科学化。而中国传统文论则长于整体把握，用简洁凝练的词语来概括，表达直觉的审美体验，倾向于理论的艺术化。如中国古人说作诗要“至苦而无迹”（皎然语），同一意思，西方美学家则用大段议论来反复阐明，把其中的原理剖析得一清二楚。然而中国文论用语的蕴藉精警，一言中的，耐人寻味，又为西方所不及。如中国的“滋味说”，基于通感或联觉的效应，以“味”为审美范畴，显示了审美的主观性、直觉性和非功利性，但对于原理的认识是粗略的。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也用品味来说明审美鉴赏：“人们可以在我面前把一盘菜的成分一一数说给我听，并且指出每一成分对我是适口的，而且又有理由称赞这食品的卫生，我将不听信这一些理由却用舌和上颌去亲自尝尝，然后依据这个来下我的批评（不是依据一切的原理），事实上鉴赏判断永远总是作为一个对象的单独判断来下的”。由此说明了审美鉴赏与品味一样具有主观性、直觉性和非功利性，鉴赏判断是对一个对象的单独判断。但康德又辨明了快适、美、善三种愉快的不同：“在这三种愉快里只有对于美的欣赏的愉快是唯一无利害关系的自由的愉快；因为既没有官能方面的利害感，也没有理性方面的利害感来强迫我们去赞许”。“美是不依赖概念而作为普遍愉快的对象被表现出来的”。中国文论用“味”区别了美与善，“味”没有理性方面的利害感，不经过概念，不能用知解力来分析，是一种直觉感受，所以与善不同。但是还未能将美与快适区分开来。康德说：“饥饿

是最好的美食……只有在需要满足后，人才能在许多人里面分辨出谁有鉴赏力，谁没有鉴赏力来”。在饥不择食的情况下，有快感而无美感，只有在需要满足之后，才能品味，才是审美鉴赏。康德又指出：“关于快适，每个人只须知道他的判断只是依据着他个人的感觉，并且当他说某一对象令他满意时，也只是局限于他个人范围内，那就够了。”快适只凭个人的感觉，所以是偏爱，味觉的快感可以有偏嗜，而审美鉴赏则不允许偏爱，要求具有主观的普遍性，虽然不要求客体具有普遍性。因此，笼统地言味不够周密，应该承认康德的分析是深刻的。然而中国人还提出“味外之旨”，“味在咸酸之外”（司空图），较之西方又别有会心处。又如形神论，在中国文论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西方文论中，虽没有类似于形神的概念，其实也接触到了同样的问题。19世纪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1815年版序言中讲到想象和幻想的区别时说，想象和幻想所取得的，在与对象的“相似”这一点上是不一样的。幻想所给予的“相似”，限于外形轮廓和特点以及偶然的突出的特性；想象所给予的“相似”，“更多地在于神情和影响，而不在于外形轮廓和特点，更多地在于天生的内在的特性，而不在于偶然的突出的特性”。这两种不同的“相似”不就是形似和神似吗？现代表现主义文论家德国的埃德施米特说：“只有当艺术家的手透过事实抓取到事实背后的东西，事实才有意义”。要“舍弃外表的相似性而使其最后的本质显露出来”。（《创作中的表现主义》）“外表的相似性”是形似，那末“事实背后的东西”就是“神”了。西方文论未能熔铸成富有概括力的范畴，中国的“形”与“神”、“形似”与“神似”似乎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举出上述这些例子，旨在说明中西文论的互补性是应该充分利用的，而揭示这种互补性也是中西文论比较研究题中应有之义。

中西文论既然可以互为补充，那末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互为诠释。西方文论富于思辨性（尤其是学者的文论），但往往流于烦琐晦涩，令人如堕五里雾中、不得要领，如以中国传统文论中的相应词语予以点明，可收提要钩元之效。朱光潜先生的译著（如黑格尔《美学》），有时就在脚注中引中释西。这里着重谈谈引西释中的可能性。中国文论虽有简捷明快的优点，但往往失之简略，只有论断，而无论证，对原理机制缺少深

入的探究，如能适当地引用有关的西方理论，会有助于作出科学的说明。试以言意之辨为例。中国古人很早就发现处理言意矛盾是文学创作中的难题，而且认识到言不尽意的问题是不可能完全解决的。原因何在？刘勰的回答是：“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这样的解答固然已触及问题的实质，但毕竟过于简略。我们不妨参照西人的解释。如康德认为，“审美意象，就是由想象力所形成的那种表象。它能够引起许多思想，然而，却不可能有任何明确的思想，即概念，与之完全相适应。因此，语言不能充分表达它，使之令人理解。很明显，它是和理性观念相对立的。理性观念是一种概念，没有任何的直觉（即想象所形成的表象）能够与之相适应”。这是说，审美意象不是理性的概念，语言是表达概念的。因而不能充分表达审美意象。康德的阐述是否可在一定程度上诠释刘勰的论断呢？“文不逮意”在陆机《文赋》中引为憾事，但后来的文论家却觉察到言意矛盾正可以利用来作为一种特殊的表现手段以增强诗文的艺术效果。然而其中的原理机制，中国文论家并未深论，那末，我们是否可以借助于西方的理论来阐明呢？比如用符号学的理论。霍克斯《结构主义与符号学》一书中写道：“诗歌与其说不能使词和它的意义相分离，不如说诗歌使词的意义范围倍增，并常常令人困惑不解。它再一次提高了常规语言的活动水平。一个词从它习惯的所指对象‘分离出来’，这最终意味着它可能自由地和大量地与所指对象结合在一起。简言之，词的‘诗的’用法使模棱两可性成为诗歌的主要特征，正是这个特征，使诗歌的结构作用从能指转到所指”。“在语言的美学使用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能指表现出高度的多元性，即高度的模糊性”。在文学作品中，言和意的关系即“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就是“分离”（或减弱）了能指与所指的习惯性联系，赋予“能指”以多义性和模糊性，结果反而使能指可以同更多的所指结合起来。当然这样的互为诠释未必十分贴切，但就在这互有出入之中，是否又可以得到一些启发，推动我们去作深一层的探索呢？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刘斯翰

# 中菲人民战斗情谊的颂歌

——读《风雨太平洋》一、二部

何楚熊

《风雨太平洋》是著名老作家杜埃积数十年之心血凝结而成的一部大气磅礴的宏篇巨著。他以三部百万字的篇幅，热情讴歌了菲律宾土地上华侨抗日游击支队（以下简称“华支”）依靠了菲律宾人民的支持，与菲律宾抗日游击军并肩在吕宋平原坚持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尽管作品的第三部尚未附梓，但是读了这六十万字篇幅的第一、二部，已令人激动不已，仿如风雷滚荡于胸中，欲罢不能，于是夜以继日一气读完。作品究竟为何有如此魅力，现试分析于后。

在我读过的反映二次大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作品中，无论是我国反映八年抗日战争的好作品，还是苏联以卫国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叙事作品，或是美国的《巴顿将军》、《虎、虎、虎》、法国的《大屠杀》、《虎口脱险》，由于作品所取视角的局限，都未见有《风雨太平洋》那样宏大的。《风雨太平洋》始终把吕宋平原上“华支”的抗日游击战争放到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大背景之中。作品总是在十分恰当的时机，或借助人物之口，或借助监听新闻广播，或借助作家评介，将“华支”的斗争同各个时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历史事件联系起来，同祖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局势联系起来。仅第一、二部写到的重要历史事件，就有东方战场上的“皖南事变”、“百团大战”，八路军、新四军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以及东南亚各国的战局。苏德战场方面则从希特勒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互不侵犯条约，向苏联发起突然袭击，写到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大血战的胜利，南线大反攻，十分准确地评价了苏联红军和人民在斯大林领导下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承受的重大牺牲和作出的具有转折性意义的重大贡献。在太平洋战场上，写了日寇背信弃义，偷袭珍珠港，随后又袭击了英国在太平洋的基地新加坡，占领了菲律宾、马来亚、缅甸，使战火蔓延到太平洋三分之二的海域和地区，也写了美军在菲律宾的“死亡进军”，在中途岛反击日寇的胜利，在爪达康纳岛以及在西太平洋上的新不列颠岛的登陆。……上述各战场的概叙，都与“华支”的决策、行动联系起来，同华侨和菲律宾人民抗日斗争的心态、情绪的变化、发展联系起来。尤其深刻的是，苏联和美英就经济和军事合作达成协议，美英关于在欧陆开辟第二战场的承诺这些事件的叙写，同华侨抗日反奸大同盟总部（以下分别简称“抗反”及“抗反总部”）内部的两种政治思想路线的斗争紧密

联系着，因而也同展现人物性格的冲突和情节的进行联系着。从作品描述的太平洋战争中菲律宾吕宋平原的“华支”和菲游击军(简称“福克”)抗击日寇的游击战争，读者切身感受到了整个太平洋战争，乃至全世界的时局，于是情绪紧张，心潮振荡，满眼风雨太平洋。

特别发人深思的是，关于美英年内在欧陆开辟第二战场的承诺久久不付诸行动的叙写。美英联军单方面改变原苏与美、英联合协议的决定，而在北非登陆，避重就轻。这十分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美英、尤其是美国对社会主义苏联的复杂心态。作品一方面并不否定北非战场的意义，同时又十分形象地、深刻地揭示了“如果(美英)不开辟第二战场，苏军也能把德国鬼子赶出苏联”的历史真实。事实上，欧陆战场的开辟是在意大利已经投降，苏联人民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德军即将全线崩溃的1944年6月才实现的。《风雨太平洋》对这段历史的真实的反映，至今还具有十分重要的思考价值。

## 二

情节的波澜起伏，跌宕多姿，是作品艺术成就的又一重要方面。

作品第一卷开篇，以沉重的情调直接导入主题。其后，珍珠港事变，马尼拉被美军宣布为“不设防城市”，日军登陆，于是，引来了“劳联”猝不及防的盲目大撤退。由于盲目和猝不及防，撤退变为苍惶逃难。人物历尽险境的命运令人牵肠挂肚。此后，加斯特为首的非游击军会合，宣布停止撤退，成立“抗反总部”和组建“华支”，到西部的巴斯布尔搜集美菲军撤退时丢弃的枪支弹药，顺利开展起袭击日寇的敌后游击战。直到此时，读者一颗吊起的心方才放下。然而，作品立即又导入了反扫荡的险恶历程。阿莱耶山的遭遇；日寇重兵搜索，欲置“华支”和“福克”于死地；“福克”教育部有傅里奥、李丽姐、李锦芙等“华支”成员参予的29人13天突围的苦难历程等，再度将情节推上又一个高峰。……

在上述大情节线中，始终包含着两条情节线的并行与交叉。自马尼拉撤退开始，便话分两头，一头是叙述以许庚为首，由加斯特当向导的“劳联”大军向着蔓蒂里迂回进发；另一头是描写以霍斯特·李为首的家属及部分“劳联”成员，辗转流徙，最是牵动人心。第三十章，许、李重聚，正式宣布停止撤退，并成立“抗反总部”之后，又转写为“华友”武装斗争与马尼拉地下斗争两条行动线的紧密配合，并开始披露“抗反”领导成员之间两种政治思想路线的分歧。这种分歧的缓慢展现，是否为第三部埋下伏线？这种分歧，实质上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前途、决胜力量乃至“抗反”的具体行动方针的分歧。它的展现，对深化作品的主题无疑是重要的。

上述重大情节在发展中又张弛错落，跌宕多姿，穿插着五对恋人不同恋爱方式的发生与发展的描写。许庚与李锦芙的爱情深沉而又含蓄腴腆。李炳祥的着意缀合，李锦芙与许庚独处时的对话，傅里奥钻进李锦芙小草屋的“说服”等等，写来皆意趣盎然。傅里奥与李丽姐的爱情描写则别具一格。从大撤退前夕傅里奥给李丽姐那封不署名的信开始，两人朝夕相处，共同战斗、生活、工作得那样默契，但始终没有挑明。直到第二部

末尾，李丽姐就要到部队去参加前线战斗了，在离别前那“星光闪烁”之夜，在姑娘的热情鼓舞下，傅里奥才终于鼓起勇气，结结巴巴地问道：“你爱我吗？”他们的爱情经历了多么曲折的心路历程。菲律宾姑娘玛丽亚就不同了。她爱上了吴青，就一直在芒果树下等待他的归来，她爱得热烈，爱得豪爽，没遮没拦。卡琳娜对柯慈的爱情那样温柔，那样深切。还有另一对中年恋人洪启志与李锦治亦终成眷属。这些爱情描写溶在大情节之中，平添了情节进展的姿彩。

在那艰难险恶的环境之中，作品还设计了几个晚会场面。其中有纳姑娜湖之夜的璀璨，有巴斯布尔山上麻鲁加人那盛情的篝火，还有西丽碧村卡琳娜的西班牙独舞，阿利斯传宣队的精彩表演，机枪手柯慈的麻鲁加舞，“华支”全体战士慷慨激昂的高歌，……这些场景的描写成为情节发展不可缺少的组成部份，使情节更生动，更丰富，有更浓郁的生活气息。

### 三

情节的丰富与生动与人物塑造的艺术成就分不开。《风雨太平洋》一、二部，有名有姓者180余人。其中已具有典型人物性格的，也有十余个。我以为，典型人物的标志是具有充分的艺术个性，亦即活现了作为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这一个”。如许庚，他同霍斯特·李都是侨领，都参加过大革命，都是“劳联”领导人，都是华侨民主抗日阵线的代表人物。他们共同创建了华侨“抗反总部”及“华支”，年龄亦相近。但他们又是那样不同的两个活生生的“这一个”。许庚持重深沉，深沉得执着，近乎迟缓。他生活清贫孤独，一心扑在“抗日”工作上。他对亡妻的爱久久不能忘怀，于是落落寡欢，他只知道工作、工作，而无暇顾及人生的其它乐趣。对战局未考虑成熟时，任凭人们如何争论他也一言不发，一旦有了看法，他便倾心直陈。他对法西斯的本质特别清醒。当日本做出与美国谈判的积极姿态时，便预见到其中可能有诈。他深沉得有量度，考虑马尼拉“抗反”地下领导人选时能够看重刘一鸣的地下工作经验，而宽容了他的其它缺陷。霍斯特·李也深沉持重，但他热情、奔放。他广泛结交，善于团结各阶层的华侨于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之内，也善于团结菲律宾朋友，同加斯特等能很好地共事合作。他热爱生活，有广泛的业余爱好。他爱他的家族成员，每当有重要客人总喜欢把他的家族向客人一一介绍。他疼爱大妹李锦芙，也关心许庚，千方百计缀合他们的姻缘。他乐观，即使被困在山道示老爹的海边小村庄，大伙怏怏不乐之时，他还是乐观地笑道：“别愁眉苦脸，办法总会有的。”在菲人帮助下，他最终把这一群逃难者带出了险境。他也发怒，对日寇的侵略怒不可遏，对美军猝不及防地弃守马尼拉，“他十分愤怒”。他也宽容，能体谅，善于缓解内部矛盾，使大伙团结在抗日原则之下。

李锦芙则是一个有胆有识，有才华而又坚强成熟的中年知识女性。她乐观热情爽朗，积极投入抗日救国工作。在这些方面都与她大哥霍斯特·李十分相象。她还挚爱她的艺术，即使在逃难之中，在战争的日子里也不忘带上画版，绘下每个值得纪念的画面，甚至在阿莱耶山艰险的突围途中，她仍兴致勃勃地作画。当她发现荆丛顶上有几串

紫色花朵随着长长的藤蔓垂下来，在绿叶丛中显得多么幽雅艳丽，便匆匆在画幅上挥笔写上“紫云绿帐”，又加上“反扫荡中的山地蒙古包”作副题。从这绿色的山地联想到“蒙古包”，正是李锦芙这一个画家的独特经历才有的。她的情感又特别深挚细腻，她对牺牲了的恋人眷恋之深切，同许庚对亡妻之情十分相似。但她毕竟是个善良热情的女性，她爱她的学生，林秀治更称她为干妈。她将母爱倾注在侄女儿李丽姐身上。正是这种爱使她对许庚产生了同情与敬佩，逐渐化解了她以独身纪念牺牲了的恋人的情结，终于成了那场别开生面意趣盎然的“林中婚礼”。另一个虽然篇幅不多却写得活灵活现的中年女性，就是菲人番娜。她那泼辣爽利勇敢热情的性格，对敌斗争中坚韧顽强锐不可当不共戴天的精神，足令敌人害怕的威风，连同那“会啼的母鸡”的绰号，还有那份要弄清所谓“战略与策略”的执着与纯真，都使她呼之欲出，给人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此外，傅里奥、李丽姐、蔡杰、吴青、柯慈、林雄、玛丽亚、巴鲁查、乃至加斯特、阿利斯、刘一鸣等都是活脱脱的一群。当然，这些人物的性格塑造尚未完成，他们的艺术个性尚待第三部有更充分的展现。但无疑，他们都是已各具个性，血肉俱全，初具典型格局的圆型人物。

作品一些出场不多的人物，亦表现了作家描写人物形象的卓越才能，有如宋代画家梁楷之《太白行吟图》，只三笔两划便写出了人物之精粹。如自愿为逃难的华侨探路的伊沙玛太太，在探明情况后李锦芙把为应付敌人而备用的鸡和雪茄双手捧上时，只一笔：“‘纳戈！我成了日本强盗啦’，她惊呼，随即迸发一阵笑声，摆摆手，摇摇头，不肯收下。”便绘声绘形地把一个纯朴厚道的她推了出来。山道示老村长，麻鲁加头人加冬，向导查克尔，亦莫不如此，甚至小拉比和小狗康西也只两三个动态，便活灵活现地留在读者心坎里。

作品还有一个重要特色，就是不描写敌人的暴行，也不塑造丑恶的“反面人物”形象。在180余有姓名的人物之中，除郑苟、施全泰外，无一敌伪中人。对于汉奸郑苟，也只在第二、三章十分简约地描写了他对李锦芙师生及“劳联”的寻衅。对日寇的凶恶残暴野蛮，则只作概括性的叙写。对日寇的猖狂扫荡也只从“华支”和“福克”反扫荡之艰险着笔。然而，读者却实实在在感受到一个凶狠、猖狂、残暴、阴险奸诈的敌对势力的存在。显然，作家的这种艺术处理是成功的。他自觉或不自觉地借助着语言的模糊性，借助读者已有的认识与经验，以诱发联想与想象，从而创造一个比叙述语言的所指更丰富明晰的意象世界。韦勒克曾告诫作家，在小说中“‘概述’最好减到最少。”然而，在《风雨太平洋》中，这种“概述”运用得多么出色；既回避了血淋淋的丑恶场景的展现，又集中了尽可能多的篇幅与笔墨于美与善的张扬。这在同类题材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在这方面，作品为我们提供了多么宝贵的艺术经验。

#### 四

恩格斯曾提出了“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要求。如果我们用创造了典型环境来称誉《风雨太平洋》，是一点儿也不过份的。作家十分重视从历史深度上挖掘菲律宾人

民的优秀传统和反侵略的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作品第二章便浓墨重彩地叙写了19世纪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者的菲律宾人民领袖，民族英雄尼伐波西奥的历史功勋和他那“坚毅不拔，勇敢刚直”的英雄性格。作品热情颂扬了菲律宾第一个著名民族英雄16世纪的拉布拉布，还多处写到菲律宾人民十分热爱的近代英雄黎萨尔，多处唱颂菲著名诗人阿波斯托尔为纪念英雄的黎萨尔而写的那首凄楚、愤恨而又悲壮动人的诗篇：那“子弹虽穿透了你的脑壳／你的理想却摧毁了一个帝国”的诗句多么豪迈。它久久，久久在读者心中回响。

作品就是让“华支”活动在有着如此光荣历史的菲律宾人民之中，始终在菲律宾人民的友好热情的支持下，与菲律宾人民并肩战斗。正如许庚与霍斯特·李常说的那样：如果没有菲游击军的支持，没有菲律宾人民的支持，“华支”的存在是不可能的。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华支”成了二次大战期间华侨在异国他乡能够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唯一一支武装队伍。且不说“福克”为帮助“华支”派到“华支”队伍中的玛丽亚、塔拉德等热情的菲律宾战士如何同“华支”同甘共苦。也不说逃难途中依沙玛们如何不顾一切阻挠与威胁，毅然伸出援助之手，为霍斯特·李们提供饮食和探路，朗萨斯村人为李锦治一行提供栖身之所，与世隔绝的麻鲁加人在认识了“华支”的诚挚善良之后，为“华支”提供了那么多的枪支弹药。单说在阿莱耶山突围的13天难以名状的险恶历程。作品整整花了十章五万多字的篇幅极其生动地描写了这场反突围的斗争生活。其间有阿利斯关于菲历史的动人叙说，对菲律宾的富饶美丽的赞颂，有篝火旁的夜话，绿色蒙古包的抒情，更有阿利斯、查克尔们与傅里奥、李丽姐、李锦美的互相勉励，相濡以沫，有九死一生的磨难，饥饿的苦痛，也有绝处逢生的喜悦。这是作品描写“华支”与“福克”并肩战斗，结下难解难分的血肉情谊最集中、最动人、最有魅力的部分。还有圣加罗斯村中村长拉博斯与乡村女教师对宁波张·虞多乐的拼死掩护，既紧张危急，又机智果敢。更动人的是坦丁把渡河的机会让给了宁波张·虞多乐、拉博斯和其他三个菲难民，而他在敌人逼近河岸时，独力还击，直至弹尽被擒，英勇就义。这是加斯特为反法西斯战争，为保卫菲律宾，也为中菲友谊献出的第一个儿子。可惜，也许囿于现实时空关系，作家对坦丁的牺牲却采用了补叙的方式，未能谱出更震撼人心的英雄乐章。

作品还写了马尼拉海湾的壮丽，巴斯布尔山的巍峨，阿莱耶山的神秘。写了西丽碧村的美丽，纳姑娜湖的璀璨，门户山上摩天岭盆地的幽美。写了菲律宾土地的富饶，物产的丰富，桑巴吉打花的茅香，吕宋杧果的甜蜜，棕榈树的苍翠，木棉花的火红，巴律昼的甘香，苏曼糕的柔软，咖啡的馥郁，青椰子的沁润……更令人难忘的是对于神奇的纳拉树的描写。作家花了一千多字的篇幅，从各个角度切入，诉尽其温柔与刚毅，仿如一个血肉之躯。

作家是爱菲律宾的，这爱是一个华侨战士对侨居国之爱。他爱菲律宾的人民，才把他们写得那么善良、热情、纯朴与刚正，那么美。作家也写了菲奸，也写了菲律宾的坏人，但如同写其他的丑恶势力一样，都作了虚写的艺术处理。作家也爱菲律宾的土地，才把

她写得那样富饶美丽。

所谓典型环境，我以为就是塑造了一个非常具体独特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以及在这独特的自然、人文环境中活动着的独特而又足以显现彼时彼地人民的心理、情绪乃至政治趋向的人际环境。《风雨太平洋》达到了这个境界。唯其如此，“华支”才区别于“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以及活动在祖国任何地区的游击队。

《风雨太平洋》第一、二部的艺术成就是令人瞩目的。她是我国新时期以来一部重要的革命现实主义巨著。她不仅填补了题材上的空白，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华支”树碑立传，为弘扬中非人民在反法西斯并肩战斗中结下的血肉情谊谱写了一曲大气磅礴的颂歌，而且为我们的革命现实主义艺术提供了可贵的艺术经验。其成就，当然根源于作家深厚的生活积累，深切的生活体验；根源于作家数十年来自觉坚持革命现实主义道路，勤奋创作所建构起来的艺术才能；也根源于作家广博的知识——尤其是菲律宾历史的知识。更令人注目的是他那共产党人的高瞻远瞩和宽阔胸怀，使他能站在一个制高点上把握他的题材，成就了史诗般的格局。

当然，作品也不是白璧无瑕，从总体看，作品虽然投入了深挚的热情，但有些方面还觉得不够充分。如“林中婚礼”一章，对许庚和李锦芙的结合，写得过于冷静，如能投入更多的激情，揭示他们的内心感受，让读者也分享他们的幸福欢乐，也许更动人。作品写了四位“华支”和两位“福克”战士的牺牲，但都用补叙的方式传达，对这样史诗性的反法西斯战争巨著，作为读者，我以为有理由要求作品能够出现如贝多芬《英雄交响曲》第二乐章《葬礼进行曲》那样的悲壮与深沉。

作者单位：广州华南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陶原珂

---

（上接第120页）

舍而宿止也。”王注得其意。游国恩《天问纂义》云：“馆同谓同馆也，倒辞耳。”如此，则“馆同爰止”即止于同馆，即止息于同一馆舍之中也。

“成汤东巡，有莘爰极。”王注：“爰，于也。极，至也。言汤巡狩至有莘国，以为婚姻也。”王注不误。“有莘爰极”即极于有莘。

“昭后成游，南土爰底。”王注：“爰，于也。底，止也。言昭王背成王之制出游，南至于楚。”“南土爰底”即底于南土。故王注释为“南至于楚”。

作者单位：潮州市韩山师专

责任编辑：陶原珂



# 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主张

宋其葵

五四运动前(1918年),《新青年》率先刊登了探讨儿童、妇女问题的文章。之后,鲁迅、胡适、茅盾、郭沫若、陈独秀、郑振铎、沈尹默、叶圣陶、刘半农、夏丏尊等人都积极投身于儿童问题的研究,或撰文研究儿童心理学(如陈鹤琴),或撰文探讨儿童教育(如胡适),或研究儿童用书(如夏丏尊)。出版界开始出版了一些适合儿童阅读的童话故事,它们大多是郑振铎、唐小圆、孙毓修、沈德鸿等人根据外国童话、民间传说及中国古典文学改编的,对于救助从来没有自己读物的儿童来说,无疑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仅靠改编,仍然不能解决中国儿童没有自己的文学的问题。当时的思想先驱们敏锐地认识到,只有创作儿童们自己的文学,才是改变中国儿童成长的道路,胡适、郭沫若、鲁迅、周作人等,都提出了“为儿童的文学”的主张。“给中国童话开了一条创作的路”<sup>①</sup>的是叶圣陶,而在儿童文学理论探讨中最为积极、影响最大、为中国儿童文学奠定理论基础的,除鲁迅之外,首推周作人。

1920年10月26日,周作人应北京孔德学校之约,作了题为《儿童的文学》的演说,第一次把文学和儿童联系在一起,正式提出了“儿童文学”的名称。演说在同年12月的八卷四号《新青年》刊出后,影响甚大。从此,中国文学有了儿童文学这个分支。早在1904年,周作人就读于江南水师学堂时就翻译了《阿里巴巴和四十个强盗》,易名为《侠女奴》,署名萍云女士,连载在《女子世界》1904年7、8、10、11月几期上。1906年用文言文写了一篇反映孤儿生活的《孤儿记》,1909年与鲁迅合译《域外小说集》,其中,俄国梭罗古勃的《童子林的奇迹》《铁圈》等篇,都是反映儿童生活的小说。<sup>②</sup>1913年,在绍兴任职时,他开始征集绍兴儿歌童话,编了一本《绍兴儿歌》<sup>③</sup>,

并写了几篇儿歌童话的研究文章。1917年到北京后,周作人译了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皇帝的新衣》、铃木三重吉的《金鱼》、国木田独步的《少年的悲哀》等儿童文学作品,并写了一些反映儿童生活的、题为《儿歌》《小孩》的儿童诗。然而,周作人对中国儿童文学的贡献还不在于此,而在于他那几十篇探讨儿童文学理论的文章。

周作人研究儿童文学理论,是从1913年在绍兴教育会任职时开始的。1913年到1914年,他写了《童话略论》《儿童研究导言》《儿歌研究》《征求绍兴儿歌童话后》《玩具研究》《小儿争斗之研究》《儿童问题之初解》《儿童话释义》<sup>④</sup>等十数篇论文和评论,阐发了他进步的儿童观以及对儿童文学的初步看法。1917年参加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撰稿编辑工作后,他的有关儿童文学的理论思想也日渐完善。1920年10月26日《儿童的文学》问世,标志着他的儿童文学理论观的成熟和系统化,此后直到大革命前,他陆续发表了几十篇儿童文学论文,不断补充他的主张。1927年以后,周作人的写作兴趣转向小品文,他的儿童文学主张只在一些序跋里还零星地阐发,如《长之论文序》、《儿童剧》序二、《朝鲜童话选》序等,其观点多重复以前的思想,已较少新见。

周作人的儿童文学主张,是建立在他的人道主义儿童观和人道主义文学观基础上的。

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周作人第一个提出“思想革命”的口号,他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高扬起人道主义旗帜,向中国封建主义文化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发动了勇猛的攻击,提出要真实反映并努力改造社会人生诸问题的文学主张。

<sup>⑤</sup>周作人反对封建主义主要从三方面入手,反

对封建礼教，求得人的解放；反对封建的妇女观，争取妇女解放；反对封建的儿童观，争取儿童的解放。周作人的儿童观是其人道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封建主义儿童观，集中体现在儿童教育上。封建主义的儿童教育，从不把儿童当作独立的人看。周作人首先把批判的锋芒指向这一点：“据人家传闻，西洋在十六世纪发见了人，十八世纪发见了妇女，十九世纪发见了儿童。于是人类的自觉逐渐有了眉目，我听了真不胜歆羨之至。中国现在到了哪个阶段我不能确说，但至少儿童总尚未发见，而且未曾从西洋学了过来。”<sup>⑥</sup>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封建的儿童教育不懂儿童不理解儿童，“以为他们是矮小的成人，同成人一样的教练，其结果是一大班‘少年老成’，一早熟半僵的呆子，只适于做遗少的材料”。<sup>⑦</sup>他指出，“早失了赤子之心的‘成人们’，忘却了自己的儿童时代的心情，对于正在儿童时代的儿童心情于是不独不能理解，与以相当的保育调护，而且反要加害”。<sup>⑧</sup>对那些视子女为“父母所有物”“自由处置、随意处刑、随时变卖或赠与”<sup>⑨</sup>的父母们，周作人非常愤怒地称他们为“野蛮的大人”。这些“野蛮的大人”教育儿童采用了郭橐驼种树的方法，“偏要依他的御意去事倍功半的把松柏扎成鹿鹤或大狮子”。儿童在这样畸形的教育方法下“终身曲着背”，“而且又觉得这是正当，希望后辈都扎得同他一样”。<sup>⑩</sup>他甚至反省了自己的教育方法：“我们虽然不打小孩的嘴巴，但是日常无理的呵斥，无理的命令，以至无理的爱抚，不知无形中怎样的损伤了他们柔嫩的感情，破坏了他们甜美的梦，在将来的性格上发生怎样的影响”！<sup>⑪</sup>

周作人进一步剖析认为，儿童教育之弊端“也是专制制度之缩影”。<sup>⑫</sup>他指出了封建教育与现代教育的根本区别：“我们对于教育的希望是把儿童养成一个正当的‘人’，而现在的教育却想把他们做成一个忠顺的臣民”<sup>⑬</sup>。两种教育，两种结果，一是正当的“人”，一是忠顺的臣民，鲜明对照出本质的不同。他认识到，只有彻底打倒封建制度，才能彻底改变儿童教育和儿童的命运，但他并未能找到建立新的教育制度的途径。

从周作人对封建主义儿童观的批判可以看到，他的人道主义儿童观有三个特点：

1. 周作人把“女人与小儿的发见”，看作是

“人的真理的发见”的延续，看作人的解放的一部分。他提出了“尊重儿童”“理解儿童”“承认儿童是完全的人”“独立的人”的进步主张。他把承认儿童是独立、完全的人并加以尊重作为救救孩子的出发点，这是他人道主义儿童观的核心思想。

2. 他承认儿童有自己的特点，儿童教育要顺应儿童的特点和需要，把儿童培养成正常的人。他认为儿童有独立的生活，具有自己的特点，理解儿童，首先是理解他们“在生理心理上”和大人不同。在教育儿童时，周作人主张要顺应儿童心理和生理的需要，要供给他们不同的养料，施以不同的方法。他多次指出，儿童教育要“任儿童天性的自由发展”，他反对“干涉”，反对压抑，更反对郭橐驼植树似的畸形教育方法。他说，儿童教育“应当依了他们内外两面的生活的需要，适如其分的供给他，使他生活满足丰富。”<sup>⑭</sup>

3. 他相信儿童不但要有自己的书，更应该有自己的文学。他说，“儿童应该读文学的作品，不可单读那些商人们编撰的读本，念完了读本虽然认识了字，却不会读书，因为没有读书的趣味”。<sup>⑮</sup>他进一步指出“在儿童不被承认，更不能理解的中国，期望有什么为儿童的文学，原是很无把握的事情，失望倒是当然的。”<sup>⑯</sup>他不仅把儿童问题当作人的解放的一部分，而且把儿童文学也当作人的解放的一部分，实在是颇具慧眼的。

周作人的人道主义儿童观，不仅与鲁迅当时的观点极其一致，而且与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呼声和主张相一致，既是他个人的，又是当时思想文化界的共同呼声。它是进步的，积极的，是周作人儿童文学理论的思想基础。

## 二

他的儿童文学理论，主要由以下几方面构成。

（一）关于儿童文学的“儿童的”特点。

周作人在《儿童的文学》一文中明确指出：“今天所讲的儿童的文学，换一句话说便是‘小学校的文学’”。周作人一开始便把儿童文学纳入学校教育和文学的轨道，并指出：“小学校的文学的教材与讲授，第一须注意于‘儿童的’这一特点。”他说：“儿童的文学只是儿童本位的，此外更没有什么。”所谓“儿童的”“儿童本位的”儿童性，首先指“顺应自然，助长发达，使各期之儿童得保其自然之本相”。<sup>⑰</sup>儿童文学要承认儿童的年龄差别和特点，顺应其生理心理发展的需要，并且要考

虑各自的不同需要。周作人在《儿童的文学》一文中，根据心理学的分期，系统地论述了不同年龄段的儿童的心理特点，以及各期儿童对儿童文学的需求，并且针对不同期的儿童对儿童文学的需求，对不同期的儿童文学体裁提出了具体要求。这篇系统探讨儿童文学的年龄特点和要求的论文，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和指导意义。

儿童性的第二个含义是：承认“儿童的生活，是转变的生长的”，<sup>⑮</sup>因而在供给他们儿童文学时，“倘若不问儿童生活的转变如何，只是始终同他们讲猫狗说话的事，那时这些荒唐乖谬的弊害才真要出来了”。<sup>⑯</sup>所以，儿童文学的儿童性，要求它顺应儿童生长发展和转变的需要。同是童话，供幼儿前期阅读的，就不能适于供幼儿后期阅读的要求，对于前者，“过于悲哀、苦痛、残酷的，不宜采用”，对于后者，因为“儿童辨别力渐强，对于现实和虚幻已经分出界限，所以童话里的想象也不可太与现实分离”。<sup>⑰</sup>

#### （二）儿童文学的“文学的”特点。

周作人十分重视儿童文学的文学性。他说，以前所说多偏重“儿童的”，但“文学的”这一层，也不可看轻。因为儿童需要的是文学，并不是商人杜撰的各种文章。<sup>⑱</sup>

他所谓的儿童文学的“文学的”特点，“并非要引文学批评的条例，细细推敲，只是须有文学的趣味罢了”。<sup>⑲</sup>这是他提出的儿童文学文学性的第一含义。具体来说，儿童时期是身心发展的时期，儿童文学应该顺应他们天真好奇的心理和活泼好动的特性，以有趣味的作品使他们快乐成长。有无趣味，既是他对儿童文学的要求，又是他评价儿童文学作品的重要标准。他说：“小学校里的正当的文学教育，有这样三种作用：（1）顺应满足儿童本能的兴趣与趣味，（2）培养并指导那些趣味，（3）唤起以前没有的新的兴趣与趣味”。<sup>⑳</sup>这种趣味性，既是对形式的要求，又是对内容的要求。

周作人提出儿童文学文学性的第二个含义是，儿童文学应该是内容形式两美的作品，应该既是“文艺的创作，却又是真的童话”。<sup>㉑</sup>

在内容的文学性上，周作人首先反对宣扬封建道德和封建伦理，他激烈地抨击《各省童谣集》编纂者在书中的所谓分析，他愤怒地指出：“他们相信儿歌的片词只字里都含有一种作用，智识与教训，所以处处用心穿凿，于是一本儿童的歌词

成为三百篇的续篇了”。<sup>㉒</sup>他批评编者“望文生义，找出意思”和“附会穿凿，加上教训”的作法，他还批评安徒生童话《十之九》的译者“抱定老本领旧思想”，把外国著作加上教训，“都变成班马文章，孔孟道德”。周作人认为，内容上的艺术性体现在“没有意思”上，他推崇“没有意思的作品”。他说：“只有异常才能的人，才能写没有意思的作品。……然而这没有意思决不是无意义，他这著作是实在有哲学的意义的”。<sup>㉓</sup>对此说如单从字面理解，极易误会，以为他在“竭力反对儿童文学作品具有积极的思想意义，否定儿童文学的作用”。<sup>㉔</sup>由于他认为“儿童文学的教育是文学的，而非‘道德的’”，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只有通过艺术形象、文学情感和感染力而实现，决不是靠道德的教训所能奏效的，所以他反对生硬的道德式的说教。他推崇安徒生童话，喜欢《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因为他们是“真的童话”，是“以诗人的笔来写思想”，“教训与趣味并重”。所以，周作人所谓的“没有意思”，正是儿童文学的最高境界，内容形式两美的文学化的体现。

对儿童文学的语言形式方面，他要求象安徒生一样，“用对小几说话一样”的“词句安排”，要“意思明白文句自然”。他特别提出“不要有玩世的口气，也不要夸张感伤的‘杂剧的’气味”。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儿童文学叙述者的态度对儿童读者起极大的影响。调侃的，玩世不恭的“痞子腔”会把儿童引入邪途。儿童文学叙述者的态度应该是一个爱憎分明、是非分明的正义的直接判断者的态度，并且判断的价值尺度要符合道德规范和正当的情感尺度。

此外，他还明确反对“两种方向不同的错误，一是太教育的，即偏于教训，一是太艺术的，即偏于玄美；教育家的主张多属于前者，诗人多属于后者。其实两者都不对，因为他们不承认儿童的世界”。<sup>㉕</sup>这对今天儿童文学中一些“太教育的”或“太玄美的”创作倾向，仍有纠偏的意义。

#### （三）对多种儿童文学样式提出要求。

周作人对儿童文学的多种样式作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奠定了童话、儿歌、儿童剧等儿童文学体裁的理论基础。

在童话方面，周作人充分肯定了童话的意义和作用。他说：“儿童喜欢童话故事，生性如此”。<sup>㉖</sup>“童话是儿童精神上最自然的食物，倘若不供给

他，这个缺损无论如何，不能补救。正如小孩吃淀粉质的东西，生理上所受的饿，不是后来给予乳汁所能补救的一样”。<sup>⑩</sup>因此，他高度评价了王尔德、安徒生等优秀童话作家，并且总结介绍其童话创作的经验，以丰富中国自己的童话创作。他肯定了童话的幻想、想象的积极作用，并根据不同年龄儿童的特点，研究了想象的不同类型。他说：“我相信对于精神的中毒，空想——体会与同情之母——的文字，正是一服对症的解药”。<sup>⑪</sup>但是，他又说：“想象如被放纵，又将变为梦想家”，所以，为8—12岁儿童创作的童话，“想象不可太与现实分离”，少年期要比较近于现实。

在儿歌、童谣、儿童诗方面，周作人激烈批判童谣研究中的五行志派的观点，对于1922年出版的《童谣大观》居然重复封建五行志派学说非常气愤，说它“要引老实的读者入邪道”。他认为，儿歌童谣的价值在于：A. 民族心理的表现，含蓄着许多古代制度仪式的遗迹，我们可以从这里得到考证的资料；B. 有许多可以供取法的风格与方法，供大家赏玩，供诗人吟咏取材；C. 可以顺应儿童一种天然的需要，供给他们歌咏；D. 于国语及新文学的发达有不小的影响。<sup>⑫</sup>他对创作儿歌童谣亦提出了具体要求，认为“儿歌是儿童的诗”，“儿歌之用，亦无非应儿童身心的发达之度，以满足其喜音多语之性而已”。<sup>⑬</sup>因此，幼儿儿歌要“音节有趣”，“动听”，“随韵接合”。

在儿童剧方面，他肯定儿童剧在儿童生活和儿童教育中的作用。他认为：“儿童剧于幼稚教育当然很有效用”，“用处大约有两种，一是当作书看，一是当作戏演。但是其间还有一种用处，或者比演要容易，又比看还有用，那就是当作对话念”。这样，既可以培养儿童的“合作精神”，又可以在念台词的对话练习中“养成清楚地捕捉文字中思想的能力”，养成“用谨慎的措辞、轻重的口气、自然的表示，去传达自己思想”的本领。

他对儿童剧的创作要求，首先是要“复活作者的童心”，认为童心是儿童文学作家不可或缺的创作心态。有了童心，作家才能“照着心奥的镜里的影子”“描写下来”，儿童所需的剧本便可成功，即使不能说是尽美，也就十得六七了。其次，儿童剧要创作出一个童话世界。周作人认为，儿童剧“总太与现实接触，不能感到十分喜悦”，他对“童话世界”作了明确而生动的解释：“虽以现实的事物为题材而整体的情调应为非现

实的，有如雾里看花，形色变易”。所以他主张用非现实的情调和手法写儿童的现实生活。另外，他还提出让儿童自编儿童剧，认为最“理想的儿童剧，固在儿童的自编自演”。<sup>⑭</sup>

#### （四）建设儿童文学的方法。

在儿童文学建设方面，周作人以积极的态度创作、翻译、推荐、介绍等倡导、关心和扶植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并提出了三条建设路径：

第一，正确对待中国古代文学遗产和民间口头文学，认真选取或适当改编，以做新儿童文学之用。他看到，“在文学中可以供儿童之用的，实在绝无仅有，但是民间口头流传的也还不少，古书里也有可用的材料”。<sup>⑮</sup>因此，他提倡收集童话儿歌、民谣民歌、童谣故事传说，从中选取可作儿童文学的材料。他强调，不管是选择，还是改编修订，都要“审择”，才能适用。“选取新诗，须择叶韵而和谐的”，决不应有“推背图、烧饼歌和断梦秘书”一类有害于道德的分子。《儿童的文学》一文列举了许多古典文学作品，以扬弃的态度，指出可用于儿童文学的内容及修订标准。

第二，翻译别国的东西。由于“中国这类著作非常缺乏，不得不取材译书。”这实在是一条比较快捷便当的路径。作为一个翻译家，他不但自己身体力行，翻译优秀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而且推荐其他人的译作，为赵元任、穆木天等多人的译作写序跋和评论。

第三，创作。他认为这是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新路和真正的路，整理、改编、翻译远非创作活本之举。周作人不但把为儿童创作当作自己的义务，“随时抄录一点诗文，献给小朋友们，当作建筑坛基的一片石屑，聊尽对于他们的义务的百分之一。”<sup>⑯</sup>他还把为儿童创作当作作家的“义务”，热切希望中国有更多的人重视儿童文学，希望有更多的学者文人如日本的铃木三重吉等人“都来给儿童写作或编述”。他“希望有十个弄科学、哲学、文学、美术、人类学、儿童心理、精神分析诸学，理解而又爱儿童的人，合办一种为儿童的期刊，那么儿童即使难得正当的学校，也还有适宜的花园可以逍遥”。<sup>⑰</sup>还特别希望“胜任的大雅君子出来创作朴素优良的”“更可适切的”“有趣味”的儿童文学作品。周作人高度评价和赞扬那些致力于儿童文学工作的人，对他们“表示敬意”，认为“他们才真是有心想救救孩子的人”。

### 三

周作人的儿童文学主张，有历史进步性，为早期的中国儿童文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或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一) 周作人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儿童观是建立在欧美教育学的“儿童本位观”基础上的。五四前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影响很大，其中“儿童中心”“儿童本位”等理论为中国教育界带来极大冲击力。“儿童本位论”代表的本世纪初期的一种崭新的儿童观，具有进步和革命意义，对当时不承认儿童是人的封建中国，更有其进步性。当时的新文化战士们，都多少受其影响，接受并宣传它。那时期出版的有关儿童的书籍，不管是教育、心理或儿童文学，几乎全是以“儿童本位论”作立论基础的。<sup>①</sup>周作人受其影响更大一些。虽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彻底批判封建文化思想，而“儿童本位论”对批判“父为子纲”的封建儿童观，树立儿童作为“人”的地位，又十分奏效，然而，在充分肯定周作人的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的进步意义时，也应该认识到他的“儿童本位论”的内在局限性：他过于强调“顺应”“满足”儿童本能的需要，却轻视甚至反对对儿童的正确而必要的引导性教育。

(二) 周作人的儿童文学主张受“复演说”的影响。他说：“儿童的生活，颇有和原始人相似之处”，“儿童是小野蛮”，“儿童心理与原人相似”，“儿童的精神生活本与原人相似，他的文学是儿歌、童话，内容形式不但与原人的文学相同，而且有许多还是原始社会的遗物，常含有野蛮或荒唐的思想”，作为生物进化论的一种学说，复演说有其合理性，但用复演说来解释人类社会，把儿童比作原人，用原人心理来解释儿童心理的需要，用初文学来比拟儿童文学，当然不合适。

(三) 周作人反对向儿童灌输封建道德观念，却不能正确分辨封建道德观念和正当的道德观念，他反对生硬的说教，却分不清正确的观点，他否定：“在诗歌里鼓吹合群，在故事里提倡爱国，专为将来设想，不顾现在的儿童生活——即生命”。<sup>②</sup>“不可过量的鼓动崇拜英雄的心思”“容易引起不适当的英雄崇拜与爱国心”。他特别反对儿童文学作品配合形势所做的教育和宣传，“见到《小朋友》第七十期‘提倡国货号’，便忍不住要说一句话，——我觉得这不是儿童的书了。”他自“以儿童的父兄的资格，总反对把一

时的政治意见注入到幼稚的头脑里去”。<sup>③</sup>“反对儿童文学的书报也来提倡这些事。”他认为：“群众运动有时在实际上无论怎样重要，但于儿童文学没有什么价值，不但无益，而且还有害”。周作人的这些言论表明了他对儿童文学的政治态度。他反对儿童文学关心政治，这是他背叛自己为人生艺术的初始，是他日后的文学创作越来越远离现实、脱离现实、变为写闲情逸志的小品文的初始，是他变文学为抒写性灵的为自己的主张的初始，其中的消极性是极为显著的。

① 鲁迅：《〈表〉译者的话》。

②③④ 张菊香 张铁荣编：《周作人研究资料》有关周作人传略、年谱、译著年谱等。

⑤ 参阅：朱德发《论五四时期周作人的文学主张》，《文学评论丛刊》第8辑，1981年3月；舒芜《周作人概观》，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高云《周作人论》，《文艺论丛》第11辑，1980年10月。

⑥ 周作人：《长之文学论文集》跋，载《知堂序跋》岳麓书社，1987年2月版。

⑦⑧⑨ 周作人：《读〈各省童谣集〉》。

⑩⑪⑫ 周作人：《感慨》。

⑬ 周作人：《夏夜梦·汤饼会》，1920年9月，载《谈虎集》。

⑭⑮⑯ 周作人：《关于儿童的书》。

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 周作人：《儿童的文学》。

⑶ 周作人：《我的杂学》。

⑷ 周作人：《童话概论》，原载《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1卷第8期，1913年9月。

⑸ 周作人：《两条腿》序，载《知堂序跋》。

⑹⑺⑻ 周作人：《阿丽丝漫游奇境记》。

⑼ 参阅蒋风：《资产阶级儿童本位论在解放前我国儿童文学理论中的传播及其流毒》，《儿童文学研究》，1960年第2辑。

⑽⑾ 周作人：《童话的讨论》。

⑿ 周作人：《儿歌之研究》。

⑿ 此部分引言皆出自周作人：《儿童剧》序(一)序(二)；见《知堂序跋》。⑿周作人：《土之盘筵》小引。

⑿ 参阅蒋风主编：《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

⑿ 周作人：《关于儿童的书》，以下引言同。

作者单位：广州师院中文系

责任编辑：陶原珂

# 释《诗经》和《楚辞》中的“爰”

罗英风

“爰”在先秦典籍中，只见于《诗经》、《楚辞·天问》及《尚书》，其他经传及子书均不用。本文考察《诗经》和《天问》中出现“爰”字的诗句，归纳其用法规律，并据此提出一些与前人不同的训释。

## 一

“爰”在《诗经》中的第一个用法是疑问副词。《邶风·桑中》：“爰采唐矣？沫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四句诗一问一答，“爰”之为疑问副词甚明。郑《笺》以“于何”释“爰”，至为确诂。《邶风·凯风》：“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旧解释“爰”为“曰”为“聿”（如郑《笺》及王引之的《经传释词》）。但和上引类似句比较，此处的“爰”仍当释为“于何”。闻一多《风诗类钞》正是在“寒泉”句下赘一问号。《邶风·击鼓》：“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郑《笺》：“今于何居乎？于何处乎？于何丧其马乎？”此处“爰”与“于以”对文，用“爰”或用“于以”，当是为了凑成四字句的缘故。《小雅·四月》：“乱离瘼矣，爰其适归？”闻一多《诗经通义》释此“爰”字为“犹言在何处也”。《孔子家语·辨政篇》引作“爰其适归”。《小雅·正月》：“瞻乌爰止？于谁之屋？”旧解以“爰”为助词，实则此处之“爰”仍当为疑问副词，问乌止于何处？止于谁之屋乎？由于合乐，把一句拉长成二句，为《诗经》通例。

## 二

“爰”的第二种用法相当于“于是”，用来复指其前的某一处所名词。比较《大雅·公刘》的“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和《小雅·斯干》的“筑室百堵，西南其户，爰居爰处，爰笑爰语”，知“爰”相当于“于时”，也即“于是”，复指其前的“室”，言在此百堵之室居处笑语。此处“爰居爰处”之“爰”和《击鼓》“爰居爰处”之“爰”不同，后者是疑问副词，前者近似英语语法的关系副词。“爰”的第一种用法和第二种用法都和where对等。作为关系副词用的Where，相当于in which或at which，犹如“爰”之相当于“于是”。which和“是”都是指代某一个处所名词。where作为关系副词，既用在限制性的定语从句中，又用在非限制性的定语从句中。非限制性的定语从句和主句结合非常松，中间有停顿，在理解和翻译时，一般都是处理成一个独立的单句。where实际上可视为有承接作用的there，和第二种用法的“爰”毫无二致。《魏风·硕鼠》：“乐土

乐土，爰得我所。”“爰”复指“乐土”。《豳风·七月》：“遵彼微行，爰求柔桑。”“爰”复指“微行”。《小雅·鹤鸣》：“乐彼之园，爰有树檀。”“爰”即指园中。《鄘风·定之方中》：“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笺》云：“爰，曰也。树此六木于宫者，曰其长大可伐以为琴瑟。”《笺》知其大意而错解了“爰”。朱熹《诗集传》云：“四木皆琴瑟之材也。爰，于也。”释“爰”为“于”，近是；但按诗意，可伐为琴瑟者应如郑《笺》统指六木而不仅限于四木。“爰伐琴瑟”者言在此六木之中伐取琴瑟之材也。《大雅·皇矣》：“维彼四国，爰究爰度。”“爰”复指“四国”，言究度于彼四国也。朱熹《诗集传》：“究，寻。度，谋也。彼夏商之政，既不得矣，故求于四方之国。”《大雅·绵》：“周原既既，稷茶如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笺》曰：“此地将可居，故于是始与豳人之从己者谋。谋从，又于是契灼其龟而卜之。卜之则又从矣。”《笺》以“于是”释“爰”，不误。但“于是”是地点状语，复指“周原”，谓始于斯又龟卜斯也。又“爰始爰谋”按照语法，只当说“爰始谋”，重加“爰”字是为了凑成四字句。增字成句为《诗经》常例，如“周京”和“始谋”一样，也是一个偏正词组（《曹风·下泉》：“念彼周京”），而《大雅·大明》却有“于周于京”的诗句，与“爰始爰谋”同理。

上述作“于是”解的“爰”，有时候不是复指地点，而是承接上文所述内容，此时的“爰”和英语中用在非限制性的定语从句中的关系副词when相似，而作为“于是”解的“爰”，也就相当于at that time或after that。《大雅·公刘》：“弓矣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言师旅于武装之后才出发征战。《大雅·皇矣》：“密人不恭，敢拒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爰整其旅”者，谓遂于密人入侵之时，兴师御敌。《公刘》：“止基乃理，爰众爰有。”朱《集传》：“众，入多也。有，财足也。”“众”“有”均为动词，二“爰”字可语译“然后”。

### 三

“爰”的第三种用法是把介词宾语提前，这是上述第二种用法的延伸。“爰”既然有复指作用，等于“于是”，则“乐土乐土，爰得我所”，按照古汉语语法习惯，如果中间没有停顿，就可说成“乐土爰得我所”。再把“乐土”代入“得我所于是”的正常句式，就成为“得我所于乐土”。二句比较，见出“爰”把“于”的宾语“乐土”提置句首了。“爰”的这种提宾作用正和有复指作用的“是”在宾语提前的句式中的作用相同。如《鲁颂·閟宫》的“戎狄是膺，荆舒是惩。”“爰”和“是”比较起来，只是多含一个“于”。依照古汉语的句式，在动词后面做补语的“于”字结构中，“于”字常可略去，而直接做动词的处所宾语。这时，“爰”和“是”就可以互换了。可以比较《天问》这三个句子：“南土爰底”、“南嶽是止”和“馆同爰止”。王逸释“底”为“止”，可见“南土爰底”也可说成“南土是底”，而“南嶽是止”也可说成“南嶽爰止”。

《大雅·绵》：“自西徂东，周爰执事。”毛《传》：“爰，于也。”不释“周”。郑《笺》：“于是从西方而往东之人，皆于周执事，竞出力也。”《笺》释甚确，“周爰执事”即是执事于周。上文言古公亶父自豳东行，至于岐下周原，则此处之“周”，自是一个处所词。“周爰执事”为上下文之转换句，其上言规划及平整地基既就，则众人竞相出力，执事于周原，投

身于下文所言的宗庙家室的兴建中。《小雅·皇皇者华》：“载驰载驱，周爰咨諏。”《左传·襄公四年》：“《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必咨于周（按，统括二章至五章的“周爰咨諏”、“周爰咨谋”、“周爰咨度”、“周爰咨询”四句）”。可证“周爰咨諏”即“咨諏于周”的变式。自毛《传》以来诸解，或释“周”为“忠信”，或释“周”为“遍”；但和“周爰执事”对照，此“周”也应当是一个处所词，指周京。周京为国家之中心，周天子之所在，政令典章之所自出，故须咨諏于周也。《墨子·尚同中》：“古者国君诸侯之以春秋来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严教，退而治国，政之所加，莫敢不宾。当此之时，本无有敢纷天子之教者。《诗》曰：‘我马维骆，六轡沃若，载驰载驱，周爰咨度。’又曰：‘我马维骐，六轡如丝’载驰载驱，周爰咨谋’。即此语也。古者国君诸侯之闻见，善与不善也，皆驰驱以告天子。”“驰驱以告天子”即是“载驰载驱，周爰咨諏”等四语的确解。《大雅·烝民》：“赋政于外，四方爰发。”旧解因不明语法而均未谛。“四方爰发”即“发于四方”，和其上“赋政于外”对照，至为明显。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释“发”为“行”，甚是。言颁布政令于京师之外而施行于四方也。《小雅·采芑》：“𪔑彼飞隼，其飞戾天，亦集爰止。”《笺》：“爰，于也，亦集于其所止。”《笺》释虽可通，但揆诸语法，宜云“亦止于其所集”，“止”才是动词谓语，和《小雅·沔水》的“𪔑彼飞隼，载飞载止”比较可知。同样写的是“𪔑彼飞隼”，“载飞”即“其飞戾天”，“载止”即“亦集爰止”。《大雅·卷阿》：“凤凰于飞，翮翮其羽，亦集爰止。”《笺》：“爰，于也。凤凰往飞翮翮然，亦与众鸟集于所止。”按，“亦集爰止”仍宜释为“止于所集”。和《采芑》比较，“凤凰于飞，翮翮其羽”即“载飞”，“亦集爰止”即“载止”。在《诗经》中作“止息”解的“止”，一律用为动词；而同一意义的“集”，则除了用为动词之外，还可用做名词。上举二处“亦集爰止”姑置不论，还有《小雅·车辖》的“依彼平林，有集维𪔑”为证。“有集维𪔑”即“维𪔑有集”，为了取韵而倒其词而已。在《诗经》所有的“维……有……”的句式里，“有”均为动词，带一个名词或代词做宾语。如《召南·鵲巢》的“维鵲有巢”，《小雅·大东》的“维天有汉”、“维南其箕”、“维北有斗”，《小雅·裳裳者华》的“维其有章矣”、“维其有之”。《车辖》和《鵲巢》都是写迎亲之诗。《鵲巢》诗以鵲居鵲巢喻女有所归；《车辖》则以𪔑之有集喻女有家室。“有集”犹“有巢”也。

#### 四

在《诗经》中，上举“爰”这三种用法可以用其他词语替换。第一种用法可代“焉”，如《卫风·伯兮》：“焉得谖草？言树之背。”也可代以“于以”，如《召南·采蘋》：“于以采蘋？南涧之滨。”还可代以“于焉”，如《小雅·白驹》：“所谓伊人，于焉逍遥？”《笺》云：“所谓乘白驹而去的贤人，今于何游息乎？思之甚也。”

“爰”的第二种用法可代以“焉”，不同的是，“爰”居句首，“焉”居句末。如《小雅·菀柳》：“有菀者柳，不尚息焉。”《笺》：“尚，庶几也。有菀然枝叶茂盛之柳，行路之人岂有不庶几欲就之止息乎？”按，《毛诗传笺》通释云：“菀，枯病也。”“尚”古可通“当”，此言枯病之柳，不当止息于其下。

“爰”的第三种用法可代以“焉”。《小雅·巧言》：“往来行言，心焉数之。”言数之于心



也。《陈风·防有鹊巢》：“谁予侮美？心焉切切。”言切切于心也。又可代以“云”，“爰”“云”古音声母相同，韵母相近，“云”或为“爰”之音变。《小雅·何人斯》：“伊谁云从？”言从于伊谁也。《大雅·柳》：“莫予云覯。”即莫覯于予也。还可代之以“于”。《大雅·崧高》：“谢于诚归”，《笺》云：“‘谢于诚归’，城归于谢也。”《邶风·燕燕》：“之子于归，远于将之。”《笺》：“将亦送也”。言送之于远也。

用“爰”或用“于焉”“于以”，字数的单双，可能是为了合乐的缘故。而同样用在介词宾语提前的句式里，对“爰”或“焉”和“于”的选择，也可能与乐调中音符的长短或旋律的快慢有关。在古音中，“爰”的发音最长，“焉”次之，“于”的发音最短促。

《左传》因不用“爰”字，“爰”的第三种用法为“焉”和“于”所取代。《隐公六年》：“我周公东征，晋郑焉依。”“晋郑焉依”即依于晋郑。《襄公三十年》：“安定国家，必大焉先。”“必大焉先”即必先于大。《僖公九年》：“入而能民，土于何有？”“土于何有”即何有于土。《昭公十一年》：“王贪而无信，唯蔡于憾。”“唯蔡于憾”言唯憾于蔡也。《昭公十九年》：“私族于谋，而立长亲。”“私族于谋”即谋于私族。又：“彼何罪？谚所谓室于怒市于色者，楚之谓也。”“室于怒市于色”即怒于室色于市。这些“于”字句前人说是倒句嫌笼统，应当说是介词宾语提前句。如果说，发音较长的“爰”相当于“于是”，那么用“于”代“爰”，即是“爰”的紧缩。有时，或因语急，连“于”也缩掉了，如《僖公七年》：“女专利而不厌，予取予求。”“予取予求”即取于予求于予也。

## 五

“爰”在《天问》中一共出现七次。其中一例是“伏匿穴处，爰何云？”疑有错简（参阅一多《楚辞校补》），可搁置不论。另一例是“何环穿自闾社丘陵，爰出子文？”另一本作“何环闾穿社，以及丘陵，是淫是荡，爰出子文？”不论从今本或从另本，“爰”都是第二种用法，作“于是”解，或复指上文淫荡之事，或复指上文淫荡之地的“闾社丘陵”，言斗伯比与郢国之女在闾社丘陵之间淫游，让能在此野合之地生出贤相如子文者，何能如此？诚不可解也。还有一例似乎在两可之间：“天式从横，阳离爰死。”“阳离”是一个分句，“爰”释为“于是”或“乃”，文意甚顺；但如解为“死于阳离”即因阳离而死，似亦可通。

除去上举三例，余下的四例中，“爰”均用于宾语提前。

“泥娶纯狐，眩妻爰谋。”王逸注：“泥，羿相也。爰，于也。眩，惑也。言泥娶于纯狐之女，眩惑爰之，遂与泥谋杀羿也。”自王逸以降的注家均以“眩”为动词。今按，“眩妻爰谋”即谋于眩妻，“眩”当“妻”之定语。可以比较同篇的“眩弟并淫，危害厥兄”及“殷有惑妇，何所讥？”洪兴祖补注：“眩弟犹惑弟也。”洪注确不可易。王注训“眩”为“惑”，则“眩妻”即“惑妇”，王注谓“惑妇姐谓己”，则此“眩妻”乃指纯狐氏之女。

“女岐缝裳，而馆同爰止。”王注：“爰，于也。言女岐与浇淫佚，为之缝裳，于是共

（下转第111页）

##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研究的新起点

——“南海市文明村、户建设理论研讨会”综述

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研究中心最近在广州召开了“南海市文明村、户建设理论研讨会”。20多位专家学者密切结合南海经验，就我省今后如何提高文明村、户建设水平，以及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如何赶超亚洲“四小龙”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值得深入研究的理论问题和对策性、建设性的意见。

梁渭雄（广东省社科联副主席、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当前，对“珠三角”的研究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一大热点，南海市文明村、户建设研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地处“珠三角”腹地的南海市近年来经济的飞速发展，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可靠的保证。他们从实际出发，因势利导，在全市农村广泛、深入地开展创建文明村、户的活动很有特色，不失为新时期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种新尝试、—条新路子。

关性乔（中共南海市委副书记）：我们设想，到本世纪末，全市工农业总产值在1991年113.5亿元的基础上再翻两番，突破400亿元，各项经济指标都有较大的增长。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要大力加强科、教、文、体、卫等事业的建设，使之与经济建设相适应。

在村、户创文明活动方面，首先是要努力提高文明村、户建设的水平，力争在较短期内达到省委提出的“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环境优美、城乡—体”的要求，继续坚持对文明村、户实行动态管理，以保证文明村、户建设常抓常新；其次是要抓好镇级城区的文明建设；最后还要抓好文明公路的建设和综合治理，使之同文明村、户建设，镇级城区的文明单位建设连成—体，互相促进。

范英（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研究中心秘书长、副研究员）：南海市建创文明村、户的经验，内涵了许多理性的价值。在《南海市文明村、户建设的辩证思考》—文中，我曾提出“贫穷与富裕”、“愚昧与文明”这两对矛盾，是我国广大农村中的重要矛盾的观点。认为它们都包括了物质层次和精神层次。物质上的贫穷和愚昧不是社会主义，精神上的贫穷和愚昧也不是社会主义，只有物质上和精神上均逐步达到富裕与文明，社会主义才是人们追求的福音。

这个观点，与我国现阶段主要矛盾的看法—致的。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所谓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便是物质和精神的需要。这两个需要的不断增长，离不开由物质和精神的贫穷与愚昧逐步转化为富裕与文明。所谓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不仅仅是指落后的社会物质生产力，还应包括落后的社会精神生产力。社会生产力的这两个层次，虽然不是平行的关系，但忽视精神生产力层次的作用，它本身的贫穷和愚昧既难变为富裕与文明，也难于促进物质生产力改变贫穷与愚昧的状态。

因此，现阶段我国广大农村普遍存在的“贫穷与富裕”、“愚昧与文明”这两对重要矛盾，能不能说是主要矛盾的一种具体表现呢？用这两对重要矛盾的字眼，会不会更易为广大农民群众所接受呢？如果可以考虑的话，今后在广大农村中建设文明户、文明村或文明镇时，则应强调这两对矛盾的重要地位，同时创造条件促其顺向转化。这是从现阶段我国广大农村的宏观与微观上综合来考察的—种视角，似会对农村的文明建设更实际—些。

**马中柱**（广东省委党校教授）：当前全省乃至全国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普遍问题，就是物质文明建设达到一定水平之后，精神文明建设怎样才能与之相适应，并推动物质文明建设继续发展。南海市的经验说明，提出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和要求，一定要适合富裕起来的农民的利益和需要，不然就不会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因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3页）与此同时，又要引导和推动群众去实践创建精神文明村、户的具体标准，在这个过程中，党和政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精神文明建设不能不反映党和政府的意志，不能没有党和政府的动员、组织和引导。新加坡政府用一只“有形的手”捏出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用另一只“有形的手”捏出了现代新加坡高度的精神文明，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丘挺**（广州市委党校副教授）：南海市文明村、户建设的宝贵经验可以看作是一个创造，是“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的一个突破，具体体现在：第一，它找到了从基层抓起的好路子，是推动农村基层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尝试。户（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村是农村的最基层，一户户地动员，一村村地去抓，长此下去，覆盖面定会越来越广，实效定会越来越大。第二，找到了克服“一手硬、一手软”的好办法，把“两个文明”建设化为具体的规范和明确的目标，变为大家自觉参与的群众性事业，这样，从思想认识到实际措施到具体行动，都把“两手”统一起来了。第三，它为全面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南海市文明村、户建设的内容是全面的，包含了思想、文化、审美诸方面，特别突出了思想道德、纪律建设，着重抓了科技、教育兴农等。第四，打开了农村在物质和精神方面摆脱贫穷走向富裕，从愚昧走向文明的发展通途，它们的经验具有普遍性。

**高齐云**（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南海市文明村、户建设的主要特色可以概括为“三新”：  
1. 新观念。基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认识，自觉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富裕不等于文明”的基本指导思想，明确了物质与精神上的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2. 新思路。农村基层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从农民当前所面临的实际生活和具体情况入手，才能开展得有声有

色并富于成效。  
3. 新方法。在创建文明村、户活动中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实行动态管理，点和面相结合的原则，以多带少。据南海市的统计，目前铺开的村达700多个，占全市村庄总数的50%，已被评上文明户的近6万户，占参评户数的85%以上。

**吴群策**（广东省委讲师团团长、教授）：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明确指出：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我认为这个共同富裕不体现在物质上，也应体现在精神上。物质生活不能搞两极分化，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同样不能搞两极分化。当今我国人民正逐步走向富裕，南海市创建文明村、户建设的经验在促进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袁惠民**（广东教育学院教授）：改革开放不仅促进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也引起了社会精神生活的新变化，在农村，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  
1. 广大农民从改革开放中得到了实惠，从而更加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 涌现出一大批有现代经营意识的农民企业家。  
3. 群众性的学文化学科学技术的新高潮方兴未艾。  
4. 社会主义道德新风尚正在农村兴起。  
5. 农村的村容村貌大大改观。总之，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考虑到农村变化了的新情况，并以此为出发点提出相应的要求，这样，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才能落到实处。

**李辛生**（广东省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有一个整体性的认识，不能单打一，必须两个文明建设同步发展，急功近利、短期行为是决不能奏效的。精神文明的硬件建设固然很重要，但归宿点还是应该放到人的思想文化素质的提高上，要把培养一代新人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

**叶汝贤**（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精神文明是在物质文明基础上产生的积极成果的总和，反映着人类精神生活进步的状态，主要包括人的思想和行为。行为是思想的表现，思想主要包括思想观念、道德观念和审美观念。生活环境建设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汇合点，它反映了人的思想、道德和审美观念，是人的文明行为的直接表现，我们认为应把它归入精神文明建设的范围。这样，思想→行为→环境，由深层到表层，构

成了精神文明的总体结构，其核心是人的思想状态、文化道德素质和审美观念。

南海经验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一个系统工程而又抓住了其核心来作文章，形成一种“群众性自我教育、自我激励、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机制”。形成这四个“自我”，实际是提高人的文化道德素质、提高人的自觉性的结果。他们的做法是，“治贫”与“治愚”相结合；“硬件”（基础设施）与“软件”（思想文化阵地）相结合；制度建设与思想教育相结合，在创建活动中注意把思想教育贯穿于全过程。

随着物质文明建设的发展，文明环境的建设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难的是造就一代新人——文明的人，而这正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最终目标。因此，我建议“在‘文明村、户’的建设中，明确加上‘文明人’的建设，形成‘三文’即‘文明村、文明户、文明人’的建设格局。

**张江明**（广东省社科联名誉主席、广东社会科学大学校长、教授）：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和决定性条件，但这种“决定性”并非是机械的因果决定论，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富裕”与“文明”是不能简单地划上等号的。南海市在创建文明村、户过程中提出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富裕不等于文明”的口号，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启迪作用，它深刻地说明两个文明都是农民的迫切要求，同时说明两者的辩证关系。

当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研究中一个突出的理论问题，就是要重视和加强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研究，其中特别要研究主体的潜能发挥和能动作用，研究如何才能较快较全面提高人的综合素质问题。

**曹云华**（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讲师）：最近广东响应中央的号召，提出不单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而且也要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赶超亚洲“四小龙”。不少同志对此提出异议，认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资本主义精神文明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文明，不能相提并论。我认为此种观点至少反映了我国目前在精神文明问题研究方面仍然未能从过去的一些误区中走出来。这些误区是：1. 把西方国家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对立起来，割裂开来。认为西方国家的物质文明是发达的，高水平的，而精神文明是腐朽的、颓废

的、没落的，这种观点相当流行，但实际上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在西方社会，丑恶的现象虽然存在，但这种现象并不是西方发达国家精神文明的全部内容。2. 把西方国家的精神文明简单地等同于资本主义精神文明，同样是不妥的。首先，西方国家中的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是全人类文明进步的共同成果和结晶，反映着人类进步的一般规律；其次，西方国家从事精神生产的精神生产者如教师、律师、文学家、艺术家等大多属于中产阶级和自食其力者，不加分析地把这些人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精神产品一概斥之为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的，有失公允。3. 用小生产者的眼光去看待西方国家的许多精神产品和精神生活。其实，西方国家的许多精神产品和精神生活乃是高度的物质文明发展的产物。

正在致力于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及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如果要真正建立具有自己特色的高度现代化的精神文明体系，就必须从以上三个误区中大胆地走出来，以开放的、宽容的态度去对待西方的精神文明，让东方和西方的精神文明互相学习、互相补充、互相促进。

**蓝红**（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明办主任、省精神文明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南海市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是成功的，它给了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推广南海市经验，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共广东省委已决定向全省推广南海市的典型经验，南海市本身也存在着如何进一步普及和提高的问题，这就是如何同物质文明建设相适应，使创建文明村、户的活动再上新台阶。为此，需要把普遍开展创建文明村、户和建设一批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环境优美、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结合起来；要把普遍开展创建文明村、户与有计划开展争当文明公民的活动结合起来；把建设优美环境和提高人的综合素质结合起来；把普遍开展创建文明村、户和创建一批文明村、户标兵结合起来。

（冯范整理）

# 文言翻译的原则与基本方法

——评杨烈雄《文言翻译学》

罗伟豪

杨烈雄同志所著《文言翻译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是一部有探索意义的语言学论著。全书共六章，论述了建立文言翻译学的目的意义，文言翻译学的特点和任务，文言翻译的定义和原则，文言翻译的基本方法和基本规律，诗歌、散文、词赋的翻译，文言翻译的质量标准和翻译心理等问题。正如詹伯慧先生在序言中所说的：长期以来高等院校关于文言翻译问题的著述是凤毛麟角，此书作为一项草创性的探索，第一次把文言文的翻译作为一门学科来进行系统的研究，这是值得肯定的。读了烈雄同志此书，在以下方面尤其受益良深。

## 一、关于文言翻译的定义和特点

《文言翻译学》第一章、第二章主要是阐明文言翻译对于提高语文教学质量的重要作用，首先论述的是文言翻译的概念定义。此书开章明义：文言文是以周时黄河中下游区域性共同语为基础逐渐形成的书面语言，它包括上古汉语的书面语和秦汉以来历代文人士模仿这种书面语言进行写作的文学语言。文言文在最初形成的时候与上古口语是基本一致的，不需要什么翻译，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文言文脱离各时代的口语越来越远。

司马迁为写《史记》，就有过不少翻译实践。比较《尚书·尧典》“曰若稽古”至“庶绩咸熙”可知，《史记·五帝本纪》的翻译，1.删去了“曰若稽古”，“黎民于变时雍”，“曰明邦”、“帝曰：咨！汝羲暨和”，“成岁”等语句。2.把《尚书》“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改为“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3.绝大部分语句都是直译，也就是词与词的对译，其中有单音词的对译：

曰一者 克一能 俊一驯 平一便 协一合 邦一国 宅一居 嵎一郁 厥一其  
讹一为 仲一中 分一申 宵一夜 殷一正 朔一北 隩一燠 期一岁 旬一十  
定一正 工一官；

双音词的对译：

钦若——敬顺 历象——数法 平秩——便程 蓂莩——字微 朔易——伏物  
允厘——信饬 寅宾——敬道 寅饬——敬道；

单音译为双音：

西——西土 夷——夷易，

全句对译：

庶绩咸熙——众功皆兴

使动词译作一般动词，改变语序：

出日——日出 纳日——日入，

整数与零数之间加“有”的句式被简化：

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岁三百六十六日。

其翻译实践，对今人研究文言翻译仍有借鉴意义。

汉语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两个主要的系统，一是文言文，一是古白话。古白话是指唐宋以来以北方话为基础而形成的中古和近古汉语的一种书面语言，由于唐宋以后存在着文言和白话两个系统，因此有些作家所写的不同作品本身就有很大差别。北宋苏轼所写的作品绝大多数是仿古的文言文，可是他有一首《猪肉颂》却使用白话；清初蒲松龄用深奥的文言写《聊斋志异》，但他也用白话写《逃学传》。从语言运用实际情况看，文言文和白话最明显的交替是本世纪头十年。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白话文逐渐居于统治地位。二十年代以后，文言翻译工作蓬勃发展，出现了许多“白话读本”“白话译解”。解放后译作更多，如《论语译注》、《孟子译注》、《古文观止译注》、《尚书译注》、《诗经选译》、《屈原赋今译》等等。面对丰富的翻译实践，很有必要总结探讨翻译的理论，促进翻译工作的健康发展。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文言翻译学》着重指出：文言翻译特指文言文的普通话翻译，也就是用现代白话文翻译文言文。《文言翻译学》是以文言翻译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着重探讨文言翻译的定义、特点、方法、规律、技巧、风格、心理、质量标准等等，文言翻译学理论体系的核心是研究汉语不同发展阶段的语言转换。文言翻译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于推广普通话和提高语文教学质量有重要作用。

## 二、文言翻译的基本方法

关于翻译的基本方法，有的学者主张意译，有的主张直译，本书提出最好的方法是“对译”。

首先是词与词的对译。如《史记·陈涉世家》

〔原文〕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 ↓ ↓ ↓ ↓ ↓ ↓ ↓  
〔译文〕燕（哪）知大天的志啊  
          （子）雀里道雁鹅 向  
          ①②③②③③③②③

古汉语单音词多，词语对译的关键是按照普通话的语法规范的要求去选择相应的双音词。单音词演变为双音词有三条规律，也就是上句①单音词增加辅助成分组成复音词；②以单音词做词素扩展成复音词；③换成完全不同的形式。

本书还举例说明词与词的对译应力求词性相当，笔者对此深表赞同。另一方面也应

注意，对译并不是“硬译”和“死译”，而是要做到“对而不死”，如在《触警说赵太后》“愿未填沟壑”就可以译为“还有一口气”，而不必按字面硬译。

其次是句子的对译。1. 古今汉语句子结构相同或基本相同的便严格地进行对译，例如：〔原文〕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译文〕鲁僖公四年春天，齐桓公率领诸侯的军队入侵蔡国。2. 古今汉语句子结构不同的就调整语序或增删某些词语。例如《史记·秦始皇本纪》〔原文〕（古文）天下散乱，莫之〔能〕一。〔解释〕（古时候）天下散乱，没有谁它〔能够〕统一。调整后译为：古时候天下散乱，没有谁能够统一它。

以上语序是宾语前置，还有介词宾语前置、定语后置、作补语的介词结构译为状语、增删某些词语，等等，本书都作了详细的叙述。

方法取决于原则，《文言翻译学》提出文言翻译应遵守三项原则。

（一）转换的原则。文言翻译是一种表达同一种意思的语言转换，所以要严格遵守转换原则，从内容、风格方面保持原貌，在文章体裁方面也要尽量保持原形。例如贾谊《论积贮疏》“仓廩实而知礼节”，译为：“粮仓充实了，百姓才会懂得礼法。”但有的译者却译为：“粮食多了，百姓才会遵守礼法。”后者“仓廩”译为“粮食”；“知”译为“遵守”；“足”译为“满足”都与原意不同，违背了转换的原则。

（二）规范的原则。译文必须是规范的现代汉语。例如《左传·襄公二十一年》“乐王鲋言于君，无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许。”译为“乐王鲋向国君说情，没有办不到的，他想请求赦免您，您又不答应。”用词造句符合现代汉语规范，文字简洁通顺。

（三）通俗的原则。文言翻译的目的是化深奥为显浅，译文必须通俗易懂，使广大读者能了解原文。本书引用了成功的译例，也列举失败的译例，从正反两面论述，对比鲜明，使读者易于领会。

1974年以来，大陆曾在较大范围内进行古籍评注，译作蜂出。七十年代开始，台湾也出版了一大批古籍今注今译，各种译本存在不少差异，笔者认为对此充分注意，下面仅就《中庸》的二段译文进一步比较说明文言翻译的原则与基本方法。

〔原文〕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译一〕（1974年广东人民出版社《中庸批注选》）

〔译一〕天所赋予人的叫做“性”，遵循着“性”去做叫做“道”，把“道”修养好并加以推广叫做“教”。

〔译二〕（1977年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庸今注今译》）

天所赋予人的气禀叫做本性，遵循本性去处世做事叫做正道，修明循乎本性的正道，使一切事物都能合于正道，就叫做教化。

〔评论〕译一是直译，译二基本上也是直译但带有某些意译成分。译一的“性”、“道”、“教”译得非常严谨，不任意解释，译者个人意见在注解中说明，译文中保留原来的专门术语。译二的“性”译作“本性”，“道”译作“正道”、“教”译作“教化”，符合单音对译为双音的规律，但较为随意，未必准确。译一的“天命”、“率性”、“修道”译得比较简洁，忠实

于原文，译二则加上不少带有主观色彩的词语。从这三句可知，直译比意译准确、规范。  
〔原文〕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载，无不覆  
幬；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

〔译一〕孔丘宗奉和传述尧帝和舜帝统治人民的道，效法周文王、周武王的礼制，上  
顺天时，下合地理。他的伟大就象天地那样没有什么东西它不能装载的，没有什么东西  
它不能覆盖的；好比春夏秋冬的交错运行，象太阳和月亮轮番照耀于宇宙一样。

〔译二〕孔夫子远宗唐尧虞舜之道，近守文王武王之法，上顺天时的自然运行，下合水  
土的一定生成之理，比如天地的无所不载，无所不覆。比如四季的更迭运行，日月的  
交替照明。

〔评论〕译一的优点是1.单音词准确地译作双音词，如“祖”译“宗奉”、“述”译“传述”，  
“载”译“装载”，“日”译“太阳”、“月”译“月亮”，双音词也准确对译为现今的双音，如“覆幬”  
译“覆盖”。2.顺从古今语法发展变化规律，如“宪章”是名词作意动词因而译“效法”，  
“无”是无指代词，对译为“没有什么东西”。3.切合语言实际，如“四时”译释“春夏秋冬”。  
缺点是1.“仲尼”译“孔丘”，不忠实于原文。2.“道”前加上“统治人民”的修饰语，这种解  
释性的语言实在是画蛇添足。从整段看，译二显然比不上译一，原因在于未能运用古今  
语言变化规律，不注意规范，也不够通俗。

从上述二段评论可以看出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有重大的指导作用。《文言翻译学》是  
一本好书，它对古代汉语教学有重要参考价值。中国古文学作品丰富多彩，诗词歌赋，  
与散文各有不同。《文言翻译学》第五章分别论述诗歌、散文、词赋的翻译，引用了许多  
生动的译作，有些篇目由著者直接翻译，有不少精辟的见解。第六章总结全书，作者提  
出文言翻译应该有明确的质量标准并且进行翻译心理研究，这些意见都很中肯，本文不  
详细复述。下面提出本书的一些不足之处。

### 1. 关于直译与意译

一般的古代汉语课本都把翻译方法分为直译和意译。直译就是逐字对译。意译就是  
只按句中的意思来译，而不必按照原来的语法规律来译，可以增减原来的词，可以调整  
原文的词序，《文言翻译学》第四章所论述的对译实际上是以直译为主而加上部分的意  
译，具体地说，词与词的对译以及句子结构相同的对译是直译，句子结构不同而调整语  
序或增删词语应该是意译，本书论述对译偏重于直译而没有充分论述意译。笔者认为，  
第五章第一节论述诗歌的翻译分别举例说明要把诗歌激越的感情，丰富的想象，深邃的  
意境，和谐的韵律以及凝练的特点，含蓄的意思和跳跃而过的意思表现出来，这些都应  
该是属于意译。总而言之，全面分析，博采众长，勇于创新，文言翻译的基本方法应该  
有三种类型：直译、意译、对译。强调“对译”的优越并不排斥直译和意译。

### 2. 如何理解“信”、“雅”、“达”的含义

文言翻译学的专著虽然是凤毛麟角，但在古代汉语课当中有古书译注这项基础知识，



或详或简介绍有关文言翻译的理论，影响较深的是翻译家严复对翻译提出的要求：信、雅、达。严复虽然是就翻译外语方面说的，但对翻译古文也同样适用。赵仲邑先生解释说：“信”指译得准确无误，忠实于原文。“雅”指译得有文采。“达”指译文通顺、自然、流畅。（见1984年出版广西人民出版社《古代汉语》527页）笔者认为，《文言翻译学》所提三项原则与严复的三项要求基本相同，与赵仲邑先生的解释是大同小异。但是“雅”指“规范”更符合原义，与今天提倡推广普通话完全一致。“信”、“雅”、“达”，准确、规范、通顺，作为文言翻译的原则，既方便又实用，因此在论述文言翻译的原则与基本要求时不能忽略严复的理论。

### 3. 关于文言翻译的基本规律

《文言翻译学》第四章第二节专论文言翻译的基本规律，概括为三项：（一）忠实于原文的规律；（二）译文规范化的规律；（三）雅俗共赏的规律。笔者认为这一部分的论题概念不明确，未能分清“规律”与“原则”的差别。原则是指说话、行事所依据的准则，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标准；规律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规律是客观的，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笔者认为，忠实于原文、译文规范、雅俗共赏应是原则而不是规律，所谓三项规律与上文的三项原则完全相同。本书在基本规律一节列举的细目实际上是原则的进一步深入，也就是翻译的具体要求。最近有人把它概括为“古文今译十要”：（一）要分古今词义的差别；（二）要充分利用具体语言环境的规定性；（三）要掌握词类活用结构的今译方式；（四）要掌握其他特殊结构的古今对译形式；（五）要注意语序的调整；（六）要正确地处理语气词，传达原文的语气；（七）要补出原文省略的内容；（八）要以直译为主辅以意译；（九）要综合运用古今汉语知识和文化知识；（十）要提高现代汉语书面语的表达能力。（见199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古汉语精解》）这都可与本书互相比较，取长补短。应该明确，要求也不能作为规律，真正的规律应该是指古今汉语的发展变化规律，笔者认为，《文言翻译学》所列基本规律的十二项细目当中，以下几项是能够密切联系古今汉语变化规律的，如“要尽量做到词词落实”、“要使造句符合现代语法规则”、“尽量以现代汉语复音词对换文言文的单音词”、“恰当地补充一些意会成分”等等。总而言之，文言翻译要掌握哪些最基本的语言规律，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还有待于进一步整理、挖掘。

**作者单位：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陶原珂**

# 《学术研究》1992年1—6期总目录

(括弧内前一数字是期数, 后一数字是页数)

## 总 类

###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与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

——广东理论界学习贯彻邓小平南巡重要讲话精神……………本刊记者 石 志(3·6)

### 高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

——广东社会科学界学习座谈党的“十四大”精神综述……………本刊记者 石 成 雷比璐(6·6)

###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学习党的“十四大”精神……………崔 河(6·10)

## 从广东实践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把精神文明建设落实到农村基层的好路子……………谢 非(4·6)

推进农村基层精神文明建设的尝试……………中共南海县委员会(4·12)

南海县文明村、户建设的主要特点和普遍意义……………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调查组(4·16)

南海县文明村、户建设的辩证思考……………范 英(4·21)

广东所有制改革的实践及特点……………关则文 魏建飞 陈祖煌 杜重年(4·25)

农村股份合作经济崛起的原因和条件……………于幼军(4·29)

### “自然失业”问题初探

——广东90年代就业政策调整的若干思考……………黄德鸿 邓伟根(4·34)

改革开放为中山市敞开了繁荣兴旺之门……………谢明仁(4·89)

### 乡镇企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东乡镇企业的发展及主要特色……………黄柱良(4·46)

###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启迪

——中山、东莞、顺德、南海调查……………顾作义 何文光 洪楚仪(4·52)

广东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初步实践与改革趋向……………吕 沛(5·6)

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换的理论与实践……………杨 明(5·10)

跨国经营: 广东经济走向世界初探……………侯芯冰(5·13)

深圳股份制企业变革中形成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新观念……………谢玉明(5·18)

关于90年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周期总体协调的设想……………张长生(5·23)

关于如何将国有企业推向市场的系统思考……………何炼成 左中海(5·28)

精神文明建设要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服务……………黄 浩(6·14)

广东群众性创建精神文明活动的回顾与展望……………蓝 红(6·22)

珠江三角洲创建文明村、户活动迈上新台阶的若干对策……………广东省社科联课题组(6·30)

### 镇级城区精神文明建设的初步探索

——南海市大沥镇的做法与体会……………关性乔(6·34)

### 转变观念, 服务经济

——广东“四小虎”政法工作的基本实践及启示……………郑 红(6·40)

广东农村改革开放的实践与思考……………马恩成(6·44)

广东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政策的研究……………黄菊勋 谢鹏飞 莫 震(6·50)

广东利用外资的宏观策略与微观措施……………张亦春 朱孟楠(6·53)

|                        |                    |
|------------------------|--------------------|
| 试论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的国际化经营····· | 温思美 樊均辉 ( 6 · 59 ) |
| 市场经济与东莞速度·····         | 袁学君 ( 6 · 63 )     |
| 成功的奥秘                  |                    |
| ——中山市板芙镇的思维特色·····     | 穆 木 ( 6 · 67 )     |

### 珠江三角洲研究

|                             |                    |
|-----------------------------|--------------------|
| 试论珠江三角洲经济增长的双重特征及其转型前景····· | 王光振 张炳中 ( 2 · 31 ) |
| 珠—港经济技术合作的回顾与前瞻·····        | 路 平 ( 2 · 39 )     |
| 论珠江流域的分工与协作·····            | 何应欢 ( 2 · 24 )     |

### 经 济

|                            |                    |
|----------------------------|--------------------|
| 略论价值规律与经济体制改革·····         | 李义平 杨明丽 ( 1 · 6 )  |
| 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郑炎潮 ( 1 · 9 )      |
| 城市土地市场的建构目标与结构模式·····      | 高 波 ( 1 · 15 )     |
| 评完全市场化的粮食购销改革目标·····       | 许经勇 ( 1 · 19 )     |
| 我国农业中引进外资问题研究·····         | 杨满社 ( 1 · 24 )     |
| 运用系统工程理论制定县级经济发展规划的构想····· | 李东辉 赵兰钦 ( 1 · 30 ) |
| 论风险企业·····                 | 谢科范 ( 1 · 34 )     |
| 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建设问题               |                    |

|                              |                    |
|------------------------------|--------------------|
| ——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理论研讨会综述·····       | 文建明 ( 2 · 51 )     |
| 宏观经济：理论、态势分析与政策操作中的几个问题····· | 朱明春 ( 2 · 55 )     |
| 价值规律与价格规律·····               | 李义平 ( 3 · 8 )      |
| 我国财政补贴的现状与对策·····            | 孙 开 ( 3 · 15 )     |
|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制度·····          | 陈良瑾 唐 钧 ( 3 · 19 ) |
| 国有企业管理运行的层次性特点和体制改革·····     | 马德安 ( 3 · 25 )     |
| 激励理论在我国企业管理中的运用·····         | 钟惠芳 ( 3 · 29 )     |
|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先驱者——卓炯           |                    |

|                    |                    |
|--------------------|--------------------|
| ——纪念卓炯教授逝世五周年····· | 梁 钊 李鸿生 ( 4 · 73 ) |
| 谈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  | 刘鸿儒 ( 4 · 73 )     |
| 发展山区保险业，促进山区经济腾飞   |                    |

|                                 |                    |
|---------------------------------|--------------------|
| ——梅州市的实践与思考·····                | 卓春先 ( 4 · 80 )     |
| 关于股份制度的所有制性质问题·····             | 姚 迈 ( 4 · 83 )     |
| 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劳动力也是商品·····          | 白雪海 关筱琳 ( 4 · 87 ) |
| 实物计划调节的信息限制与商品型计划管理的信息系统建构····· | 刘志彪 ( 4 · 90 )     |
| 综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特点·····              | 魏双凤 ( 5 · 34 )     |
| 论经济学中主体因素·····                  | 杨昌俊 ( 5 · 36 )     |
| 西方行为分析理论的借鉴意义·····              | 张凤林 ( 5 · 42 )     |
| 当代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和经济改革·····           | 何东霞 ( 6 · 75 )     |
| 我国农业向持续农业转化的政策选择·····           | 高 波 ( 6 · 80 )     |

### 哲 学

|                   |                |
|-------------------|----------------|
| 关于“责任学”的两篇文章····· | 于光远 ( 1 · 38 ) |
| 再探马克思主义出发点        |                |
| ——兼答易佑平同志·····    | 萧新生 ( 1 · 43 ) |

|                        |                |
|------------------------|----------------|
| 青年期的主客体性·····          | 谭建光 ( 1 · 48 ) |
| 新儒学的形上追求及其现代意义·····    | 李宗桂 ( 3 · 39 ) |
| 情绪的本体意蕴                |                |
| ——萨特情绪理论述评·····        | 涂成林 ( 3 · 45 ) |
| 同一个规律的两种运用             |                |
| ——兼与张江明同志商榷·····       | 李继文 ( 3 · 50 ) |
| 逻辑学发展的序列性、层次性及其功能····· | 王经伦 ( 3 · 54 ) |
| 道德建设对科技进步的作用·····      | 吴素香 ( 3 · 58 ) |
| 遨游学海50年                |                |
| ——罗克汀教授的治学道路·····      | 刘 明 ( 3 · 64 ) |
| 发扬实事求是精神, 搞好广东工作       |                |
| ——纪念叶剑英诞辰95周年·····     | 张江明 ( 4 · 56 ) |
| 改革开放中的姓“社”姓“资”问题·····  | 马中柱 ( 4 · 63 ) |
| 新加坡精神文明的特色·····        | 曹云华 ( 4 · 67 ) |
| 论社会主义竞争·····           | 肖君和 ( 5 · 47 ) |
| 认识竞争论·····             | 刘宝三 ( 5 · 51 ) |
| 个体主体的社会化·····          | 黄捷荣 ( 5 · 56 ) |
| 商品经济与自我价值·····         | 吴灿新 ( 5 · 59 ) |
| 价值及其相关范畴研究·····        | 李明华 ( 5 · 62 ) |
| 湛甘泉哲学思想纵横谈·····        | 李锦全 ( 5 · 68 ) |
| 价值转化规律论(上)             |                |
| ——《价值转化工程》之一章·····     | 黄锦奎 ( 6 · 70 ) |

## 社会主义辩证法研究

|                       |                |
|-----------------------|----------------|
| 在实践中促进社会主义辩证法的发展····· | 张江明 ( 1 · 52 ) |
|-----------------------|----------------|

## 精神文明学研究

|                        |                |
|------------------------|----------------|
| 论文化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 张尚仁 ( 1 · 58 ) |
| 文明观若干问题初探·····         | 邹永图 ( 2 · 61 ) |
| 把商品经济意识的精华上升为全民意识····· | 张秀玲 ( 2 · 66 ) |
| 智慧新说·····              | 石 松 ( 2 · 70 ) |
| 广东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研讨会综述·····   | ( 2 · 75 )     |

## 历 史

|                        |                     |
|------------------------|---------------------|
| 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新认识·····  | 聂希斌 ( 1 · 64 )      |
| 关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进程和方向·····  | 陈崇凯 张 涛 ( 1 · 70 )  |
| “T模式”的形成和经济中心地的阶梯····· | 〔日本〕中村哲夫 ( 1 · 72 ) |
| “女史”考·····             | 李勤德 ( 1 · 77 )      |
| 谈历史研究中“奇点”的选择与运用·····  | 李桂海 ( 1 · 81 )      |
| 武昌起义后犬养毅来华的活动·····     | 段云章 ( 2 · 106 )     |
| 略论徐悲奋与《瀛环志略》·····      | 李鸿生 ( 2 · 114 )     |
| 斯宾格勒的历史形态学研究方法·····    | 姜建强 ( 2 · 118 )     |
| 中华书局本《汉书》校议·····       | 曾宪礼 ( 2 · 124 )     |
| 中国古代乌托邦与近代社会主义空想·····  | 吴雁南 ( 3 · 66 )      |

|                           |                    |
|---------------------------|--------------------|
| 《资治通鉴》初议·····             | 庄 昭 ( 3 · 71 )     |
| 鸦片战后至甲午战前广东对外贸易的几个问题····· | 廖伟章 ( 3 · 75 )     |
| 河内刺汪误中副车质疑·····           | 谭天河 ( 3 · 83 )     |
| 从学术源流论饶宗颐先生的治学风格·····     | 姜伯勤 ( 4 · 94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线索和分期·····     | 周 军 ( 4 · 102 )    |
| 中国古代文化人心态探析·····          | 刘汉东 ( 4 · 107 )    |
| 马基雅维里主义与唐代政治·····         | 谢元鲁 ( 4 · 113 )    |
| 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                    |
| ——从日本“沫若文库”谈起·····        | 曾宪通 ( 5 · 75 )     |
| 文化共识——民族凝聚力的内涵·····       | 刘宗碧 ( 5 · 82 )     |
| 关于中国近代史主题和线索的再思考·····     | 崔志海 ( 5 · 87 )     |
| 地理史观与中国近代史学的历史考察·····     | 张艳国 黄长义 ( 5 · 92 ) |
| 南宋市舶司初探·····              | 章 深 ( 5 · 97 )     |
| 中共事前得知“西安事变”消息说质疑·····    | 蒋文祥 ( 6 · 85 )     |
| 罗素访华缘起·····               | 冯崇义 ( 6 · 88 )     |
| 关于古代中国与美洲的交往问题·····       | 龚纛晏 ( 6 · 94 )     |
| 晚清“厘金”起源新探·····           | 俞志生 ( 6 · 98 )     |

### 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

|                           |                    |
|---------------------------|--------------------|
| 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促成中华民族新崛起·····  | 雷洁琼 ( 2 · 6 )      |
| 论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 郑 群 ( 2 · 7 )      |
|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研究及其方法问题·····     | 张难生 ( 2 · 10 )     |
| 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文化精神·····    | 周大鸣 ( 2 · 12 )     |
| 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物质基础·····        | 方志钦 朱新镛 ( 2 · 17 ) |
| 汉唐时期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发展·····     | 章权才 ( 2 · 21 )     |
|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多学科、多视角的综合开拓     |                    |
| ——广东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概况·····    | 凌 峰 ( 2 · 27 )     |

### 文学·语言·教育

|                          |                        |
|--------------------------|------------------------|
| 中西灵感说与文化差异·····          | 饶芈子 ( 1 · 86 )         |
| 论基督教文化观念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 王本朝 ( 1 · 92 )         |
| 佛教心性论对古代文艺创作心理学的启示·····  | 蒋述卓 ( 1 · 98 )         |
| 黄伟宗的创作方法理论研究             |                        |
| ——从《创作方法史》到《创作方法论》·····  | 何楚熊 ( 1 · 104 )        |
| 汉语方言研究的回顾和前瞻·····        | 詹伯慧 ( 1 · 109 )        |
| 从“箸者石章”的解释看诅楚文刻石的形制····· | 赵平安 ( 1 · 115 )        |
| 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选萃·····          | 李顺刚 李建中 王济民 ( 2 · 78 ) |
| 再论社会心理是文艺反映现实的中介·····    | 陆一帆 ( 2 · 85 )         |
| 改造国民性与鲁迅文艺观的独立特色·····    | 张硕城 ( 2 · 92 )         |
| 探讨汉语的民族文化精神              |                        |
| ——第二届全国语言与文化学术研讨会述评····· | 苏新春 ( 2 · 100 )        |
| 中国教育有效需求不足之经济分析·····     | 吴超林 ( 3 · 32 )         |
| 论普及普通话的基本条件和最终条件·····    | 陈恩泉 ( 3 · 87 )         |
| 民俗事象的语言视界·····           | 申小龙 ( 3 · 91 )         |

|                          |                     |
|--------------------------|---------------------|
| 广东水神溯源·····              | 叶春生 ( 3 · 96 )      |
| 雷州半岛的雷神话与东夷文化·····       | 李炳海 ( 3 · 103 )     |
| 论黄秋耘文学评论的感情色彩·····       | 张 焯 ( 3 · 107 )     |
| 文学史哲学:性质、对象与意义·····      | 陶东风 ( 4 · 118 )     |
| 劳承万的审美中介学研究              |                     |
| ——当代美学研究的新视向·····        | 刘伟林 ( 4 · 125 )     |
| 论我国古代诗歌意境观念对戏曲理论的影响····· | 阮国华 ( 4 · 129 )     |
| 车王府曲本子弟书评述·····          | 刘烈茂 郭精锐 ( 4 · 136 ) |
| 广东东莞莞城话的“起”·····         | 陈晓锦 ( 4 · 142 )     |
| 试论幽默的教学功能·····           | 周国雄 ( 4 · 144 )     |
| 形似断代短制 实为专史长编            |                     |
| ——关于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     | 吴 俊 ( 5 · 101 )     |
| 五四以来“乡土小说”的阙定与蜕变·····    | 丁 帆 ( 5 · 107 )     |
| 论诗人徐志摩的心路历程·····         | 李昭醇 ( 5 · 113 )     |
| “石”、“玉”精神的内在冲突           |                     |
| ——《红楼梦》悲剧的哲学意蕴·····      | 梅新林 ( 5 · 118 )     |
| 人性之恶与生命之恶的寓言             |                     |
| ——《金瓶梅》性描写新论·····        | 王 彪 ( 5 · 122 )     |
| 晚明启蒙思潮在《聊斋志异》中的回响·····   | 何天杰 ( 5 · 127 )     |
| 谈中西文论的比较研究·····          | 蔡钟翔 ( 6 · 101 )     |
| 中菲人民战斗情谊的颂歌              |                     |
| ——读《风雨太平洋》一、二部·····      | 何楚熊 ( 6 · 106 )     |
| 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主张·····         | 宋其蕤 ( 6 · 112 )     |
| 释《诗经》和《楚辞》中的“爰”·····     | 罗英凤 ( 6 · 117 )     |

### 国情省情市(县)情研究

|                     |                     |
|---------------------|---------------------|
| 论特区企业集团的作用·····     | 陈书燕 ( 1 · 116 )     |
| 发展山区经济必须重视利用信息····· | 梁子和 ( 1 · 119 )     |
| “云浮特色”新发展·····      | 张 洁 陈次荣 ( 3 · 113 ) |

### 企 业 研 究

#### 改革·创新·奉献

|                         |                     |
|-------------------------|---------------------|
| ——梅县涤纶厂经验考察·····        | 国欣等 ( 1 · 121 )     |
| “梅涤”效应的启示·····          | 紫 彬 ( 1 · 123 )     |
| 雄心·才略·实干                |                     |
| ——记汕头经济特区物资进出口总公司·····  | 陈海伦 陈 波 ( 2 · 128 ) |
| 梅州汽车工业发展的实践与思考          |                     |
| ——兼析梅州汽车配件厂的经营之道·····   | 曾超麟 曾小勇 ( 2 · 131 ) |
| 内外贸结合,办好有中国特色的特区商业      |                     |
| ——汕头经济特区对外商业总公司的探索····· | 陈义保 ( 3 · 116 )     |
| 浅谈市场经济与国营物资企业的改革·····   | 袁中越 ( 4 · 130 )     |
| 以集团化推进企业改革的全面深化         |                     |
| ——广东明珠球阀集团公司的实践及启示····· | 李桂崇 ( 4 · 154 )     |
| 依靠科技进步是振兴企业的必由之路        |                     |
| ——佛山市变压器厂发展的启示·····     | 齐建中 ( 4 · 158 )     |

- 浅谈企业的管理与发展·····钟烈华(5·132)  
 名优产品与企业的发展·····张梓林(5·136)

## 学 术 信 息

### 对华侨华人若干问题的新探讨

- 庆祝广东华侨历史学会成立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1·125)  
 关于《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的研讨·····(1·127)  
 全汉字学术研讨会纪要·····(1·129)  
 广东朱熹学术思想研究会举行成立大会·····(3·115)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广东文学理论界部分学者纪念《讲话》发表50周年·····(3·119)  
 纪念与发展  
 ——广州召开卓炯诞辰85周年座谈会·····(3·121)  
 梅州举办《研究梅州 建设梅州》征文·····(4·15)  
 “广东省社科联系统学术理论刊物首次工作座谈会”纪要·····谭湛明(4·160)  
 实践的呼唤 时代的要求  
 ——“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研究中心”成立大会纪要·····范 英(5·140)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研究的新起点  
 ——“南海市文明村、户建设理论研讨会”综述·····(6·121)

## 书 评

### 社区研究有新著

- 何肇发主编《社区概论》评介·····赵 巍(1·131)  
 伦理思想发展史研究的新成果·····郑维铭(2·133)  
 中国诗学的新收获  
 ——评钟光贵诗论集《诗艺探胜》·····熊国华(3·122)  
 让鉴赏走向自觉  
 ——评陈新璋《诗词鉴赏概论》·····蒋述卓(5·138)  
 文言翻译的原则与基本方法  
 ——评杨烈雄《文言翻译学》·····罗伟豪(6·124)

## 书 海 酌 蠡

- 苏轼确知“周郎赤壁”的位置吗·····刘家钰(2·38)  
 句耀与乐府·····李文初(2·74)  
 越为“少康庶子”试析·····殷伟仁(2·134)

(黄荣显整理)

# 广东省大沥塑料机械厂



本厂生产“大字牌”各种塑料机械已三十多年，是广东省机械设备公司定点厂。产品有凹版、凸版各种规格塑料印刷机、各种规格塑料吹膜机、挤出机以及生产塑料制品的各种专用机械。产品质优价廉，保修保用，畅销全国，部分产品获广东省优质产品和农牧渔业部优质产品称号。是广东省先进企业，全国乡镇企业系统先进企业。

电话：551351 552410

电挂：5555

邮码：528231

厂址：广东省南海市大沥镇广佛路

ALSY-900型(1-8色)

## 凹版轮转塑料印刷机



适用于连续印刷各种塑料薄膜包及纸类包装，单、双面印刷一次完成。印刷图案精美，质量优良。有1-8色各种规格供用户选择，同1台机可同时印刷两个不同规格产品。

最大印刷宽度：900毫米

最大印刷长度：900毫米

电机功率：4千瓦(调速)

TLS-4600/6600型(4色、6色)

## 凸版轮转塑料印刷机

适用于连续印刷各种塑料薄膜包装、饲料袋、糖袋、及纸类包装。单、双面印刷1次完成，印刷质量优良，获广东省和农牧渔业部优质产品称号，并获中国首届国际包装和食品机械博览会银奖。

最大印刷宽度：600毫米

最大印刷长度：1050毫米

电机功率：4千瓦(调速)

